

為自由而戰 的 中國

美國史特朗女士著 伍友文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5447B

著士女朗特史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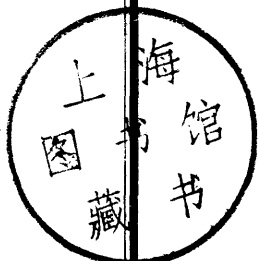
(一之分五類人全)

國中的戰而由自爲

ANNA LOUISE STRONG

One-fifth of Mankind

譯文友伍



版出社棣棠

1939

介紹本書與著者

本書原名『人類五分之一』(One-fifth of Mankind)，其副標題乃是：『中國爲自由而戰』(China Fights for Freedom)。它的內容是從中國的地理，歷史與文化的背景說到這次抗戰的前因與後果。它的結論(見第十八章)就是要闡明中國的問題乃是世界的問題。它這次的抗戰不但爲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而戰，也爲世界的和平與人類的自由而戰。這對於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是一個懇切的警告，也是強烈的挑戰。

本書的著者安娜·露易絲·史特朗女士(Anna Louise Strong)是莫斯科新聞的記者。她的父親是一個美國的牧師，而她的哥哥特雷西·史特朗(Tracy Strong)現任基督教青年會世界協會的總幹事。她在二十三歲的時候已經獲得了哲學博士的學位。她在蘇俄居住了十多年，所以關於蘇俄的著作很多。中國的譯本在八九年前出版的有蘇俄的企業(南華書局)與蘇俄平民生活寫真(紅葉書店)，去年出版的還有人的新世界與新世界的人(潮鋒出版社)。

本書是史特朗博士在去年第二次遊歷中國後回到美國去寫成的(一九三八年八月間)。她運用靈敏的思想與生動的文章完成了這部四千年來『人類五分之一』的中華民族奮鬥史。歐美人讀了此書，不免要拈目；日本人讀了此書，一定要喪膽。中國人讀了此書，自然要興奮。所以它不但可以喚起民主國家聯合的行動，又可以打破日本武力侵略的迷夢，更可以加強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抗戰必勝的信念！

HEADQUARTERS OF THE GENERALISSIMO

Wuchang, China
27 July 1938

Dear Dr. Strong,

I have just received your letter of July 1 telling me that your book is on the stocks...

...One point I would like to make is that China, in her second year of war, continues, paradoxically, to fight a single-handed battle against the whole world, since the democracies as well as the totalitarians are supplying Japan with anything which she can use to destroy us so long as she pays for it. China is grateful, however, for the sympathetic attitude of large sections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democracies who are doing their utmost to have an end put to injustice, to inhumanity, and to international brigandage of the worst kind.

I hope your book has great success and that it will be able to influence thoughtful people who understand the realities of the situation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Yours sincerely,

Madame Chiang Kai-shek
(Madame Chiang Kai-shek)

Dr. Anna Louise Strong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蔣夫人給本書著者的手書

蔣介石夫人給美國史特朗女士的覆函

親愛的史特朗博士：

我剛纔接讀你七月一日寄來的大札，說到你的書是在編著中了。……

……我所要提出的一點就是說，中國在抗戰的第二年中，似乎還是斷續對全世界作單獨的鬥爭，因為祇要日本能夠一直付款下去，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和極權國家都在同樣地供給它任何可以毀滅我們的東西。然而，民主國家中大多數的人民却在竭力制止各種違反正義，慘無人道，與國際盜匪的行爲；所以中國對於他們這樣的同情態度是要表示感激的。

我希望你的作品會有極大的成功，並能激動那些富有思想的人們，了解世界這部分的實況。

你誠實的蔣宋美齡

一九三八年七月廿七日，于中國武昌總司令部。

目次

目次

蔣介石夫人原函及譯文

第一章 中國爲何而戰——中美的對比……………一

第二章 到東方之路……………一二

第三章 中國的鳥瞰……………三一

第四章 四千年的傳家寶……………四五

第五章 西方侵入了中國……………六四

第六章 革命的巨浪……………七九



第七章	日本對華的侵略政策	九九
第八章	中國走向統一的途徑	一一一
第九章	日本揭開了戰幕	一四一
第十章	中國往內地遷移	一五九
第十一章	西北的戰士	一七八
第十二章	在八路軍中	一九四
第十三章	軍隊與人民	二一一
第十四章	往戰地去的中國戲劇	二三〇
第十五章	中國的新女性	二四三
第十六章	中國的民氣提高了	二六四
第十七章	中國赤化到如何程度？	二八四
第十八章	中國往那裏去——世界往那裏去？	三〇五

爲自由而戰的中國

第一章

中國爲何而戰——中美的對比

『美利堅合衆國爲了獨立而戰爭了九年。如果中國爲了獨立而必須戰爭九年，那麼我們也能夠戰爭到九年。』

這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中蔣介石總司令對第二戰區的軍官所說的一段訓話，那時正是中日戰爭在第一個冬季裏最黑暗的時期。日本強橫的機械化軍隊，在六個月當中已經侵入到中國內地的城市與鄉間。侵略者已經奪取了華北。他們已經佔領了古都北平。他們已經破壞了現代的國都南京。他們已經炸毀了『東方之后』的華中大埠

上海。在極長的戰線上，中國軍隊與人民都在撤退。戰區的廣大正如紐約全省、大西洋南岸與俄亥俄山谷地帶的人民，都在逃避侵略者的暴行。日本的飛機從空中轟炸到中國內地極遠的城市，使孩童的血肉在母親的眼前爆裂橫飛，又使工人的軀體和工廠的斷片混在一起。

蔣總司令還敢拿這種被破壞的民族，來和太平洋那邊和平富強的美國相比較。他對那些失敗的軍官、被炸的工人、喪失子女的母親、說明這種激動四萬五千萬人民的戰爭，對於他們自己和全世界究竟有什麼意義。『美利堅合衆國爲了獨立而戰爭了九年。……我們比他們開始戰爭的時候，却有更多的資源。』這是他號召全國的人民參加抗戰的原因與希望。

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乃是全人類五分之一要爲了『生命，自由與幸福』而戰爭。中國這次的戰爭和美國早年的奮鬥，除了顯然的區別以外，實在有許多深切相似的地方。雙方的情形都是因爲一個經濟不發達與人民不統一的國家，被

一個軍器較優與工業較強的國家所侵略。雙方的情形都是因爲戰爭的劇痛，使被侵略的國土內產生了一個新的統一國家，要求一種新的民主政治。這兩次戰爭的原因與結果，都是普及於全世界的。但是中國的抗戰比美國的規模更大，甚至更能決定世界將來的命運。

中國的人民比早年的美國人更有戰爭的理由。美國是殖民地，本來不是一個國家，不過要對以前合法的君主發動叛變而已。中國是一個穩定的文化結合體，並且過去已經有了四千年的歷史。在這些年代中日本從無要求中國土地的影蹤。中國的人民比美國的殖民更能忍耐，並且在發動抗戰以前，已經忍受了許多更大的侵略。美國的殖民要反抗英國干涉他們的商業與捐稅，尤其因爲它要使殖民地的商業只限於和英國來往。日本却同樣地要求在中國有獨佔的權利，甚至已在冀東創立一個『傀儡政府』，而它的一種特殊功能就是要破壞中國海關的管理權，以便使私貨源源不絕地流入中國。中國人忍受了這種情形；他們甚至對幾省土地的被侵佔也能忍受。

只等到他們家鄉的存在與四千年來的文化受着威脅的時候，中國人纔起來抗戰了。

雖然，中國人在法律上比我們更是理直氣壯，並且已經表示他們不容易引入戰爭，但是雙方的實際情形是很相似的。中國的二十八行省——正如美國的十三州——都要向前作更密切的聯合，以適應他們經濟的發長，而這種聯合却被外界阻礙了。美國殖民地的領袖經過十五年的奮鬥，夢想組織聯合的團體。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對於召集殖民地聯合會議方面，尤爲活動。英國却要阻止他們聯合的行動，所以要在各個殖民地設立各種不同形式的政府，並禁止它們互相接觸。當一七六八年——就是在獨立革命前七年——馬薩諸塞 (Massachusetts) 的下議院，曾經寫信給別的殖民地議會，以促進更密切的聯合。英國就訓令各州的州長，禁止一切『未經批准的聯合。』日本同樣地要在中國把時計的前進方向撥向後轉，並且藉着種種的陰謀和壓力，來阻止各省長官的聯合。然而在這兩方面的情形，都因爲侵略者所用以破壞那個長成國家的策略，就引起了戰爭，而促成了被侵略國的團結。

一切美國人——一切中國人——都不願意受戰爭的試驗。如果容易獲得的話，他們都要增進獨立與統一。但是當戰爭將近爆發的時候，這班依靠英國貿易的英國大商家，大西洋北岸的大地主，以及一般富有的特權階級，都變爲中立派或守舊派，因爲他們恐怕這種獨立戰爭，會加增他們商業上的阻礙與平民間的力量。同樣的理由，使上海的銀行家與中國政府的要員，對於日本保守長期溫和的態度。這兩次革命的力量，都是在於普通的人民以及那些和英國——或日本——並不通商而却受它威脅的資本家。他們認清祇有在獨立的時候，纔能發展美國的——和中國的——許多可能的事業。

在這兩次爲民族獨立的戰爭中，侵略者起初都得到了勝利。在美國方面，英國的侵略軍隊得勝了好幾年。他們的勝利是由於被侵略者的長期分散。他們的勝利是藉着較優良的兵器，較豐富的軍事知識與較前進的工業。被侵略國的人民必須從新建立軍隊；這就難免發生不足、納賄、私逃、缺乏紀律等等事情。中國爲了官吏腐

敗與軍隊渙散而吃了許多虧，但也許還沒有像美國這麼多。華盛頓曾經爲了那些在國難中取利的投機商人而嘆息；他稱呼他們爲『國策的殺害者並且是應受絞刑的。』這兩個被侵略國所有的力源也是相似的。它們的土地是廣大的；它們的敵人是離得很遠的；它們的普通農民與手藝工人，爲了老家打仗是非常勇敢的。勒克星頓 (Lexington) 與康科特 (Concord) 的農民，在夜間聽見了勒微耳 (Paul Revere) 傳來的號令，就武裝起來，把英國兵打退。現在晉北與河北省的農民，當日本兵進攻他們的村莊時，也接受了同樣的號令。美國的游擊戰爭是由大西洋南岸著名的麥里翁 (Marion) 部隊組成的，正如今日華北的朱德一樣。到了華盛頓與蔣介石學得了怎樣訓練民衆去加入戰爭，使游擊戰與正規軍相輔而行，他們就開始獲得了勝利。

這是美國歷史中所未有的；這還是去冬的一回事。在晉北的一個山谷中，有一隊農民在晚間出去，把侵略者從他們的家鄉趕走。這些日本兵從鐵道與公路下來，你可以從山上看見他們沿路焚燒村莊的火光。山谷中的農民拿了手榴彈、鳥鎗

以及用廚房的鐵鍋打成的短刀與長矛。他們徹夜打仗，到了天明纔獲得勝利。侵略者只好從鐵路線撤退，而離開了他們的山谷。可是其中有三十個農民已經凍壞了他們的脚而變爲殘疾的人；因爲他們沒有襪子或鞋子，也只好在零度以下的氣候中抗戰。這件事是在華北發生的。但在福奇 (Forge) 山谷中，這樣事也許發生的。

在美國革命開始的時候，英王佐治三世，正如最近日本近衛首相所發表的話相同，就是恫嚇美國，『要使殖民屈膝』，並『使美國浸沉血泊中而把它的城市化爲灰燼』。後來他看見事件擴大了，心中就發生驚慌，而提出了較好的議和條件。到了一個時期，他對於殖民的一切要求，除了國家的獨立以外，都願意接受。那是太遲了。這事在中國尚未發生，但是將來是會發生的。日本將來所提出的條件，除了滿洲以外，也可放棄其他一切。那時中國，好像美國一樣，必定要求比起初更大的自由。但是有些中國人要想接受妥協的條件。在美國方面也有這樣的人。

這兩次革命的戰爭，因爲『革命中還有革命』，就變成了很複雜的局勢。普通的

人民已經受了許多痛苦，但因為武裝參戰，而增加了他們的力量。當美國革命正在進行的時候，特權階級裏有許多最初贊助革命或常常反對革命的人，對於那些被壓迫已久的人民所發長的獨立能力，都很驚奇，要想立刻和英國妥協停戰。但戰爭到了這個時期，愛國的民衆正在挨餓受凍，又爲國家的自由與將來希望的美滿生活而犧牲，所以若有人出來阻撓美國革命的意志，實在是一件危險的事。那些堅持這種行動的人，都被認爲賣國賊而處罰。他們的財產也被充公。這種情形在現今中國的好幾處地方，已經開始發生了。凡是用財富捐助國家的資產階級都受尊敬。華盛頓就是其中的一位。普通的人民有執干戈以捍衛自由的權利，就變成美國民主政治的保障。中國也同樣地走向民主政治，並且要組織民衆，武裝民衆，使他們能夠保衛自己的家鄉。

早年美國的殖民，並非單靠他們自己的武力而得到最後勝利的。他們從法國秘密購得軍火。那時的法國是歐洲國家中的摒棄者，正如現在的蘇聯一樣。法蘭西，

荷蘭與西班牙都援助早年的美國。最後法國遣派海陸軍以援助美國。英國要攻擊那些援助殖民地的國家，因此美國的獨立戰爭，就變成了一種普通的歐洲大戰。這便封鎖了英國的力量，而造成了美國軍事勝利的局勢。

中國的獨立戰爭是不是走向同樣的道路而終於發生世界大戰？蔣介石在號召民衆發動九年戰爭的演說中，末了有一句很重要的話，說：『我們不但爲自己的獨立而戰爭，也是爲了國際條約的尊嚴與世界的和平而戰爭。』中國比美國在要求國際的援助上更有理由可說。當時英國遣派軍隊到他所統治的殖民地去，並沒有破壞國際的條約，然而歐洲的國家爲了自身商業的權益，就向那時世界上最強的國家挑戰。日本侵略中國已經破壞了它和世界上多數國家所訂的條約——如同國際聯盟的規約，尤其是美國所召集而用以保障門戶開放政策與太平洋和平的九國公約。

我在漢口的時候，孔院長對我說：『這不但是一種對中國的戰爭，却是日本對世界戰爭的初步。』但是這種戰爭和早年却不同，因爲現在世界的各國不必參加戰

爭，也是能夠阻止它的。美利堅一國也許就能夠阻止它，或使它緩和下去，而使中國人民容易結束它。因爲日本比較早年世界上認爲第一等工業國的英國，要軟弱得多，並且更要依靠別國的供給。現在和平與民主陣線的勢力，已經普遍於全世界，而遠非從前所可比擬。但是它們必須採取迅速的行動，因爲現在的世界是轉移得很快。日本若不在中國遇到阻止，它就可以橫行亞洲，而衝過太平洋，直至全世界都陷在戰爭的火焰裏。在這樣的一種戰爭中，世界上一切的人民——他們對於優美生活與擴大自由的一切希望——將被另一種普及全世界的黑暗時代所威脅了。

但是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全世界的前進也是光明的。因爲在美國人民得到獨立以後的數十年中，歐洲都響應起來，因此加強了民主主義的運動，推翻了許多君主的政體。將來中國勝利的結果，諒必更要偉大。這是五分之一的人類爲了自由而發動的戰爭。當中國的人民團結一致，組織起來，廓清了侵略者，並使他們所建立的獨立國家成爲自由的土地，那麼他們這種勝利的回聲，將要打破亞洲地方更多

的鎖鏈。這就奠定了世界上民主主義的勝利。

第二章

到東方之路

中國這次的獨立戰爭，有許多地方是和美國的革命相似的，可是它是在一個不同的世界裏發生的。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裏，輪船、鐵路、電報、無線電與飛機，已經使世界的各端連結起來了。在現在的時候，沒有一種戰爭是在一個隔離的地點發生的。中國數百年來，閉關自守，如今却站在許多國家會集的道路上了。

一八五二年，阿拉斯加 (Alaska) 的西華德 (William H. Seward) 曾經預料說：『太平洋的沿岸各島，以及對面的廣大區域，將來要成爲世界大事的主要舞台。』

前面橫着這個大海洋而南部緊接印度洋的地帶，有世界上半的人民，住在人煙稠密而工業落後的國家裏。到這東方的道路，乃是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者擴張勢力範圍的途徑，並且使現代全世界的商業發生連帶的關係。

然而從美國到中國却沒有直接的海上路線。一切的海洋輪船，都先要在日本停靠。這對於旅行者不過是一種賞心悅目的停留，但對於著名的中國人是很危險的。在戰爭以前，日本早已擅權查驗路過的旅客，並且藉着各種原因，可以扣留他們。這種虛張聲勢，本可爲任何有領事作後盾的強硬船主所識破，但是現在的民主國家總是屈服於虛張聲勢之下。美國的輪船爲了要避免這次戰爭中的麻煩，所以不許裝載那些爲日本所反對的貨物。我所搭的坎拿大輪船也勸告旅客，把艙中所有一切反日的文書毀滅，以免發生不幸的事件，甚至把英國商埠帶來的新聞紙也都毀掉。中國富有的旅客若要避免困難，就可以趁中國飛剪號從空中直達美國所屬的海島；否則他們時常可從歐洲繞道至美國。因此，日本阻塞了從中國到美國的航路，甚至

從菲律賓羣島到美國的通常航線也被隔斷了。這是到東方之路的第一種顯著事實。

從歐洲到中國的最快路線，就是藉着西伯利亞鐵道。但日本又在中間阻隔了這條路線。一九三七年的夏天，有些從歐洲回國的中國人，在西伯利亞鐵道上，雖已經過一星期的路程而到達東三省的邊境，但是他們祇得仍從原路退回。如果你和日本關係很好，那麼這條道路是可以通行的。在一九三七年的冬季，我正想從歐洲到中國去旅行的時候，神戶的美國領事，得日本警察的幫忙，已把二十個要到上海去的美國婦女，從一隻法國輪船上遷移出來。所以這條路徑也被破壞了。

另外還有祕密的道路，就是用駱駝蓬車或冒險的運貨汽車，通過亞洲的沙漠與山嶺。兩千年前，漢朝的遠征軍隊和後來馬哥孛羅 (Marco Polo) 曾經採取這些路徑，通過土耳其斯坦的沙漠地。在一九二七年的秋季，我從華中到西伯利亞鐵道，也會經過其中一條困難的道路。這使我們在破損的運貨汽車中差不多經過了兩個月的工夫。那時以後，這些道路已經改善了。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中，中國人說已築成

了一條新的大道，可以通過土耳其斯坦。但這是中國與蘇聯間的軍事祕密，外國旅行家是禁止通行的。

通常由歐洲到東方的路徑大概是由地中海經過蘇彝士運河而到達亞洲的南岸。沿路的天氣是很熱的。世界旅行社在廣告上描寫這條航路要經過熱帶、叢林與富有外國韻事的東方——薩伊德港 (Port Said)、亞登灣 (Aden)、孟買、科倫波、新嘉坡、香港等等。這些地名頗可令人想起各種奇異的國家。但每個地方是歐化的英屬商埠。這條途徑可說是不列顛帝國的航線。在你辦理旅行護照以前，你決不會知道有多少人口蕃衍與文化古老的東方國家——其中有埃及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馬來人——都被那些懸掛英國旗幟的海港所吸收。如果你不想轉到荷屬東印度或在法屬安南停留，那麼一張英國的護照就可以在這種到東方的全部航程中通行無阻了。

這樣說來，中國的四周大半是為日本、蘇聯與英國所包圍。這些國家掌握着到東方的道路，不過中蘇的交通還沒有完全發展。最可令人驚奇的一件事，就是從歐

洲到中國最快的輪船，並非屬於英國或法國的，却是屬於意國與德國的。這些新興的帝國主義者津貼航行迅速的輪船公司，使旅客從地中海到香港的路程只需三個星期，而不必像平常的英國輪船，却要經過四個星期的時日。甚至英商的妻子到印度去的時候，也是乘意國輪船的。在我旅行時所乘的輪船上，也有幾個英商的妻子。同船的還有一個中國編輯，是要回到漢口去的。又有六個奧國醫生，因恐怕希特勒的侵略而出來加入中國紅十字會的。一個美國的商人是要回到上海去整理他這些被日本人破壞的事業。他很熱心地對一位心中以爲『日本人正在中國恢復秩序』的女旅行家說：『他們相反地是世界上最壞的劫掠者，而且中國土匪從來沒有夢想到像日本匪徒那樣的在揚之江三角洲地帶所用的野蠻手段。』船上職員或水手沒有一個表示意大利的政治作用。但當我們經過紅海，沿着印度海岸航行的時候，我們從無線電中所聽到的新聞，都帶着替日本宣傳的色彩。我們在船上水池中，正當十二月的熱帶烈日下游泳的時候。華北的農民却在寒冷山谷的雪地中，赤着足爲保衛家鄉而

戰爭。

新嘉坡——就是印度洋與太平洋中間的門戶——已經使中國的勢力突然衝進了這些南洋的地方。它的宗主權是屬於英國的，它的四周居民是屬於馬來的，但是它的文化是屬於中國的。數百年來，中國的商人與墾殖者曾經向南前進，把高尚文化帶到這些地方去。今日的新嘉坡乃是英國防止日本侵略澳洲與印度的海軍根據地。這個商埠的四周受着日本所有許多屬地的威脅。聽說日本在婆羅洲與蘇門答臘的煤油與橡皮租借地，已建有秘密的飛機場。它的各種金屬礦場是在南洋羣島。它的鐵礦是近着特稜加努（Trengganu），據說那邊也建有秘密的軍械庫。所以日本的勢力已經伸張到歐洲航路中新嘉坡之上。日本已經遣派視察團到阿富汗去。日本的教授也在印度以北的阿富汗軍事學校裏教書。日本人曾幫助起草如何使伊刺克（Iraq）工業化的計劃。埃及、敘利亞、巴力斯坦與赫查茲（Hedjaz）地方的青年阿刺伯人，也被邀請到日本去官費留學。

日本深入非洲與小亞細亞的勢力還只是開頭。但它對於南洋羣島的威脅已經是很嚴重了。到爪哇去的旅客曾經對我述及荷屬東印度的恐慌。他們說，如果較強的国家——例如美國與英國——能夠同意的話，那麼荷蘭人很願意停止把汽油運到日本。他們感歎地說：『我們供給燃料是預備將來自己做奴隸的。因爲中國若使被征服了，其次就輪到我們了。你們美國人也樹立了你們將來的攻擊者。在我們之後，就要輪到你們了。』話雖這樣講，可是在南洋羣島中顯然的反日行動，只是日本礦場裏工人的罷工。在中日戰爭開始以後，特稜加努地方的四千中國礦工立刻罷工。日本人便從南印度雇坦密耳人（Tamils）來做工；等不多時，這些人也罷工了。日本人又雇馬來人來替代坦密耳人；他們後來也能工了，並且請求新嘉坡的華僑予以經濟上的幫助。這些民族以前從未合作過，也不能互相通話；但他們的工人都要起來反抗日本的侵略。

講到這些阻礙各種到中國路線的日本島嶼，究竟有怎樣情形呢？在春天它們是

櫻花盛開的島嶼，到了秋天，就變成菊花齊放的地方。它們裏面的普通人民，是從小受過愛好美術與創造美術的訓練。他們在待人接物的時候，也有禮貌和笑容。我在日本的時候，無論到什麼地方，這些過路的人，都很和氣地讓路給我走。我在東京一家旅館的門廳裏，看見一個很有禮貌的生客起來，對我深深地鞠躬，並把窗口太陽光中的好位置讓給我。他早知道這樣做是可以討我歡喜的。

在這一幅和藹有禮的平民生活寫真中，忽然插入了一段令人可驚的新聞；原來在日本一種著名的報章上，登載了一篇關於『殺人比賽』的文字（見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的大阪每日新聞）。這個故事講到野田中尉在中國作戰時曾和向井中尉比賽，誰先殺死一百個人。他後來發見這件事非常容易而有趣，所以就將比賽的目標增加到一千人。野田很愉快地寫着說：『在華北地方，這種遊戲的快樂，因為疲於追逐敵人而減少。但在華中方面，能夠隨意殺人，毫不覺得困難。……正在我進入南京城以前，我已經殺死了一百零五個人……後來在包圍戰爭中，我又另外殺死了二百

五十三個人。這種殺法是極容易的，但一個人必須盡量屠殺，纔能真正得到滿意。……我現在已經和向井中尉約定，要殺死一千個人。」凡是熟悉南京陷落的故事的人，都能明白野田所說的『包圍戰爭』就是屠殺非武裝的中國人。日本報紙上對於這種遊戲的記載，頗受許多讀者的贊許。

我在東京的時候，曾和一位高等的美國外交家共餐。他對我說：『請常常記着，日本是有兩個的。』

這樣『甜密與光明』的海島，怎麼也會發生這種公然野蠻的黷武主義呢？答案是在日本的歷史。日本並不像中國那些半自治的村莊，只憑着商業來往而稍有聯繫，它却保存着天皇治下一種嚴密的封建制度。日本的封建大地主，不是藉着文官政治，却是藉着武士階級來統治他們的農奴。幾世紀以來，日本兵士總是在平民之上的；但在中國，兵士是被看輕的。現在日本的軍隊是直接由封建制度而來的，日本的人民從來沒有脫離武人統治的遺傳。

當西方工業主義侵入日本的時候，它的上等階級立刻握取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工具。大的封建家族都發起大資本的公司，並且繼續藉着封建的特權與資本主義的財力，而統治平民。天皇的地位是特別的。他是人民所崇拜的神人，也是世界上位最富有的地主與最有勢力的資本家。（據比森 *Bisson* 在他的日本在中國裏說，天皇的家產包括三百八十萬畝土地，其中有森林，農場與市房，共值日金六億三千七百二十三萬四千圓。他在大資本公司裏的股份共計三億圓。天皇的年俸爲四百五十萬圓。）日本有六個大家族，組成了世界上一個最有力的經濟集團。三井統制了二百二十四個洋行，其資本爲六十億圓。三菱統制了九十二個洋行，其資本爲三十二億五千萬圓。日本人民處在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集合的勢力底下，生活非常窮困，非任何別的工業國家所可比擬。三分之二以上的農家，都是佃農。他們要把一半以上的收穫付給地主，並把其餘收穫中的半數，還給化學肥料公司。每年有許多農民總是被迫而把他們的女兒賣給工廠。百分之八十的日本女工，都不能得到現付的

工資，祇好替她們的家屬拔還債款。工業中男工所得的工資，祇等於美國工人所得的八分之一。在滿洲，朝鮮以及中國的日本工廠裏面，工資的標準是更低了。日本人無論到亞洲的任何地方去，他們總把工資降低，竭力謀得足夠的利潤，以維持他們不穩固的社會機構。

這種社會機構，因爲受着封建主義與大規模資本主義的壓迫而變爲腐敗。祇有經過社會的變動，纔能救濟普通的人民。這種變動已爲日本統治者所拒絕。他們却要藉着經濟上，政治上與軍事上的聯合統制，以壓服民衆。這樣窮困的民族，爲了維持軍費所付的捐稅，從財產的比例上看來，比任何國家的人民更重。政府的機構是很複雜的。其中所有新興資本主義的制度，還帶着腐舊封建主義的色彩。除了議會與內閣——就是各種政黨爲了各種資本團體的利益而鬥爭的場所——以外，還有所謂『元老』，可爲襄助天皇選擇內閣的首相，又有『宮內省』，也可以影響那些和天皇有關的國家大事。

日本政府的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在於它的雙重性。大本營與陸海軍參謀本部並不對於議會和內閣負責任，却是對於天皇負責任的。陸軍參謀本部可以不必咨詢內閣而發動戰爭。它能拒絕批准候補的陸軍大臣，以阻止內閣的構成。近年來那些更審慎的資本家，常想藉着議會的勢力來限制軍部的極端計劃，但是這班武人就運用法西斯暴徒式的方法——這和他們封建的遺傳不是十分相異的。在過去幾年中，這些暴徒式的軍人，屢次都用暗殺閣員的方法來改變政府的組織。現在他們不但和封建主義有聯繫，並且也和最大資本家的利益——就是那些重工業與軍火商人的利益相勾結。在近年的選舉中，日本的人民已經表示反法西斯的趨向。但這些黷武主義者是有組織的，而人民却沒有組織的。這班強暴軍人派，藉着封建的遺傳與現在大資本家的勢力，就統治了這種素來被教以崇拜天皇，服從軍人與謙躬有禮的人民。

日本軍人要藉着有效的新聞檢查制度，使國民不知道他們的軍隊如今在中國所表現的行動。我們似乎不能相信，就是日本外交部的官員，也常常不能立刻得到軍

事的情報。我的日本朋友很機敏地告訴我說，他們在中國作戰的目標只是『改變中國的心理』，使它與日本親善。可憐他們還不明白，如果那種軍隊一直統治下去，那麼它的野蠻策略，就會破壞一切友誼的可能性。他們又告訴我說，他們『要救中國人民脫離土匪之患』。他們却不知道，他們的軍隊是在從事有系統的強姦劫掠，與屠殺平民的工作，而在世人的眼前曝露他們的醜態。那些受重稅壓迫的日本小店員告訴我說，他們這樣的犧牲，是爲了『幫助親愛的『滿洲國』』。其實，他們不知道些『受保護的村莊』乃是集中俘虜營的變相。那裏有幾百萬滿洲農民生活在軍事的壓力底下。如果他們對於征服者犯了一些不忠實的嫌疑，就被處以死刑。

在一九三七年的歲尾，整千整萬的日本人深覺不安，因爲他們聽聞了他們的幾個飛行師——他們完全確信由於誤會的緣故——炸毀了美國的巴納號兵艦。他們把禮物送給東京的美國大使，以慰問遭難的家屬，並對『這種可怕的偶然事件』表示深切的歉意。據格羅大使(Ambassador Grew)從美國海軍方面得來的報告說：『當時

巴納號兵艦拖帶了其他三艘美國商船在揚子江上駛，各船都滿載着從南京撤退的美國僑民，並且在船面上都漆着很大的美國旗。那日的天氣非常晴朗，可是有三隻日本轟炸機，六隻戰鬥機，還有兩批轟炸機（共八隻），連續不斷地施以襲擊，因此沉沒了三艘商船，損毀了一艘兵艦。』他知道有二十顆炸彈落在巴納號的上面與附近。有兩隻飛機用機關鎗掃射，其中一隻竟對救護難民上岸的船開鎗。還有一隻日本輪船，滿載着武裝兵士，也向巴納號用機關鎗掃射。據他後來告訴我，他也知道那些和氣的日本國民，因為新聞檢查的嚴厲，都真正以為這是一種偶然誤會的事件。

關於日本軍閥的用意是毫無疑問的。他們要想統治全亞洲，逐走白種人，而獨霸全世界，他們在正式與非正式的文書中已經表明了這種意思。年青的野田在終結他這篇『殺人比賽』的記載時，還希望『越過峴崙山，渡過印度河與直上帕米爾高原』。在軍部所發出的正式小冊子中，曾經宣佈帝國的道德說：『戰爭是造化的父親與文化的母親。戰爭是生命的泉源，並能發展生命。它使個人與國家都得到一種

激動創造文化的慾望」。荒木大將說：『這種征服世界與囊括宇宙的理想……已經成爲我們傳統的政策。……任何國家的行動若不助成我們的帝國主義；那麼我們就要對那個國家予以打擊。……我們帝國的道德……必須傳揚到全世界。』

日本征服世界的迷夢不但是一種理想，並且也作成了具體的方案。最清楚而最總括的計劃，就是一九二七年田中首相向天皇提出的有名奏摺。它裏面列舉征服世界的步驟如下：『要征服中國，我們必先征服滿蒙；要征服世界，我們必先征服中國。……這是明治天皇傳給我們的計劃。……我們得到了中國的資源，就可向前征服印度、南洋羣島、小亞細亞、中亞細亞與歐洲』。這種奏摺雖爲日本官方所否認，但爲私人方面所承認。它的條目已經在許多官方的文件中擴大了。例如，日本政府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所發的聲明書，竟要求中國爲它的保護國。還有陸軍省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所發的小冊子，也可表明他們的野心。日本在侵佔滿洲的六個月以前，關東軍司令本莊大將會經上書給陸軍大臣說：『在我們向前進攻美國以

先，我們的軍隊必須在中國得到一個決定的地位，……佔領蘇聯在遠東的土地，並為我們自身奪取這個國家。」

當我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旅行的時候，一切到中國去的道路，最後要在香港會合。日本人已經佔領或封鎖了中國沿海的城市，他們却不敢封鎖香港，以威脅英國。有一條鐵路（廣九路與粵漢路）從這個英國的商埠香港，通到中國內地——往西到廣州祇有三小時的路程，然後往北到漢口也不過二天的路程——這條很長的鐵路還不過在一年多以前纔完成，却已經把國外大部份軍火運到了中國內地。沿着這條最後的與最危險的『到東方之路』，有幾千幾萬的非武裝中國農民，正在向日本空襲的力量挑戰，並使這條鐵路線繼續通車。

我在廣州市長處坐着午餐的時候，聽見了那天第四次空襲警報的汽笛聲。廣州已慣受日本的空襲。好幾天連續不斷的嚴重空襲，纔使廣州的人民向香港逃避；但是他們並不因小規模的空襲而停止日常的工作。這位市長說：『日本人轟炸平民，

實在是太愚蠢了。昨天他們來轟炸這裏附近的小村莊，毫無軍事的目標，只炸毀了我們廣東人的祖墳。他們豈不曉得這不過替我們把全省的人民組織起來麼？去年這裏的農民對於政府是不感興趣的。他們只想逃避捐稅。但如今村莊已經被轟炸了，就是在江上駛行的船民也被機鎗掃射了。我祇要宣佈我們必須建築『一條反日的公路』，我就可以得到十多萬志願工人。他們在路上工作，每天祇得到兩餐；但仍是踴躍服役，並且還挨戶勸導各人來參加。那就是我們從廣州到香港間作成一條新公路的方法。這條公路有九十哩長，但在二十四天以內就完工了。十多萬農民也用這種方法來答覆日本的飛機。……』這是一個很好的答覆，因為香港的日本通訊社曾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中估計，有五十萬噸的軍火已經從那條公路運到了華中。

依據一九三八年二月中的計算，那條鐵路已被投了一千五百多枚炸彈——到了現在，諒必增加了三倍的數目——然而這條鐵路仍然通車，至少當我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中寫述本書的時候，這條鐵路還是通行着。這是由於數十萬中國農民的勇氣來

維持交通的。在鐵路線上，每隔八哩或十哩，就有當地的人民組織一種臨時修路隊。所以鐵路中了炸彈，立刻就有當地的修路隊趕往被炸地點去把地穴填滿。不到一兩個鐘頭，修理車也帶了枕木鐵軌與熟練的工人下來，便在農民填平的土地上修復了路軌。這種情形，是該路的局長告訴我的。但當我請他講些『英雄故事』的時候。他却回答說：『這一切差不多變成了例行公事——照常的轟炸，照常的損害，照常的修理，與照常的通車。有一次橋樑被炸斷了，我們纔停頓了兩天。但橋樑是不容易着彈的，因為我們有高射砲保護它們。通常的炸彈穴祇需二三小時就可修復了。照現在的情形看來，我們所備的鐵軌，還足以應付一年半之用。只是我們這條鐵路』，他帶着廣東人清算賬目的頭腦說，『剛在去年開始撥付債款的利息，但不幸的很，今年因為修理太多，我們將要虧本了。』

『日本人要費二萬日金把地上炸成一個孔穴，而我們祇費十塊錢，就把它填滿了。』這是廣東的苦工嘲笑日本空襲的一句話。原來中國人經過了幾百年的失

望，還不灰心。若使他們的家鄉被人毀壞了，他們總是要把它從新建立起來的。

櫻花島上那些溫和盲目的居民，必須知道他們在幼年時代所崇拜的神是惡的，並且必須鼓動極大的勇氣纔能把它打倒。祇要他們的軍隊遭遇了無可掩飾的大敗，他們被蒙蔽着的眼睛，就可以打開了。因此，他們也能看清以前的順服贖武主義，實在可以奴化兩國的人民，而引起世界的大戰。

第三章

中國的鳥瞰

我們的飛機從英屬的香港起飛，在犬牙交錯的海岸和削壁聳立的懸崖上飛翔着，下面是一片碧藍的流水；我們折北，從中國的山嶺上面飛過，到達中國政府的臨時行都而為中國中心的漢口，祇需五個鐘點。這條路上很見擁擠，載客往漢口的火車，常因轟炸關係而告遲延。迄目前為止，日本尙沒有攻擊過這條航空線，無疑地，是因爲德國人的關係。

我們的德國飛機師曾在起航前說過，這是他最後一次的航程了，他的三年契約

已將期滿，就要預備回國。我們曉得『納粹』在西班牙，奧國和捷克所施戰略的人，立刻可以認識他在德國的能否謀到好差使，全視他的能否帶些『情報』回去——就是重要的軍事照片。這一項間諜工作是容易的，因爲整塊的大地，就拓展在他的下面。不論他飛到中部的漢口，西北的西安，極西的成都，南方的法屬安南，並沒有一個中國的監察者同他在一起。在許多敵視國家的眼中，這塊土地是何等容易受侵略啊！

我們一小時一小時的從幾乎人跡鮮至的山區滑翔過，因時在冬季，山區顯出一片灰色。穿過這些寂寞曠野的，是一些河流山谷，倦伏着農場與村莊。但這些地方也不多見，到處似乎是空曠無人的。這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國嗎？於是我們記得南部的中國是『八分山，一分水，一分平原』，即使將山區台地包括在內，可耕的面積尙不到五分之一。正唯因爲這土地的不可居留，所以人民的生活必須集中在沿水道的一帶了。但這叢山之區，却可以用作避難所。四千年來的迭次侵略，雖掃

蕩了華北的平原，但這起伏不平的南國，却很少爲人所征服。

讓我們將中國作一鳥瞰——空間上和時間上的中國。它位置在亞洲東南部的蔭所，四週有自然的屏障相隔——熱帶的叢林，地球上最高的山嶺，最寬闊的沙漠和最大的海洋。它東南半圈形的海岸，突進了南太平洋的水流，吸取溫暖的雨水。在西南，它有馬來叢林的包圍。西至西藏，希馬拉雅山的重嶺，就在此將它和印度隔開；最低的山道尙比歐美最高的山峯要高。向西北，直趨至土耳其斯坦和蒙古的高原。這是一塊二千哩長的荒原，只有幾條危險艱難的駱駝可行的道路。祇有北面由內蒙古和滿洲的邊疆平原，才能接近中國本部，每隔數百年，侵略者就從那裏入侵中原。但中國本身的文化勢力——有時是政治統制力——常超過此種屏障數千哩，在這屏障以內，是『中國本部』的一百五十萬萬哩土地，約當於美國幅員的一半。

現在我們正循着一條廣闊的河流向西北飛去，周圍點綴着城市鄉村和農場。這就是揚子江——亞洲最大的一條河流。它的本身和支流就灌溉着二萬萬中國人民的

農地，也就是營養着世界十分之一的人口，這條河把中國一分爲二，自西藏的高山向東流到太平洋；它兩旁最大的流域就是中部中國。正在其北並與其平行的那座危聳的秦嶺山脈恰好形成中國兩部的氣候分界嶺。

在這山脈之南——一直南至廣州——是一塊多山的區域，將豐富的雨量引流入河湖之間。因爲多山多水的關係，所以這裏的旅行是很困難的。先經海路河道到幾個主要中心點，再由石砌的道路步行經過麥田，自小山間走至山道。最近那裏開闢了幾條車路，但爲數尙不多。因此南部的中國分成了許多不同的區域，老住着各種說不同方言的種族。對於華南各省，長江及其支流就是一條大道，但極南的三省，有海岸及別的匯合於華南廣州大商埠的河流可通。

華南的每一塊平地：都被儘量耕植過，在較小的山上都有台地。半熱帶的氣候直達華南各省的地帶，這使得堅苦卓絕的中國農民，能在一年內收穫二三次。最大的平地區是在三處地方：南方的廣州三角洲，中部海岸的揚子江三角洲與湖江一千

四百哩而至西部四川省的紅色盆地。這幾處地方，都可算是世界上最發達的農業區域。中國還有長約二十萬哩的運河——號稱『陸海』——大半是在這些區域中，尤其是在揚子江三角洲。那塊紅色的盆地，因為地勢孤立的關係，要比其他二區少為外人所知道，但這裏的收成自麥至稻，自甘蔗至棉花，無不盡有，可以供養每平方哩二千一百五十人。這是地球上一塊最可愛的園林，它的山區台地以及二千年前偉大工程師李冰所建的灌溉運河，是頗有些名氣的。

秦嶺山脈以北的華北，對於我們上面所描寫的中國部分，恰好是一個自然對照的典型。這裏沒有南太平洋吹來的溫暖潮濕的微風，有的是從中亞沙漠中捲來的灰塵的暴風雨。這裏的土地很豐肥，却是雨量不定。在西北，離沙漠最近，土地也最乾燥，就是『黃土』的高地，為風捲成的幾百尺深的泥沙。雖然土地無限豐腴，這裏却是一條『飢荒帶』。水很少見；僅在鬆泥的河床中流過。

這就是著名的黃河流域，淤泥是那麼擁塞，所以好像一半是泥漿，一半是水。

它蜿蜒而南，經過晉，陝兩省之間，然後向東越過河南的中部平原，以至魯省沿海區域，這區域就是幾世紀來黃河自亞洲中心挾土下海築成的。這建築的過程，就是人和自然不絕鬥爭。這條河每隔百年，把水泥的底層增高，超過周圍的平原，中國的勞苦羣衆，就築堤來防止洪水。但在黃河漲水時，尤其在戰爭或變亂將人民歷年的辛苦摧毀時，洪水就衝破堤岸，將數百個農村一掃以去，不過留下一層豐腴的沃土，讓後代的子孫來耕植。

中國的各部，不論是南是北，都居滿了人民。在中國平原區居住的人民，恐怕要比世界上任何同樣的區域爲多，其中五分之四是農民——地球上最勤儉耐勞的農民。四千年來由於生存的逼迫，他們已努力深入到每一塊可耕土地的角隅。憑着開發運河和台地，他們改觀了自然的外表。『億兆的男女，對於山林谿谷的外廓，田野農場的規模，都盡了他們的貢獻』（見Cressy: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在中國的墾植各區，那些穿藍布褲子的農民，似乎構成了風景線的生動部分；四千

年來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已使人與自然相適應。

這輩勤勞的農民，利用了每一種資源。土地給經濟化了；低地有防堤保護，山地闢有台地。許多河道湖底，在幾代前就被改變為耕地。道路在北方是很狹的；在南方，它們都縮為人行道。水也是經濟化的，同一的運河既可運輸，也可灌溉很多的土地，河底掘出來的淤泥，還可當肥料用。人糞和獸糞都被利用了；還不辭艱勞的從城裏去收集來。他們利用副生產物；稻草禾桿或作建築材料，或當燃料。憑着堅苦耐勞的工作，熟練的經驗，對於土地，水，人糞，獸糞等的經濟使用，中國農民在四千年來耕種過的同一土地上，仍得良好的收成。

這輩四十世紀來的農民，每一代都靠他們周圍土地所能生產的東西為生。在北方，房屋都用泥造，在南方則用竹子編成；兩者的外形都是自然的形成，和當地的風景難以區別。屋頂用稻草蓋成，窗戶是用紙做的。紙為中國所首先發明，這種紙窗雖不能透視，却可透光。十年前，我在中國西北的農村裏，曾發現尚有人沒有見

過玻璃這東西，他們認爲我們轎式汽車上的玻璃是一種魔術。在黃土的高地，堅硬的泥土可以砌成直立的削壁，人民都是在山岩中掘穴而居。他們會告訴你，這裏是『冬暖而夏涼』。在這山崖上面的田場中，有許多煙突矗立，因此農民們在收穫時可以望得見他們家裏的炊煙。今日這些山崖的房子又另有一種優點，卽是可以躲避空襲的轟炸。

由於幾百年來的生存鬥爭，中國農民對於食物的經濟，已有深刻經驗。他們在收穫時，希望每天有三頓飯吃；但在冬天則減少至有限的兩餐——南方吃米，北方吃小米和麥，再加上一些菜蔬。肉是節日的稀有珍品，所以把肉切成小片，俾能儘量享受肉的美味。食糧的供給，甚至影響及農村的運輸。例如在秣草豐富的北方，就有家畜拉的兩輪車子。但在南方狹隘的谿谷區，每年有三季收成，當然捨不得將地種草；因此南方的運輸是靠內河船和人力背負，因爲人力比飼養家畜還便宜。

幾百年來，對於燃料的經濟也有了深刻的教訓。在寒冷的北方，房子都是朝南

建造，這樣可以獲得太陽光而避免來自西北的刺人的沙漠風。屋內的一半地方是給「坑」佔據了，所謂「坑」，是一種泥和磚砌成的平台，離地約有二尺高，或由家用的火灶加熱，或由屋外生柴來加熱。這稍稍增加了屋內的全部溫度，尤其在晚上，那時「坑」就是一家老小睡的牀。即使是在零度的天氣，中國農民也不過分使屋子內加熱。凍僵的手只靠火盆裏面的一些炭火取暖。身體的保熱，就靠一層層的棉衣，這比我們的羊毛絨衣要暖熱得多。在上年冬天，這些棉襖救了中國無數兵士的生命，因為這些棉襖是非常厚的，只要來勢不太猛，竟可擋得住流彈碎片。

幾代以來，中國也學得了怎樣寶貴每一塊金屬片和木片。因為北方木頭特別少見，所以在建築上僅供頂柱，棟樑與門窗架子等使用——這一切都是家族的遺產，每在泥牆崩頹時，它們仍是一代一代地傳下去。灶是用泥磚砌的。我還記得看見過一種可以攜帶的泥製爐灶，用一個鐵絲架子圍住，這在山西時，就供燒水給我們喝茶之用。我們的主人，每隔相當時間，就從灶頂上中間的一個二吋大小的孔中下

一片炭去。在那小小火焰上面，用三塊小石子攔着一隻闊底狹蓋的小銅壺，其攔空的高度，剛好容火上升。灶和銅壺的形式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都極配合，務使可以利用每一灼熱氣。在夏天，這爐灶很容易可被移到戶外去。夏天爲使房子蔭涼起見，窗上的紙張就可揭去，如果主人闊綽有錢，就代以一層薄紗。

因爲土地既是生活的資源，而由家族勞工共同耕植，所以幾百年來土地將每一個家族緊緊地聯合在一起。這是一種家長制的家族。那『家長』指導他兒孫輩的工作，並統制他們的生命，那怕他自己已至不能工作的年齡。等到兒子長大起來，家長就爲他們迎娶妻子，用泥牆或板壁隔出一間房子來——讓他們做居屋。從祖宗那裏接受土地以後，這個家族就替兒孫保存着，並且改良土地，好使他們日後賴此生活。父母死後就被葬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在家堂的牌位上，他們仍舊構成家族一部，子孫對他們慎終追遠，永思不忘。

這些自給自足的大家族，都住在農村裏面。從各家族的家族中選出村長，他們

主持共同生活和別村的關係，例如灌溉與水的供給以及小商業的往來。農村的生活至今還是很少改變的：每家務農，世世相傳，人到髮白，從不出外。他們真是所謂『生爲村上人，死爲村中土。』

但在這外表和平的鄉村，仍難免有尖銳的階級分裂。富戶變成地主，佃農和雇農均受其榨取；他們也是重利盤剝者，榨取強盜式的利錢。歷年來備受旱災的貧苦人家，只得鬻賣女兒爲奴婢。鄉村的行政官吏，唯富者之命是從，對待貧農不講公道。幾百年來農民暴動和土地改革相繼而起，但從封建時代到現在，千百萬的勞苦農民一直受着榨取。現今中國——尤其在南方——自耕自地的農民還不到一半。

中國有這三萬萬農民勞動爲基礎，就產生了舉世罕見的最有持續性的文化。他們憑着耐苦的勞動和簡陋的生活，就有剩餘的能力。在這種剩餘上面，便產生了手藝，商業，發明和藝術。於是圍有高牆的大城市，廣大區域的商業中心也起來了。在這種大城市裏面住着富商，學者，軍事統治者，若干大地主，他們從勞苦的農民

的身上吸收捐稅，利息，地租和利潤。手藝在他們間的發展，已至舉世無匹的程度。特殊的中心產生特殊的生產品——精絲，珍貴的木器，毯子，精美的磁器。在幾百年前，這些商業曾經越過亞洲大陸，直到那些將來會成爲歐洲的地方。

中國的歷史是一部文化發揚史，而非帝國侵略史，雖然有一個時期它也是一個遠征的帝國。它並不像現代國家那樣的，由各種有共通的文化，語言，藝術與傳統的民族相結合。中國發源於西北黃土高地，逐漸向南方散佈。二千年前，這種文明征服了長江流域，向南展至廣東，更進而傳到南洋。它在西方和北方，越過沙漠，比歐洲能越過這些區域要早好幾百年。

在三千年前，中國就有了灌溉工程；二千年前所建立的偉大工程，現今在寧夏和四川的赤土盆地，仍舊發揮着功效。關於治水計劃的成文紀錄，在二千多年前就有了；今日在『省府誌』中仍舊可以見到。中國人最早使用航海指南針。他們是火藥和蠶絲業的發明者。在基督誕生以前，他們就有了關於醫藥和人體的研究書

籍。二千年前，他們的軍事領袖已討論到軍隊應該預藏大批糧食的重要性。古代皇帝爲防禦北狄所建的長城，可說是世界最大而持久的堡壘。爲便利食糧輸入，費數百年勞力開闢的運河，現在不失爲世界上最長的人工河道。

凡因新土地的發展，或新生產工具的發明，而使中國的剩餘財富增加時，或因土地一度平均分配而使平民財產增加時，中國就產生了一個社會安定而文化煥發的偉大時代。有些興旺的朝代可以維持幾百年，那就是詩，繪畫及學術的黃金時代。來自北方和亞洲沙漠的游牧民族，常要壓迫此種安定的文化；尤其在政治腐敗而引起了內部分裂的時期，他們就來侵略而將此種皇朝顛覆。朝代起伏相繼，政治統一之後便是衝突，隨着再見統一；但在數百年來的波浪起伏中，中國的文明領域仍然堅挺前進。藉着軍事征服，和平侵入，商業交往，或使征服者同化，這一文明將許多種族，部落，家族，語言溶化成一個近代的中國——這種事業，不論古代的羅馬或近代的不列顛帝國，都未曾企圖過，更談不到有多少的成績。

明
。

在這四千年中，直至最近的一世紀爲止，中國從未接觸過比它自己更高的文

第四章

四千年來的傳家寶

趁我們的飛機還在揚子江上空滑翔時，讓我們來考察一下在我們下面的那塊數千年來橫掃地面的區域。遠古的時代，憑着傳說和遺傳，仍舊影響到今日的模型。

現在這塊人口興旺的長江流域，在四千年前還是一座灌木叢生的澤沼地，全世界還沒有足以清除這塊地方的鐵器；可是人類已經在較乾燥較寬闊的北部耕種土地了。在河南中原的商朝帝王，已經曉得使用銅器。粗劣的灌溉工程，也為周朝王室完成在黃土的區域，就是今日的陝西。經過了一千年的勞働後，就出現了一部詳述

中國封建社會的可靠紀錄。當時雖然還沒有土地買賣，但農民已經一面爲其家族耕種『私田』，一面爲其諸侯耕種『公田』了。在紀元前七七一年，周都被那來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所洗劫，在嗣後的五百年間，中國的諸侯們互相爭鬥。鐵器的使用給發明了；牛也被用以耕地；於是剩餘的財富和王室的權力也隨之而增加。

中國的統一，倒非先見之於政治上，而是在於文化上。在紀元前五百年，中國產生了『諸子百家的哲學』，恰相當於古希臘的哲學時代。在這兩個國家中，相隔又那麼遠，彼此又不相識，却發生了一個相同的問題，就是在今日的我們，也並不十分陌生。各個的小國雖在戰爭中，但仍舊感覺到自己是一個文化的一部份。因此當時的哲學家，要想搜索一種能將全體團結在協和統制下的道德原理。古代希臘和古代中國的哲學家雖都創造出一種共同的文化傳統，可是未能補救政治上的罪惡。

孔子的聲名是舉世皆知的。在西方，大家都曉得他是一個倫理的導師，他在紀元前五百年，已提出了一條消極形式的黃金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中國，

大家認爲他是一個聖人。他曾在家族基礎上闡發出一部社會倫理學。他要在封建戰爭中覓取穩定而非變易，他發見穩定是存在於舊式的家族社會中，因爲在一切的駭浪驚濤中，家族社會總是不屈不撓地走在前面。他對於根據家族制度的廣大社會生活，要實施一種可以保證家族嗣續的統治與服從的關係，以及一種堅定周密的相互關係。人的主要責任就是在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間保持『倫常的關係』。他的所謂倫常是指着穩定，傳統與福利的關係。他以爲人民的叛亂，係由於統治者的過失，因爲『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見論語）蔣介石爲西安事變而在民衆面前自責其督率軍隊無方時，他就是想到了孔子的教訓。

古代有些中國哲人的話，是和現代的論調很相近的。孔子的反對派墨子（紀元前五世紀）宣傳一種超越國家與家族的人類愛。他以爲別國的人也可算爲自己的兄弟。他的斥責戰爭，確是帶有近代性的：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之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見非攻篇）

別的許多學者，也有同樣無時間性的言論——例如，紀元前二〇八年的荀子，曾說：

『大天而思之，

孰與物畜而制裁之？』

又如紀元前三世紀的莊子，在默思到終極的現實時，曾說：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見齊物論）

這種思想的精華斷片，經二千四百年而傳到我們。但封建諸侯時期的結束，並不是因爲有了這種哲學，却是因爲紀元前二二一年，在現在的陝西地方，產生了一

個統治全國的第一個皇帝。他是一個鐵腕的獨裁者。他廢除了自己國中的封建諸侯，建立了一種比較自由的階級關係，田地的耕種者得以米穀繳租，不必代以勞役與租稅。他又擁有最大的灌溉運河，以及較新近發明的鐵器，因此農業更能生產了，他的統治權力也大大加強了，使他能征服敵國，而立自己為始皇帝。他命令全國革除封建的特權，創造了一部統一的法典，一種統一的文言，統一的衡量制度，甚至統一的車軸，使得一切農民的車子，都能在相同的車道上行走。他擴張了未完成的長城，從一千四百哩外的大海直展至西部叢山，對於入侵的部落，形成了一座可怖的壁壘。他很殘忍地強迫千萬的囚徒與退伍兵士去服役，就在民間引起了憎恨。他的焚燬典籍，也引起了學者們的痛惡。這雙重的憎恨，在十五年後就顛覆了他的皇朝。這是在他兒子時代的事，他自己僅在位十一年。從這短短幾年統治中，他留給後世一個統一帝國的觀念和一個暴君的聲名，甚至在兩千一百年後的今日，中國人提起他來，還表示痛恨。

一個普通的兵士首先揭竿而起，把這第一個獨裁者傾覆了；全國被壓迫的農民和兵士，都『應聲而起』。一位出身卑微的劉邦，經過了七年的鬥爭，就坐了大漢創業皇帝的寶座。漢朝乃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帝國。它的擴張權力，全靠偉大灌溉工程的建設，普遍使用新發明的鐵器，以及由此剩餘財富而來的商業。商人變成富翁之後，就購買土地，擴張勢力到新的區域。這些勢力對於粉碎封建主義的功效，比皇帝的命令要大得多。劉邦和這新興的商人階級融爲一體，他是個現實主義者。相傳他打敗仗多於打勝仗，但他在最後決戰中不吃敗仗。他對於社會和政治力量的意識，常常保證了他的最後勝利。他通過一條法律，規定所有的兒子應從父親那裏平均分得遺產，這樣一來，就逐漸消滅了封建家族，因爲家族化爲衆多，就小而無力。他以學識的資格，而非封建的級位，來定高官厚爵；凡深悟哲學倫理的人，可供職於政府，因此他就取得舊學者和新商人的雙方擁護，並在封建主義的廢墟上建立了一個新社會。在這社會裏，人們可憑經商而致富，也可憑博學而做官。

漢朝發見了西部，就將這地方征服了。在紀元八十年代，一個叫做班超的有名官吏，使漢朝的統治勢力，越過了土耳其斯坦沙漠。他大半藉着威望，並利用各個部落爲他作戰，猶如今日機敏的商業資本所爲；後來有五十個『王』都先後歸順了，七萬的中國兵就達到裏海的東岸。和當時的羅馬帝國，只有裏海和亞美尼亞叢山相隔。班超曾差遣一個使者到羅馬帝國去訪問，當時（紀元九八年）羅馬帝國正在最興旺的時候，但帕提亞的嚮導人把這使者引錯了路，他便走向南方，經過亞洲而至波斯灣。因此這二大世界帝國對峙相存了一個時期，但由於中間部落人的狡猾，兩者始終未能碰頭。

不過當時的商業仍舊越過了這一切的邊界。中國的絲、寶石、漆及藝術出品，都深入羅馬帝國，甚至深入英國的海岸，那時的英國是北海中的一個孤島，美國人的祖宗爲逃避該撒的軍隊而經叢林逃到那裏。中國的絲業是古代最大規模的商業。不過這一點却終於成爲漢朝的禍根。這些近古的統治者，在廢除了封建主義後，就

遇見前所未見的種種新問題：貨幣的貶值，價格的不穩，以及國防的費用等——這一切問題，在用現貨或勞力償付的封建時代，都可無足關心。鐵商和鹽商比封建君主都有錢，並用他們的財富買了土地，於是一種新的半封建主義就發生了。在富商和官吏所有土地上耕種的雇工和佃農，就大受他們的榨取。

漢朝對於這種數百年來的罪惡，曾經下過一番苦鬥。當劉邦初當國時，就宣佈三條簡單的律法，確立一個自由精神的政府，取代第一個獨裁者所立下的鐵則。他的約法三章。就是：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見史記）

這就是自由貿易高潮所表現的自由。但不久就證明了這些法律的無效性。大約在那時代，大地主制和佃農制的弊害益見嚴重了。在地租，捐稅和債務重壓下的民衆，所受的痛苦，也大大威脅了帝國的興旺。於是王莽——一個反對地主的進步皇帝——就起來了。他命令將一切土地歸爲國有，並在國家保護之下，將土地分配給耕者。他

又命令將工業和商業歸國家統制，使『貨物更得平均分配』。在紀元二三年，那些富豪和權威者就將他刺殺了。

在一個主要財富得自小規模農業的社會中，無論那一個皇帝的努力，都不能反抗這種社會裏的經濟法則，因此造成了大地主義，農民的負債與叛亂。破產的農民流爲土匪，猶如今日在重壓下的他們一樣；帝國逐漸衰弱，於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就入侵了，但在漢朝數百年中，所凝成的種種變化，就成爲後來統一中國的永久因素：統一的文字，將哲學藝術和科學當作共同的遺產保存下來，以及永恆官制——就是不論封建的門第，只講學術的程度——可使一切階級的人，至少在名義上都有進入仕途的機會。隨着漢朝的傾覆，雖經過四百年野蠻人的侵擾和內戰，却沒有陷於歐洲黑暗時代那樣的黑暗。因爲過去的記憶從來沒有喪失過；文化的統一也是持久性的。

帝國分裂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長江三角洲和四川盆地的變爲獨立區域。勤勞的

中國農民，利用了鐵的工具，逐漸拓展到瘴氣叢林之區，這些區域一旦廓清，收穫當然要比舊有的乾燥土地來得豐富。歷史上『三國』內戰的基礎，就產生在這裏，那一時期的內戰，就是四川和長江區的軍事領袖和北方的統治者相戰。中國再經過幾百年的混亂，又變成了一統的天下。野蠻人是被同化了，由此而來的新勢力，就變動了思想，也刺激了藝術。經過了數十年的隋朝嚴厲統治後——隋朝曾征服它的敵人，完成了運河的工程，並強迫實施文官考試制——中國在它擴大的肥沃富饒的土地上又歸和平，走進了黃金時代。

唐朝（紀元六一七——九〇七年）的興旺煥發，使得中國再度成爲世界上地域最大而人口最多的國家。這一朝不再像漢朝一樣，立脚於初期商業上的民主主義的雛型了。唐朝的第二代皇帝李世民（太宗）——實際上就是該朝的真正創業者——是一個新興大家族的王子，和另外的兩個王族間有締盟關係。他是一個學者，一個行政者，也是一個藝術的保護人。對於一個厭倦了戰事的社會，他是一個命運的主

人，也是一個帶來國內統一和平的天使。在位的第六年：他就實行土地再分配，這就保證了國家的興盛。土地分配在範圍上是有限制的，不過『永久』給與實際的耕地者；而對於土地的購買亦沒有限制。文官制改良了，考試制度也擴大了，中國第一次分成了省份，其所劃分的界線要比今日的更爲合理。由於農產物和政府效率的增加，帝國及其財富也大見擴張。在紀元七四六年，就是在唐朝統治了一世紀以後，中央的財庫可以收到一二五、〇〇〇鎊的銀子，一、〇〇〇、〇〇〇噸的穀，七、四〇〇、〇〇〇匹的絹，一、八〇〇、〇〇〇卷的絲，與一、三五〇、〇〇〇匹布。那時的中國南面展至馬來羣島，西南經過西藏到達今日的阿富汗地方而與回教帝國相遇。

當時唐朝的京都長安——就是現在的西安，不過地方還要廣大——充滿了光明燦爛『四海一家』的景象。在這一朝的三百年間，出了四千個詩人，繪畫亦極發達，雖然因後期的侵略，很少留於後世。首都中擠滿了來自各處的民族人種——從貝加

爾區來的西伯利亞人，印度叢林的人民，以及希臘人，阿剌伯人，波斯人，日本人等。日本在那時剛在開化，他們熱切地採納唐朝的高度文明。廣州是當時阿拉伯人經營海產的大中心區，他們將貨物從那邊運到歐洲。雖然歐洲人除了接受他們的貨物外，對於中國不曉得甚麼，可是當時有一位中國的旅行者，却曾描寫過君士坦丁堡的情形。

在歐洲，當時是一個宗教戰事和虐殺的時期，可是李世民皇帝對於人類靈魂的各方面努力，都一視同仁。他本人就研究各種有用的智識；照中國人的傳統見解，哲學和倫理的思想，對於皇帝比戰爭更有價值。唐太宗對第一個基督教的傳道者——他的名字叫『阿羅本』——曾經這樣說：『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宣行天下。』(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序文)他同樣款待佛教的使者，嘉納道教，贊成孔教和容許波斯拜火教。他的

寬容，是他的國家和時代的典型。

像李世民所建立的文化黃金時代，穩固確立在如此廣大文明的領土上，在世界史上是很少見的。雖有外敵迭次入侵，終於顛覆了這一朝代，屢次洗劫京城，毀滅許多無價繪畫，但並沒有妨礙到文化的繼續。在變亂的時代，學者和藝人都逃到南方，特別是四川——今日中國的許多學者藝人，也都遷到那裏，經過五十年的混亂紛擾後——北方特別受其影響——出現了另一個偉大朝代，那就是宋朝。宋朝統治中國達三百年，首先則統有全部中國，後來因為未開化民族的入侵，其統治範圍逐漸限於南方。隨着帝國版圖的縮小，唐朝傳統的活潑的動力，逐漸變為纖美性質，不過藝術與學術仍很發展。繪畫到了宋朝已臻登峰造極之境，這是在蒙古游牧民族蹂躪東方世界以前的事。

但在這兩大朝的六百五十年間，內在的弱點發長了，結局就促進了他們的衰亡。在唐朝的初代精力消耗還不到一百年，詩人們已描寫戰時農民的慘痛，而其用

字的大胆自由，殊堪驚異：

『……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千村萬落生荆杞；……禾生隴畝無東西。……被驅不異犬與鷄。……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見杜甫兵車行）

另一個詩人，也是農村的一個官吏，他將自己的命運和一個手中抱着孩子，跟隨在收穫者後面拾穗的婦人相比：

『……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遺穗，左臂懸弊筐。聽其相顧言，聞者爲悲傷！家田輸稅重，拾此充飢腸。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見白居易觀刈麥詩）

從詩人的詩中反映出來的逐漸增長中的階級衝突，也可說明那時長江流域的土地，已達到了最高的發展。正像現代的美國一樣，已不復有自由發展的土地。那些

規定在耕者間分配土地及限制土地購買的法律，不久就被漠視，最後終於撤廢。那時的中國，就和在羅斯福治下的今日美國一樣，撥巨款推行公衆工事，藉作救濟。有一份包括四十三縣的報告，曾記載在一年間（一二七四年），有過二四、四五一次治水計劃，灌溉田地達七五二、〇〇〇英畝。宋都遷至長江三角洲地帶的杭州，人口和土地的需求都大大增加了；於是築渠修閘，普遍利用河床湖底。不過那時的詩人明白指示這些土地，都落在貪官污吏的手中，他們榨取小農，改增捐稅，自己則數十年間，在這些豐腴而未登記的土地上，避免捐稅。灌溉的農業需要，水的集中管理，以及個人對於土地的愛護；但土地的私有制度，就阻止了前者，並妨礙了佃農。這事成了宋朝長江流域的問題；而也是今日的問題。

宋朝的不能解決這種問題，並不是由於缺少聰明的思想。二大學派已經發展成爲兩大政黨。它們互相競爭，達數百年：一面是和儒家及上層階級結不解緣的保守黨，一面是平民先鋒的維新黨。初期維新派之一的王安石，在當權數年中曾經嘗試

大胆的實驗，而且對於當代的問題很能洞燭其詳。他用國庫的錢，低利借給農民，以秋收爲担保；這就是世上所知的『青苗法』。他廢除了公衆工程的強迫勞動，因爲這使窮人負擔太苛，而專向富者徵稅，以償付雇用的勞工。他又採取價格固定制，並限制商賈的利潤爲五分之一；但保守派一旦當權，將他的法律一概掃除。一百年後，野蠻人的入侵，使各派同歸於盡。

好戰的蒙古游牧民族，在十三世紀中侵入了中國的居留地帶，因爲那時國內的腐敗和不安，中國已經很衰弱了。他們將西北部分的人民消滅得那麼徹底，甚至偉大的灌溉工程，也不再存在了，因此許多城市永遠變成沙塵蔽天的景象。南方總算倖免了侵略的慘禍，而保持爲中國文化的中心。這種文化，就是蒙古人也樂於採取。他們在北平建立了一個新都，並以新建的運河和南方相交通。

在蒙古皇帝忽必烈的時代，馬哥孛羅從歐洲越過沙漠荒原。那條路上的部落已給蒙古人毀滅了。馬哥孛羅發現中國的文明遠比他的故鄉威尼斯爲高，他特別注

意中國人製造金屬品的技能；他把關於『火石』的故事帶回歐洲。其實煤炭在中國已經使用了一千五百年，可是馬哥很爲驚奇，他對揚子江也會寫起過：『我可以確定告訴你們，那條河是流得那麼遠，經過的地方那麼多，在這水道中來往的商品財富，超過一切基督教國家的河流』。

馬哥孛羅的年代，到現在已經有六世紀了。在蒙古人的元朝以後，還有兩個朝代。一個窮苦中國農民的兒子起來建立了明朝。他的統治權從破碎的蒙古帝國擴展到北方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又伸張到滿洲的奉天。那時的中國人，從海中冒險深入斐律賓，印度支那，安南與南洋羣島——他們不但去經商，並且也去找新的殖民地。那些日本海盜受了本國貴族的支持，在明朝時代出現於中國的海岸，專門從事搶奪財物與擄人勒索的勾當。歐洲的葡萄牙人，荷蘭人與英國人的海上貿易到達了中國的海岸，但他們的舉動也是海盜式的。中國在明朝時代的版圖，比以前任何朝代還要大。在明朝以後，滿清帝國的疆土更見擴大；它包括西藏、土耳其斯坦、蒙

古、朝鮮、緬甸與安南。但是文化却變爲硬化呆版，毫無變動的生氣。因爲舊的生產方法與舊的社會基礎，若一直保持下去，就不能發生真正的變動了。於是這種穩定的制度却維持了好幾百年。

中國文化的光榮並不很快的消衰。在十八世紀中到中國來傳道的法國教士却說它是世界上最光榮的帝國，並且能超過法國偉大君王時代的壯觀。當西方在美法大革命的年代，正是中國在這位學者詩人與藝術家的乾隆皇帝統治下的六十年太平時代，在表面上，那時的光景也有唐代初年的盛況，可是在它的骨子裏，却是思想的壓制，文化的停滯與民情的腐化。文官的考試制度本想提高官員的學識程度，却變了呆版腐敗，而甚至准許滿洲人名列前茅。以前的皇帝，都切心追求最好的外國知識，但現在却把外國人攆在門外。科學被認爲非孔門之學，而遭輕視。滿清政府與中國的上等階級，在過去的祇學會了一樣事情——任何變動是要使他們傾覆的。

所以中國雖有四萬萬勤儉、耐勞、敏捷、老練的農民，却變成了世界上的一種極

無變化的表象——就是這種以極無變化的貧乏爲基礎的極無變化的壯觀。文明的領導權，已經在十九世紀中讓給西方科學和機械發達的國家，從這些地方帶來了揚之江流域上面我們所乘的飛機，以及我們望到下面所看見的工廠煙囪與江中輪船。

第五章

西方侵入了中國

我們的飛機在萬餘間低小而蹲伏的屋子上面斜下來，這些屋子被幾條大河劃成了武漢三城——漢口、武昌和漢陽——那是長江流域工業的中心，也是中國的芝加哥。因為戰事把漢口的飛機場收回自用，所以我們就在武昌城降落。在一片粗糙而潮濕的場地上，我們被一個中國官吏所迎接，他不注意我們的過期的護照，却很客氣的要求我們的名片。接着我們就目睹很擁擠的人羣，千百家低矮的店面，和一個擁擠的街道，——因了許多防寨和避彈室的建造而愈見擁擠了——到最後，我們就

到了一個簡陋和擁擠的渡口。

經過半小時的搖擺，在寒風逆着泥漿似的江流，我們的渡船到達了漢口，在那邊我們特別感覺到西方侵略的影響。在沿江的一條現代化的街道上，設立了紐約國家銀行和英人的匯豐銀行。江濱的幾條街道，有的用英文名字，有的用法文名字，有的用德文名字，有的用俄文名字，有的用日文名字。這些國家，至最近為止，都在漢口近江區域，擁有一部分地段，叫做『租界』；在那邊，有各國所設立的領事法庭，代替了中國的法院。到現在，祇有街道名字和幾家商行名字還存在着；至所謂『租界』，除法租界外，都已歸還中國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漢口是在發動一次戰事，並在組織一個國家。在這裏，那浩大而多方面的中國人的生活都在完成它的新基礎。現在因為上海已經破壞，武漢三城，就成了現代中國工業最大的中心。旅客是從各方面『不遠千里而來』的向這個中心推進，它們有的取道長江或漢水方面的古道，有的取道那偉大的從南

到北的現代鐵路線，這些旅客是從各方面而來的：——包含北方乾燥的麥田，南方潮濕的稻田，和築有城牆舊式的市鎮。但現在蒼萃在漢口的却是一般難民，和從各戰場而來的多數軍事代表。在那邊也有勇敢的男女，同那動搖的政治家的屈服論調奮鬥；人民愛國的熱忱是在和那無效能或混亂狀態奮鬥。但漢口人的奮鬥精神，已被許多外國人的壓迫所分裂，特別是沿江的幾個舊租界。舊日德租界的屋頂上，佈滿了極大的卍字旗，目的是在阻止日本飛機的投彈。那空着的日租界已被中國新軍隊和政府的各部分所佔據了。法租界仍在法國法律的統治之下，似乎是空襲時代最安全的地帶；在那邊擁有房屋的人往往把他們的房屋出租給一般避難者。漢口往往被許多含有刺激性的事實和無數謠言所撥動，而那些謠言，乃是由好幾國の間諜和代理人所散播的。

那些能發展並妨礙中國工業生活的外國人的壓迫究竟是因何而來的？那是出於西方人的意志，而不是由於中國人的自願。數百年以來，歐洲人是在尋求中國最優

美的出品，如絲、瓷器、碧玉、漆器、和茶葉。但中國人因爲千餘年來都在歡迎阿剌伯和波斯的商人，對於歐洲人却覺得沒有多大需要。他們把早期的歐洲的航行者看作曾經搶劫中國海岸的日本海盜，所以不准他們在文明的國家中活動。他們有理由作這樣的猜想，因爲從一五一七年起——那時葡萄牙的海船輸入廣州口岸，並得了當地府台的允許而得自由經商——從歐洲而來的冒險者，往往會乘機作海盜。無論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或西班牙人，都會搶劫中國駛往菲列賓去經商的海船，並搶劫中國沿海各城市，把當地居民看爲『異教徒』，所以把他們屠殺不但是合法的，而且是有利的。到菲列賓來的西班牙人，曾把居留在那邊的一切中國人全都殺害了。

因了這緣故，所以當英王喬治三世在一七九二年——就是他被美洲殖民地戰敗後不久——遣派一位使臣到中國請求乾隆皇帝准他們經商時，那位沈靜的而含有詩人氣味的皇帝，就回答說：『我們天朝是什麼東西都有的，而且是非常豐富；所以

我們無須國外蠻族把他們的製造品輸入進來。」他又很客氣地原諒英王喬治對於中國的不了解，他說：『我並忘記你們島國的孤獨，因你們是被一片汪洋所攔阻，而與世界各國隔絕的；我也不忽略你們對於我們天朝的不了解，但這一點是情有可原的。』南方的中國商人，對於這些新商人却是感覺興趣的。他們在滿清皇帝的統治之下，覺得很不安靜。因了這一班商人的壓力，滿清皇帝終於允許外人在一個口岸——廣州——經商，這口岸離他北方的京都是很遠的。這種允許，在南方造成了一種商業的資本主義，並在一百五十年後把滿清推翻。

在美國革命以前的一年中，美國的快船開始和中國通商。勞勃摩列斯 (Robert Morris) (後來成爲這次革命的經濟後盾) 所建造的『中國皇后號』在一七七四年二月廿二日，駛出了紐約港口。美國的革命終於因爲遠東茶業而增加了一部分的速度。當華盛頓任美國總統時，中國商業佔了美國一切進口貨的七分之一，並使他建造了大批快船，這使美國水手成了海上最快的航海者。聰敏的美國人知道中國人對

於外國製造品缺乏興趣，所以就將新英倫的冰帶到熱帶的廣州來，現在香港的雪廠街，就是要紀念那時的情形。

自從美國的快船過去後，英國在中國商業界的優勢是無可競爭的，但它的出品在中國却很少需要，因此這些商人就剝削歐洲人，要他們拿出銀子來換中國的絲、茶。接着英國的東印度公司覺得有在中國推廣鴉片的可能，而這鴉片就在中國造成一種廣大的需要。他們在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中，強迫中國買鴉片，結果又使中國開闢五個『商埠』，使外人得居留於此，並允許他們的領事，去審訊他本國的人民，不受中國法律的支配；一方面規定至多向所有的進口貨物，抽取百分之五的優惠稅率，同時又將一個荒島割讓給英國，這便是現在的『香港。』

世界各強國，因為要得到中國的製造品，並願意在中國得到一個可以推銷出品的市場，所以在此後六十年中，他們都到這個東方寶庫來。因此商埠的數字日見增加；在有些商埠內，更有『租界』的設立，使外人可以管理他們自己，並得享受

他本國軍隊的保護。租界中最大的，要算是上海的公共租界了，這是長江流域兩萬萬人民的通商口岸；一八五〇年以後，這個租界就成爲在華國外商業和經濟的主要中心了。在過去數十年中，中國本部以外的各區域，都一一落入外人的手中。例如英國併吞緬甸和其他靠近印度的一般屬於中國的土地；法國強佔了安南；俄人則遷入於黑龍江以北，幾乎無人煙的領土內。

鴉片戰爭在中國引起了一陣社會的不安。這種不安在南方尤覺劇烈，因南方是時常反對滿清的。在那邊地主對於擁有片段農田的農民，壓迫最覺嚴厲。鴉片戰爭的代價，以及外貨的強迫輸入，把人民的舊式手工業破壞了，因而增加人民的負擔。中國思想界領袖覺得非常受侮辱，因爲滿清不能保護他們的國家。在這些壓力之下，中國的人民就起來革命了。

從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六五年的太平天國之亂，和以前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暴動不同，因這裏邊是含有外人的壓力的。這種反叛，從南方開始，波及了十六行省，並

在南京建都，那是明朝舊都的所在地。他們的領袖不是排外的；他們因了中國的積弱而責難滿清，並請求外力的援助。他們因受了宣教士傳道的影響，就採取一種混亂的基督教教義，並稱他們的統治爲『太平天國』，他們的領袖爲『天王』，——耶穌基督的兄弟。』他們焚燬了地主所有的地契，和重利盤剝者所執的借據，並宣佈一種新的『土地制』，把土地分給那些沒有土地的耕植者。起初，英國會幫助這個運動，以便強迫滿清皇帝簽訂一種條約。在達到這個目的以後，英法就用武力去壓迫『太平天國』，結果戰事就延長了，並犧牲了數百萬人民的生命。從此中國人就得了教訓，覺得單憑着內部的反抗，是不能剷除腐化的朝代的；他們必須同時使他們的土地脫離外人的統治。從那時起，中國的一切進步運動（包含標語），都認識『列強』對於中國的壓迫。

中國的國勢，每况愈下，越發落入外人的束縛中了。這種低落的步驟，因了十九世紀末日本的興起，而突然增加速度；日本是一個接近中國的島國，它的較小的

和更集中的統治階級，比中國更能操縱關於現代工業和現代戰事的機器，它憑着一八九四年——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戰爭』，而使它自己踏上了世界舞台。日本很快的戰勝了一個權力不集中的中國（那時祇有北方幾省對戰爭感覺興趣），並奪取了台灣，使高麗和中國脫離關係，一方面要求中國賠償一筆繁重的賠款。這筆賠款的數字以及它的高利率，使中國第一次受到外國人的經濟的統制。

因日本已暴露了中國的弱點，世界列強就爭先恐後的來剝奪它。英、法、德、

俄等國就根據了長期租借條約，佔據了中國的許多土地。列強又管理中國的關稅收入，並用它去抵付中國的外債。外人又有權在中國設立工廠，並得利用中國低價的勞工，不受中國法律的限制，在一八九八年，一個懦弱的宣統皇帝想推行一種改革運動，但這運動僅以上層的官吏爲基礎，故它的壽命不過百餘日。拳匪之亂，乃是農民暴動中的一種盲動，因受了反動的西太后的鼓勵，就變成了對於外人和外國思想的一般仇恨。後來這種暴動就被外人的軍隊加以無情的壓迫。在安靜的乾隆皇帝

蔑視一切對外通商剛過了百年以後，許多外國軍隊就侵入北京的宮殿，並搶劫了歷代儒者寶貴的藏書。新的賠款也增加起來，使中國人的經濟受到更深重的束縛。自一九一〇年，日本併吞高麗後，『世界列強』就不再看中國是一個有生氣的國家，而祇是一種被瓜分的戰利品；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所以能生存，還是由於各國的利害衝突，而不是由於它自己的力量。

那商業性的華南首先要求中國設立現代化的政府，並以西方的民主國爲它的模範。他們在商業上是和外國資本主義聯在一起的，他們一方面同那些資本家競爭，一方面却從他方面得到利益；這班中國人要求一個獨立的政府，並希望這政府能採取外國的方法。他們這個團體曾得到若干已受西洋教育的中國學者的參加，同時一般不滿意的農民也加以贊助，並將自身組成一種舊式的秘密黨會。他們也被一九〇五年反對獨裁政治的俄國革命所激動，這種革命感動了亞洲方面的數萬人民，並且成了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的一種動力。中國人民對滿清帝國的革命，開始於一九

一一年十月十日，地點在武昌；兩天以後，革命運動越過了長江，到了漢口和漢陽，並在短期間內普及全國。這種革命，是孫中山先生憑着他所組織的一個國民黨去領導着的。

中國的新興商人雖打倒了舊式的帝制，但還不能鞏固他們的統治。他們的力量由於和北方軍閥——滿清時代官僚政治的殘餘，以及半封建性的地主階級——的妥協，就大見減弱了。袁世凱是那些反動勢力的代表，他雖能分裂議會式的政府，但沒有力量去使自己成爲皇帝。後來，中國就四分五裂了；各省將領都在自己的地域上奪取政權並不惜爲更大的統治權而作戰。外國的帝國主義者就乘機和這些軍人要求開礦權和租界，用廉價購買中國的寶藏，並增加中國的混亂。受苦最甚的是一般從事耕種的勞苦農民，他們不但要憑着勞力去維持他的家庭，他的地主，和當地的官吏，同時還得要供養預征若干年後的地稅給一切軍閥——過去的，現在的，和將來的軍閥——然而在這一切混亂之下，新的希望是在興起了。由於西方的貨品和機器

所造成的更充分的生活，和更廣的自由願望，深深地印入了中國農民的生活。

世界大戰的震動，推翻了歐洲的侵略在中國的壓迫，而使他們把總侵略者的頭銜讓給日本。日本法西斯團體的前身「黑龍會」的職員說：「現在是最好的機會了。……這樣的機會在數百年中是不會再來的。……」那時歐洲的列強正有事於歐洲；美國人的注意，先集中於有利的戰事商業上，然後集中在戰事上。因此日本的軍閥，就開始進行他的奴化和征服中國的運動。

外人加於中國歷史上的最苛的條件，當無過於現在最著名的二十一條件——那是日本外相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提交北京政府的。在幾個月之中，日本竟向美國否認這種公文的存在，原來這公文是主張把德國在華的領土和權益讓給日本，開發通到滿洲和蒙古的路線，（以中國不將任何海灣，港口，或海島租給別國為交換條件，）要求中國軍隊，警察和財政界聘用日本顧問，要求中國允許它大批的鋼鐵和煤礦的利益，以及建造鐵路的地段，和在華南的一個海軍根據地。這些要求，在一

種修正的方式之下，竟被在北京政府中的一個腐化的集團所承認。那時的『安福系』，實際上是一個傀儡政府，竟在一年中向日本借到四萬萬元華幣，把它們任意的浪費了，一方面却給日本以統治中國自然富源和工業之特權。於是日本的資本家就侵入到中國內地，設立日本紗廠，它可以不受良心和法律的牽制，去任意利用中國人。因此中國的進入機器時代，不但不會享受自由，反而受了外人的束縛，特別是日人的日增無已的威脅。

然而正在日增無已的奴化的中心，中國竟開始醒悟了。但中國的醒悟，不是由於它的商人，也不是由於它的政治家，而是由於一般學校中的青年。他們乃是學者，——由於長期的傳統，他們是中國的領袖，對於國家所受的侮辱，感覺最敏銳，同時對於外人的成功，也最能注意。所謂文藝復興運動，最初是發生在文化方面的。他們熱切的抓住西方學問，不但把它和近代的科學一同吸收，同時也把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和蘇維埃政權驅逐世界帝國主義者的成功史一同吸收了。中國的

學者也使他們的文字簡單化，務使他們的知識能被多數人所接受。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條件對於一般學生簡直是一種震動；他們等待凡爾賽和平條約和威爾遜總統去拯救他們。當那和平條約的批准日本在山東佔據中國的領土後，學生們對於威爾遜的自由主義就不再信仰；他們把自己組織起來，去救自己。

有一萬五千名北京學生衝到北京的街道中，要求懲罰簽訂那賣國條約的『漢奸政府』。這個運動像燎原之火那樣，很快的普及了各城，終於使五萬多名學生加入這運動。政府的拘捕、鞭打和酷刑，都不能停止他們的前進。他們成立了全國學生聯合會，一方面向農村中的農民推進，一方面向工廠中的工人進行。他們提倡一種抵制日貨的運動，並請求中國商人加入這運動。從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起，——這一個日子從此就永遠著名了——他們一直推動這運動，到了七月中旬，他們就強迫政府中的漢奸們辭職。雖然這些人的繼承者是同樣腐化的政客，而且在外表上也沒有直接的改變，但是「五四運動」在中國歷史上，倒是一個比滿清的覆亡，還更有意

義的轉機。

中國的青年，因在過去一世紀中受慣了西方人優秀的技術和科學的刺激，就決意用他們自己的去抓住西方的知識，以便解放他們的國家。這種進步的運動首次提出了它的目標，要一方面反抗外國的優勢，一方面反抗中國半封建式的過去時代。這種進步的運動，也第一次達到中國的各階級。中國思想界的青年領袖也第一次接受了他們的命運：他們一方面作了中國的領袖，一方面也成爲現代世界的一部分。

第六章

革命的巨浪

中國在歐戰後十年內所遭遇的社會變遷，比在明朝或清朝這數百年內所發生的變遷還要多一些。結果，廉價的機器製造品，就從西方大批的輸入到中國的市場。美國的火油替代了農民自製的菜油；工廠中的棉織品，替代了家庭中的紡織。許多年以來，中國農民的生活是和他的生存線接近的；現在他們又失去了從前足以維持他們生活的家庭副工業。互相競爭的軍閥的衝突，更能破壞他們的生活。同時新工業也輸入到中國來，並要求廉價的勞工。一般農田上的勞力者，一方面受了水

饑餓，和農村生活中的社會壓力的驅迫，一方面被碼頭上和工廠中的工作所吸引，就大批的脫離了擁擠的農村，而趨入於城市方面。

這樣，在中國就興起了一個新的勞働階級。有數十萬工人，起初是完全得不到工資的，每天不過吃幾碗飯。手工業的學徒，往往住在師父的家裏，在學習時代是不受工資的，但可以吃師父的飯，工作時間是無限制的。新的工廠利用了這些傳統的習慣，把工人們聚集在廠方的工房中，叫他們無限制的去工作，而僅僅交換了一些日用的飲食。漢口工廠中的童工，起初每月祇得工資三角。熟練的鐵路機械匠，在各種工人中算是待遇最好的，但每月亦僅得華幣十五元至二十元。工廠每天工作了十二小時至十六小時，每月祇休息兩天。這樣的情形，是各國近代工業中所不能免的；但在中國，因爲多數工人的工資都是很低的，而且工廠的資本是國際性的，所以情形就顯爲更嚴重了。

工人們開始把自身組織起來，去反抗這些情形。第一個中國的工會成立在香港

港，後來推廣到廣州，再後一共有三四十個。不久它們就同個人的僱主對抗，外國帝國主義的整個制度搏戰，原來大規模的工業往往爲外國的資本所操縱。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一部分學生發動了學生示威運動，目的在反抗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條件。但這種運動，也能激動一般工人去從事有組織的運動。三年以後（即一九二二年），海員五十天大罷工的成功告訴了中國的工人；外國的資本家是可以打倒的。第二年，有二萬鐵路工人舉行大罷工，同漢口的中國軍隊起了衝突，結果，在他們與本國軍閥作第一次的決鬥時，竟死了六十人。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在廣州舉行的全國勞工大會，代表了二十五萬以上的有組織的工人；會議中決定勞工的組織，應按照工業的方式。兩年以後，第二次全國勞工大會的代表，比第一次多上一倍，並在大會中成立了一個『全國總工會』，更一致議決和農民成立友誼的關係，並參加『國民革命』去反抗外國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軍閥。

那產生第一個工會的時間和勢力，也產生了中國的共產黨。這個黨在一九二一

年祇有黨員數十人，到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大會時（在海員大罷工後一年），那新成立的工人階級竟派了許多代表列席參加。大會決議向孫中山先生所組織的，含有自由思想的上等階級和職業界人士的國民黨，提出一個聯合陣線。在大會從『共產國際』方面所接受的一個決議案中，對於組織『多數中國民衆——農民』的需要，是極其注重的。

在許多年之中，中國的農村區域中雖成立了許多秘密黨會，它們的名目是很動人的，如『紅槍會』，『黃槍會』，『大刀會』，『天門會』等。這些黨會大概由當地地主和富農所統治，對於城市中居民是絕對懷疑的。因了農村區域的居民極其需要有人去保護他們，以防禦土匪和當地軍閥的兵士，因此這些秘密黨會就乘機抓住了當地的管理權。

但他們爲地主所領導，就阻止他們去發展一種社會的綱領，雖這種綱領是很需要的，特別是在南方擁擠的地段。在許多省分內，半數以下的人口擁有全數人口所

耕種的土地；而那些地主往往向農民勒索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的農產，同時那些重利盤剝者往往把利率提高到『一本一利』，並以米穀計算，約足供二個月之用。第一次農民協會於一九二三年成立於離廣州不遠的海豐，主動者是一個青年的學生；這會的程序是在反對高租金和商人的勒索。這些農民對於新的壓迫是非常害怕的，所以在最初徵求他們的姓名時，他們竟嚇得逃走了。當他們知道了集體行動的力量，並從新興的愛國運動方面得了援助後，他們的組織就有長足的進步；他們不但要求減租和減稅，並要求政府方面有基本的改革。

在以下這些革命的醞釀之中——如北京學生去推翻內閣的示威運動，工人反對外國資本家的大罷工，以及新組織的一個農民協會和共產主義的運動——孫中山先生開始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在廣州召集第一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這些勢力會推翻滿洲的政府，但後來反成了彼此衝突的趨勢，而不能在中國軍閥和外力壓迫的混亂局面中，建立一個獨立的現代政府。孫中山先生受了俄國革命和俄國顧問

的影響之後，就決定請一般覺悟的工人和農民來參加，以加強這個運動的力量。這次的大會中，包含了中國各省的代表，他們來自東三省，蒙古，西藏，土耳其斯坦，和海外。他們改組了國民黨，並從新說明它的政策。他們准許共產黨員加入爲黨員，贊助工會和農民協會，宣佈對於蘇聯的友誼關係，並認蘇聯爲世界上『急於要看見中國的解放的唯一國家』。

孫先生在許多年前所提倡的『三民主義』，已被這個全體大會認爲『國民革命』的基礎了。『民族主義』的意義是一方面努力脫離外人的束縛，一方面求國內五族的平等，其中包含蒙古人，滿洲人，回教徒，和西藏人等。『民權主義』以前僅指選舉權而言，現在則包含言論、出版、集會、以及工人和農民的組織權。『民生主義』的綱領，包含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改革關稅，減低租錢，向農村放款，提倡八小時工作制，爲工人成立社會保險，此外更提倡婦女平等，強迫教育，並以民軍代替軍閥的僱用兵。這就是把中國的一切進步勢力聯合在一起的一個政策。

在勝利的年代中（一九二四至二七年），統一和希望使國民黨軍隊在國內大部分地方得到權力。他們開始在南方商業區的廣州成立一個進步的國民政府。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由於上海的一家日本紗廠工人的罷工，竟引起一種極嚴重的示威運動，結果中國工人被外國巡捕殺害的共計九人，受傷的不下數十名，但這一次不幸事件，竟使全國愛國的力量團結起來了。還有三十五萬工人的反帝國主義的大罷工，立刻把上海和香港兩個海口封鎖了。在香港的工人，特地向一個競爭性的中國海口廣州遷移。那邊新組織的國民政府竭力贊助他們的行動，並提倡一種抵貨運動，歷時年餘，幾乎把英國人的海口破壞了。

全中國愛國的工人和學生，羣趨於廣州，以便參加國民政府的新軍隊。這種新軍隊的軍官，曾在黃埔軍官學校中受俄國軍官的訓練，其中最重要的一位顧問是白魯轍將軍（就是加倫將軍），也就是現任蘇維埃遠東軍的總司令。至於政治方面的顧問，乃是孫中山先生直接聘請的鮑羅廷氏。國民黨所代表的愛國運動的聲望，就

和共產黨黨員所組織的工人團體和農人團體的熱誠打成一片。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在蔣介石將軍的統率之下，開始了北伐運動，目的是在喚醒和團結中國。

新興組織而抱熱忱的農民協會，領導着『他們的軍隊』從祕密的小路穿過了華南的山嶺和山谷，對幾省的軍閥作奇襲。上海的武裝工人，在共產黨黨員的領導之下，就自動驅逐北方軍閥的軍隊，並奪取了政權，交還給蔣介石的軍隊。數千萬結成了團體的農民以及三百萬有組織的工人，給予國民革命軍以民衆的實力，使他們在六個月內通過了華南各地和揚子江流域，一直到了北方平原的邊境。漢口和九江工人的示威運動，衝入了當地的英租界，把這個租界奪回來，並交給中國政府。

華南各地的農民，曾脫離當地地主和腐化官吏的束縛，並在『民權』的名義之下成立地方政府。我在一九二七年所訪問的永豐（在湖南），就可作爲一個例子。在永豐周圍的田地，是屬於十二家富農的，他們把這些田地租給一般佃農，以便得到他們半數的農產物。他們把全區半數的食米裝滿了他們的穀倉，並故意把它們屯

積起來，等到一般貧農把食米吃完的時候，他們就抬高了米價，而從中取利。有時，他們甚至把食米屯積很久，直到人民因饑餓而發生暴動時，他們就抬高米價。凡不能付米價的農民，就不得不向他們告貸，到了收穫時，就照原本的兩三倍去還他們。

永豐是這一區的商業中心和堆棧中心，人口約一萬二千人。它有着一條很簡單的街道，沿着一條急流的灰色的江水而建造的，而這條江的水是從幾座灰藍色的山嶺中流出的，這地方店鋪中的店員，每月可得工資一元五角至四元（美金），再加上他們的伙食。女僱員每月僅得幾分錢的工資，以及僱主家庭中的一些舊衣服。當貨物用民船裝到那地方的碼頭時，就有成羣的苦力上前去迎接它們；那些年富力强的苦力往往不顧生命的危險，跳到船板上去，爲的要賺幾箇銅子，但那些年老的苦力，因爲無力去競爭祇得坐以待斃了。一長列的苦力，排了隊伍，把貨物背在自己的肩膀上，沿着很狹的石路，經過稻田，到了村子方面。在這裏，馬力已被更廉價

的人力所排擠了。

當國民革命軍向北推進，並宣傳人民的統治時，湖南省高等學校和中等學校的學生就脫離學校，到鄉村中去組織農民。在永豐附近的村子裏，都成立了農會，那是由本鎮中央農會所調整，並且受兩個有好譽的佃夫的領導。在本鎮一共組織了二十四個工會，其中包含碼頭工人、僕役、廚司、竹業工人、鐵匠、打稻者、和其他工人。此外還組織一個新的婦女協會，要求婦女的平等。一個國民黨支部和一個商會。也依次成立了。每一個團體都爲他們的會員通過條例；例如碼頭工人聯合會，要求工人們應該輪流的被僱用，以便使老弱者也能得到機會。

這許多驚人的團體都是在三個月（自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至二七年三月）內成立的。把那些團體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人民政權』。這個區域內的多數大地主已經出逃，但是多數官吏還留在那邊。按照當地的一個德國人說：『這些官吏的權力已不再存在，除了爲「人民政權」所通過的議案簽了一些字』。當地的農民協會管理

一切多餘的米穀，並允許在收穫以後還給地主，但祇一磅還一磅，而無須出利息。這種米，每天糶出的不下三四千磅，並且按照精密的量度，賣給一般窮苦的家庭的。每隔三英里，便有一處人民糧食舖的設立。這些收入的款項，有一部分作為開辦『平民學校』之用，那是非常簡單的學校，因他們不過命令當地富家的教師去為民衆設立班級罷了。他們曾討論農村合作社的計劃，要利用米穀的進款去購買更多的米穀，和較優的種仔。中國農民的組織能力，從沒有像這一次運動中所表現的那樣顯著；在不到六個月的短時間內，這些不識字的迷信的人民——仍然是半封建時代的子民——已能用大無畏的精神和民治的方法去應付當地的政府，食物的統制，和教育事業。

人民法庭是由各工農團體的代表所組成的。在永豐那樣的小鎮中，法官對於罪犯祇能下小一些的判斷；至於縣中的法庭，就有決定犯人的生死之權。一位年輕的，曾在美國教會學校受過教育的郎女士，是在這樣的法庭中服務的，她是代表婦

女協會的。她告訴我兩件關於死刑的案子，很能顯示中國農民生活中的嚴重問題。她說：『有一個叫作張華堂（譯音）的男子，是一個高級的官吏，而且很有錢；他用盡各種方法來反對我們的農民協會。他擁有二百英畝以上的田地，和七十五名非法的武裝者。有某佃戶因無力繳租，他就把他關在牢獄中，他又遣派他的武裝僱員去反對農民和平的遊行，並殺了三十個農民。還有一個姓沈的男子，是一個小官吏，他奪取了權力，去壓迫人民向他付稅。在他的壓迫之下，一個窮苦的寡婦竟然自縊了。他隨意拘捕人，且往往把一個人的一隻手一隻腳綁在一起吊起來，並加以鞭打，直到他們答應把所要求的全部拿出來為止。有四十五個農民到農民協會去控告他，並要求把這人處死。於是人民法庭就把這兩人判處死刑，——這是我們這一區裏唯一判處死刑的案件——但是由於反動派的取得政權，這兩人的性命終於保全了。』

在這些故事中所顯示的一切社會緊張的狀態，如發生於佃農和地主間的，工人和僱主間的，匪徒和人民間的，都因了上海的奪獲，而盡量顯示出來。這上海是

中國組織最強的工人團體的中心，是最反動的資本家的中心，也是國際資本的中心。當一般武裝工人在這地方奪取了政權，並交還給蔣介石以後，那些受驚的上等階級就要求蔣氏解除那些工人的武裝，並『改組』工會，而把革命分子排斥出去，他們以為這樣便能『恢復秩序』。他們並答應給政府以經濟上的援助，以作交換條件。蔣氏對於這一切是同意了。結果他憑着他對於工人團體的壓迫，就取得了中國最有力的商人團體的援助，和國外的列強的承認。在幾個月中，國民黨的多數執行委員都反對蔣氏的舉動，並在武漢按照原有聯合陣線的原則，成立一個政府。但不久他們也壓迫人民團體，排斥共產黨，並宣布它是非法的；他們終於和南京政府妥協了。

華南的農民領袖就分散在各處，並隱藏在高山裏邊。上海和廣州的工會領袖，也不敢拋頭露面，因為如果被拘捕了，就有處死的危險。但是數千萬人民在內心中所引起的希望，是不能這樣容易被限制的。中國共產黨和全國總工會都在暗中進行

工作，他們在工廠中，店舖中，鄉村中組織秘密團體，並遣派代表到鄉村中去指示他們暴動的方式。

當地的一般手足無措的農夫和耕植者，起初是用刀劍、槍矛、和農具去保護他們的『民權』，以免受當地地主和軍閥的侵略。他們也向省政府，中央政府，和國民黨請求，要他們把所允許的權利保持起來，以免受『反動的兵士』的侵犯。也有一部分不願意壓迫工人和農民的國民革命軍加入他們的團體，並脫離了政府，以表示反抗。後來因爲政府和國民黨都是和地主軍閥們聯在一起的，所以就有幾個革命的軍隊開始在『蘇維埃』的名義之下作戰。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朱德，賀龍，和其他領袖，把中國分散的軍隊組成了『紅軍』。

這些地方蘇維埃中的第一個蘇維埃，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國革命的十周年紀念）在廣州附近的兩個村子裏成立了。一月以後，廣州的工人取得政權，釋放了政治犯三千四百名，並宣布成立廣州公社。一個迅速召集的，包含工人的，農民

的，和兵士的代表大會，在掌聲雷動之中宣佈了中國蘇維埃政權的成立。三天以後，這個『公社』就遭遇流血的慘劇。原來日本的海軍竟幫助國民黨軍隊去屠殺『赤化分子』。但這次會議中所宣佈的綱領，——包含把地產分給無地的農民，把重工業歸於國有，取消奴僕制和童工制，並通過許多含有進步性的法律——在以後數年內在『中國蘇維埃』這個新名詞之下，却成爲華南和華中方面的工人和農民的一個火炬了。

一九二八年春，毛澤東和朱德（這二人從此就成爲共產黨的主要領袖）的紅軍在江西和湖南的邊界會合，並成立一個包含七縣的『蘇維埃政府』，內設軍事訓練學校一處，兵工廠一處，和醫院數處。他們把地主的土地奪過來，分給一般農民，把地契燬滅，把學校興辦起來。到了一九三〇年，分散的蘇維埃區已在十多個行省內成立了。一九三〇年夏，他們不免太魯莽了一些，把湖南的省城長沙奪下了，後來因爲外國炮艦協助國民黨軍隊，發炮反攻，把他們驅逐了。外國政府更要求蔣介

石去壓迫『赤區』，如果他願意成爲全國的統治者。在一年中——從一九三〇年秋到一九三一年秋，蔣氏發動了他最初三次的勦共運動，而其軍隊的人數，都一次大似一次。第三次由他自己統率，人數不下三十五萬。但這些運動全都失敗了，因紅軍是立基在當地農民的忠誠之上，同時紅軍也給農民以組織和田地。

在三年多的時間內，蘇維埃曾在江西的一大部分和其他時常改變的區域中握有政權。一九三四年一月內所舉行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大會，包含了從各省而來的七百位代表，其中有貧農三百零三人，工匠二百四十四人，佃農一百廿二人，苦力五十三人，中農二十五人，工人八人，店員二人，小職工六十四人，和其他職業界人員。這很可以代表全國農民的橫剖面，但是地主和富商是不在其列的。這些代表先在中央運動場中對紅軍作三小時的檢閱，然後軍樂隊奏樂聲中揭開了大會的序幕。（按軍樂隊是在一個貼滿了紅軍標語的客廳中奏樂的。）毛澤東的報告，使全世界得到了關於共產黨的問題和成績之第一次可靠的紀載。

『在中國各地，紅軍的各支隊是在一種共同的指揮之下從事於活動。……蘇維埃的選舉不再是一個普通的民衆大會，而是把選舉者的名字貼在榜上，並加以圈點的。……在許多處地方，百分之八十的選舉者曾出席參加。……在有些區域中，女人佔了被選代表的四分之一』。新設立學校的名單都被列出來，它們共有學生一八四、二二七名，此外更有關於閱讀和寫作的課程；參加的成人共一五五、六七一名。在這些班級中，往往三分之二以上是女人。『婦女的知識慾在中國的歷史上是前所未見的』。政府的力量，可從（一）所募的三百萬元內債去興辦國家工業這件事上見到的；（二）從所組織的一、四二三個合作堆棧上見到的；（三）可從多數地方蘇維埃中所有關於灌溉、學校、衛生、和分配土地給紅軍家屬等經常委員中見到的。他們所提到的困難，便是去反對分配田地和家畜時的舞弊情形，——『這些東西必須給予貧農，而不給予蘇維埃的官吏』。——並和蔣介石的封鎖所造成日用必需品（特別是食鹽）的缺乏去奮鬥。貧民的情形顯然是改進了。『在以前，大多數農民在

一年中總得要挨過若干日子的饑餓，但現在因爲土地的更好分配以及稅率的減低，饑餓已被取消了，同時人民的生活也至少比從前好上兩倍。……農田上的勞働者，所得的食物，同他們的主人一樣。……』在兩年之中，十餘種工商業的工資，已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四十。『八小時的工作制已在任何蘇區內成立了；在一切市鎮和許多農村中，有許多稽查在執行這種法律。』

這一些似乎是一大批能引起深刻印象的成功事件。這些蘇區的影響，傳佈到全中國，雖然中央政府是在時常壓迫它們。南京政府逐年遣派軍隊去討伐赤區，爲得要用武力使全中國都受中央政府的統治。他們把許多區域都征服了，但大部分的紅軍往往脫逃，以便在別處組織新區域。他們的宣傳比他們的子彈更有效力，因爲多數政府軍的兵士也是貧農的子弟。每當萬籟俱寂或戰事平靜的時候，赤區的男子，兒童，和婦女就大聲向中央軍呼喚：『白軍的弟兄！你們爲什麼替地主們作戰呢？我們是貧農和工人，爲你們的利益作戰！把土地分給農民和兵士！不付租金，不還

債，不納稅！弟兄們！到我們這裏來吧！帶了你們的槍和子彈，爲革命而戰！政
府的軍隊對於這些呼喊，覺得很能接受。

一九二六年至二七年，當國民革命軍協同共產黨黨員向北進發時的那種照亮全
中國的革命的希望，在此後的十年中就被湮沒在層層的灰塵之下，或被若干勇敢的
而困疲的執火炬者，從一個地方帶到另一個地方，以便燃點新的燈臺。這些燈臺是
永不熄滅的！

第七章

日本對華的侵略政策

在一九二七年晚夏的一個月夜，（在武漢政府失敗後），陝西某菓木園中，有前國民政府高等顧問鮑羅廷，同一個退任的中國官吏在談話。他們所討論的，是本國的帝國主義和它對於中國將領的影響；於是鮑羅廷就說了幾句永遠留在我心頭的話：『從現在起，帝國主義者會比以前更加壓迫中國了。——當國民黨依靠羣衆的時候，國民黨黨員便是佔優勢的分子；那時在漢口和九江的工人曾爲中國奪回租界。但現在國民黨却在壓迫民衆了，同時帝國主義的要求將愈形惡化了。上海的大

商業團體，不能使中國脫離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束縛，因他們是和帝國主義者勾結，並且從中取利」。

在以後幾年內，似乎沒有多少事情可以證實這幾句話。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一向是進行順利的。自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他的軍隊得了工人團體和農民團體的援助，就從廣州進展到揚子流域；在下一年，他們憑着上海財政家的援助，就一直向北京進發。北京——這個名字是指『北方的京都』，並代表北方侵略者的統治，起先是蒙古人，後來是滿洲人——就改名為北平了，這是希望北方的戰事從此平靜下來。新的首都就在揚子江三角洲的南京建立起來，那是中國過去的朝代——明朝——建都的所在地。這樣，中國人的傳統就同現代的工商業合起來了。雖然工人團體和農民團體已被『改組』了，——其實是一種激烈的壓迫——但許多愛國者對於一個統一的和獨立的中國的希望，仍集中在國民黨方面。一九二八年十月，新政府正式在南京成立了，並宣稱它已得到南北各將領的贊助，——其中包含東三省的贊

助——因此東西各方就來了一片慶賀聲。

但在慶賀之中却含有一種不和諧的調子。日本在最初就表明它是仇視南京政府在華北諸省的勢力的；原來這些省份都是它的勢力範圍。日本在東方的政治手腕是很機敏的，它利用中國的種種變遷，第一步壓迫清末的軟弱皇帝，因而取得優勢，接着就賄賂腐化的北京政客，後來又津貼冠冕堂皇的封建式的張作霖，他是東三省的軍閥，而且是時常在北京掌權的。一九二八年，當蔣介石的新軍隊初次向北京推進時，他們在山東發見了五萬名日軍在阻礙他們的前進。結果就有數百名中國兵士被日軍槍殺；中國的外交特派員——蔡公時，和他的十二位隨員也在特派員公署中被害了。但中日雙方都沒有準備作嚴重的戰事，因此中國軍隊仍得向北京進發。結果張作霖放棄他的都城；這便是他日後被日人暗殺的一個先兆。他的兒子張學良繼位統治東三省，他曾受日人的警告，叫他不要掛中國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但他却藐視這種警告，並宣稱他是贊助南京政府的。那時日本的首相田中通知列強的代

表說：『中國的內戰是不准侵入滿洲的。』

但日本並不立刻採取公開侵略的行動。在三年內，它的活動祇限於準備的策略，使中國的一派和另一派鬧意見，並特別加強反南京各黨派的勢力。在一片稱賀統一的回聲還未消滅以前，人們已發見這些慶賀未免過早一些。原來蔣介石解散敵派將領的軍隊，以減低軍事預算的最初嘗試，竟致演成一種公開的戰事，——最初是同廣西的將領作戰，後來又同西北的軍人交訐。華西諸省的軍閥則袖手觀旁，僅對南京政府作口頭的援助。各省將領，仍在國民黨的青天白日的『革命旗幟』之下爭權奪利。至於日本則從旁贊助他們，並乘機加以干涉。

在阻止日本作直接行動的的許多原因中，有一種是美國所特別贊助的九國公約。使日本在東方成爲主要侵略國的歐戰，也使美國在世界的政治舞臺上第一次佔重要的地位。在凡爾賽和平會議閉幕後不久，當中國愛國者仍在爲日本的佔據山東而感覺痛苦時，美國外交部就在一九二二年召集對遠東事件感覺興趣的幾個列強在

華盛頓舉行會議。當時派代表出席的九個強國，便是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葡萄牙和中國，（因為那時的蘇聯和德國，在大戰後已經失去資望，故未參加九國公約）。它們把自己團結起來，去尊重中國領土的完整。各國都得在中國享受平等的通商權，這便是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它們要求日本把山東的青島歸還中國。哈定前總統則向美國上議院和日本聲明：那種新公約已把日人在中國的『特殊利益』取消了。

日本內部的情形，也阻遲了它的侵略行爲。一九二三年的日本地震，毀壞了日本一部份的海軍，並使它蒙受數十億日元的財產損失，終於使國家的進步暫告停頓。一九二五年所通過的日本法律，使多數的日本國民得以享受選舉權，因此在此後的五年內，日本和民主政治的接近，是以前所沒有的。日本的政黨，也比以前更活動了；受若干資本家團體支配的兩大政黨，——政友會和民政黨——曾設法提高議會的權力，而使軍隊多少受議會的控制。日本的商人，同它的軍隊一樣，要求政

府向東三省和中國方面擴大勢力，但他們所採取的乃是更審慎和更新式的方法。日本外幣原宣稱和南京政府維持友誼的關係——而不是憑着征服——乃是日本利用商業去擴大它的繁榮的最好基礎。那代表比較溫和的資本家的民政黨，甚至爲保持合理的預算的緣故，主張減少軍隊。一九三〇年成立的民政黨內閣，甚至批准限制日本軍艦數量的倫敦海軍協定。軍官們對於這件事的答覆，便是把濱口首相暗殺了——這是軍閥派藉以恢復權力的一連串暗殺案中的開始。

一九二九年和此後的一年，世界經濟的恐慌給予日本以向東三省侵略的機會。美國國務卿史汀生，以後在他的遠東的危機這部書裏寫着說，日本選擇美國和英國都在最嚴重的經濟恐慌時期，去開始它的震動全世界的軍事行動。那時中國的情勢也是對日本有利的。蔣介石正在第三次準備向中國蘇維埃區進攻。北方的兩大軍閥——馮玉祥和張學良——正在準備彼此攻伐。在華南的廣州，已成立一個新政府，其中包含國民黨中比較著名的半數領袖。中國的報界乃鼓其如簧之舌，說日本是在

鼓動這些不同的黨派。但在日本內部，民政黨政府的力量已被經濟界的不景氣所消耗了，而這些不景氣能使農村區域中發生饑荒，使城市中失業者的數目增多，使許多小商人瀕於破產，使階級間的衝突愈見劇烈。於是一般軍人，就建議在國內提倡法西斯主義的程序，在國外從事於侵略行爲，以解決這個問題；一般大資本家也覺得這種方法對於他們有利，但是對於誰應當統治的問題，他們的意見却不一致。

日人進攻東三省的藉口，是說中國轟燬了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這是日人所計劃的一種偶然事件，在時機成熟時，它可以使日本的帝國主義者向東三省進攻。在開始侵略前六星期，日本駐東三省的軍事司令官本莊將軍曾上書日本陸相說：『我們應利用世界的經濟局勢，蘇聯五年計劃的尙未完成，以及中國的未曾統一，立刻向滿洲進攻』。日本因已得到中國的許可，得在南滿鐵路區駐札警察，因此日本的軍隊早已侵入東三省。在轟炸路軌的同一個下午，日軍按照預先頒佈的命令，佔據了南滿的幾個城市，並在四十八小時內佔據南滿全部，繳了十萬名中國軍

險的槍械。在一個月內，他們佔據了東三省北部，直到蘇聯邊境。在當時，日本的第二步行動似乎是在進攻蘇聯，因那時的蘇聯正在進行第一次的五年計劃，情形至感艱苦，一方面又在第一年試行集體農場的計劃，並且還不曾充分防禦東三省的邊境。雖在那時，日本已清楚的看到征服中國是一件比較便利而且有益的事，並且是它發動進攻的第一個必要的時期。因此日本就向南去加強它的沿長城的防禦，這長城是能把東三省和華北分開的。

在南京的中國政府方面對日人的侵略東三省，便決定了此後五年內主要的政治問題的姿態。它應當先對付那一位敵人呢？中國的蘇維埃區呢？還是它的侵略者日本？蔣介石認為中國的力量還是不足以抵抗日本；據說他在一九二七年日人侵略山東以後，曾在一次將領會議中這樣說，中國要抵抗日本，非等待十年不可。他對日人的侵略東三省，曾宣布不抵抗的政策。當張學良（他在東三省擁有極大的軍隊，和世界上最好的幾個兵工廠）乘着飛機到南京去請求指示和援助時，他却被總

司令所贈送的一架飛機送回東三省，要他向日本屈服。

但中國的民衆却不願安靜地對付日人的侵略。全國各地就發動反日的煽動和抵貨運動，尤以上海爲最甚，因日人在上海的投資非常浩大。上海也是南京政府經濟力的來源。因此日人在侵入東三省後，就在一九三二年一月開始攻擊上海。但他們最初的進犯，就被著名的十九路軍所擊退，他們的勇敢的防衛雖終於失敗，但這件事却引起了中國人的一種自尊心，並使日本在外國軍事觀察家的眼光中失了尊嚴。還有，日本以前所享有的關於義俠和品行端正的名譽，也因了它這次在上海任意屠殺人民而永被破壞了；而且這件事也成了日後法西斯主義者在阿比西尼亞，西班牙，或華北作屠殺行爲的前例。甚至連上海方面硬心腸的新聞記者，也因了自身所目擊的慘無人道的屠殺，而大受震動。

上海英文大美晚報的主筆薩刻利 (T.O. Thackeray) 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的報上記着說：『在跑馬廳內我所常到的一個看台的門口，是被屍體所阻塞了，這些

都是在我眼前所殺死的新鮮屍體。在這些屍體中，也有婦女和小孩的屍體；婦女是從背後被射死的，她們的棉襖上又有被指揮刀刺透的痕迹，而小孩的屍體上則充滿了子彈孔。鄉下人打扮的屍體，奇奇怪怪的堆在地上，他們傷處的血，濕透了地面。……房屋是被焚燬了；我親眼看見這些房屋被焚燒，而且焚燒得很整齊——沒有一根火柴被浪費，也沒有一片引火物是徒然耗費的』。這位新聞記者又描寫一個日本軍官怎樣殺害那些從焚燒的茅屋中逃出來的農民，他說：『他的發光的指揮刀直刺到人體的刀鞘中，直至刀柄爲止，接着那身體就跌倒了。於是第二個人就替代了第一個人的地位，同時那把指揮刀又找到了它的含有脈膊的刀鞘了。第三個是一個碩長和漂亮的孩子，又被日人擲在地上，面部向下，滾在兩個死人的身上；當這個孩子跌下去的時候，六個軍官的手槍就一齊對他放射，並在他的背部和脊骨上造成一行痕跡』。這些乃是日人侵略上海時的特有的殘暴行爲，而這種侵略終於因了一種妥協的和平而終止，結果使日本在上海得了一個永久的立足點。

『那將臨近的戰事，乃是爭奪世界支配權的一種戰爭。至於東三省的戰事，不過是一種起點罷了』。——這些話，曾發表於日本軍人的報紙上，而把日人侵略中國的真正用意說明白了。日本軍閥侵略東三省的目的，不是要爲日本的過剩人口找一個出路，原來住在那邊的日人祇有少數的軍官，軍事的殖民地者，和幾位技術家，而多數日人並不移殖在那邊。他們也不尋求主要的原料和市場；正如幣原所見到的，這些原料是能憑着一種友誼的通商去得到的。原來日本所尋求的是權力，是將來征服中國的一個根據地。侵略東三省乃是法西斯列強侵略全世界的全部過程中的第一步，結果是要引起世界大戰的。美國本想聯合九國公約的簽字國去反對公約的破壞者，不幸這種嘗試竟被英國所阻礙；這一件事不但鼓勵了東京的軍閥，而且造成了民主國對於法西斯侵略的一種胆怯的姿態，並間接援助了法西斯主義，這是西方的民主國所遵照的一個方式。

東三省肥沃的產麥平原，是日本趨向帝國的途徑中的第一個目標。其次便是華

北的鐵、煤和棉花了。察哈爾、河北、山東和山西等華北四省，幾乎包含了中國全部煤礦和鐵礦的百分之六十，和它的棉花的半數。這裏就是東亞未來的重工業的基礎。如果日本要保持和平，它是能用和平方法從中國方面去得到原料的，但日本軍閥的目的不是單爲原料，而是要取得專利的統治權，以便阻止中國工業的發展，一方面使日本得在和平時的世界市場上勝過別國，更能在作戰時保持優勢。日本征服中國的計劃，是它的一切行動的第一個原因。它在華北不是爲了煤和鐵去作戰，而是爲了日後的戰爭去找到煤和鐵。

日本以東三省爲根據，就在以後數年內侵入華北數省。但自從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它的侵略並沒有得到充分的實現。它的侵略含有許多方式——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日本推行它的『分化和征服』的政策，就在一省中，組織中國人、滿洲人、和蒙古人的軍隊，使他們在日本軍官的統率之下去攻另一省。日本又向南京行使壓力，要求華北的官吏由『親日』份子去担任——這所謂『親日』，是指

一般承認日人的特殊利益，而甘心反對南京政府的。後來那些最奉承日人的官吏，也因了日本的繼續要求而歸於失敗，此後日本就堅持用更順服的『親日』分子去替代他們了。日人的『金融資本』又決定步驟去控制鐵礦和煤礦，以及從北平西行的中國鐵路，這些對於日本日後攻擊華北和蘇聯的計劃，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這樣，日本就逐日的向南進逼熱河，並向西侵入察哈爾，它所引起的是許多次繼續進行的，而從不正式宣布的戰事。華北的幾個省政府，包含北平的政府，（這北平依然保持首都的傳統），就逐漸轉入日人的統治之下。但是關於日人的進犯以及中國政府繼續屈服的消息，由於中國政府檢查出版物的緣故，却是中國人所不大知道的。例如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南京政府所簽訂關於塘沽協定的全文，是從沒有發表過，但是行動上所表示的，却比所發表的條件說得更響亮；結果中國軍隊就向南撤退，一直到了離北平北面十萬里的一條界線，但是日本的飛機和軍隊却可以在這條界線以北的區域內巡邏。在第二年，就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蔣介石親自

到華北去視察，並將當地政府改組了一下，以便緩和日人。他在這些政府裏，聘用許多日本顧問，連那山海關（就是在東三省和華北之間的一個軍路上的關口）的地方政府，也聘用日本顧問了。

華中和華南諸省的利益，也在日人的壓力之下犧牲了。一九三四年，中政府會頒布一種新稅則，把中國紗廠所用生棉花的稅率提高百分之四十三，（這樣就妨礙了中國紗廠和日本紗廠的競爭），同時又減低三十九種從日本輸入到中國的棉織物的稅率，使日貨可以同中國貨競爭。中國海軍的祕密，也都放在日本的掌握中，因為華中海軍造船廠中會聘用日本工程師十七人去監造一艘軍艦。

日本軍閥的胃口，因了他所得到的戰利品，而愈見增加了。一九三五年，日人曾作一種嚴重的嘗試，以便在華北取得完全的自治權，這樣就使黃河以北五省脫離了南京的統治，而受日本的支配。日人所用的方式，便是想憑着和南京政府簽訂協定，把中央政府的軍隊和一切政治團體都離開了察哈爾和河北省的範圍。日本人會

勸誘華北的中國將領，特別是山西的獨裁者閻錫山，要他領導一個自治政府，但這種嘗試都沒有成功。日本軍隊開始在平津方面拘捕中國人民，並把他們拘留在日本的營房中。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最初兩星期內，有一百位商界和教育界的著名領袖就這樣被拘捕了；但是在中國地方官員允許白人按照日軍所開名單去拘捕中國人以後，這種拘捕行爲就不再發生了。（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的英文密勒氏評論報）。

華北的一個自治政府的計劃，是被一種新興的愛國運動所挫敗的，至於這種運動的詳情，我將在下一章內加以敘述。但日本仍在冀東成立一個『自治政府』，這冀東的區域是包含從海岸到離北平十哩的一個重要軍事地點。這種政府的目的，是在打破中國政府對於華北的統治權，特別是華北的關稅權。冀東的整個海岸，是充滿了私運鴉片和日貨到中國的船隻，並把白銀私運出去，目的是在擾亂中國的新金融制度。日本爲了要保護這班私運白銀的人員，就強迫解除沿長城的中國稅警的武

裝；三個月後，它又強迫解除中國稅務署沿海巡邏的稅警的機關鎗，並壓迫他們駐在離冀東海岸三哩的一個區域內。當他們要衝過這三哩的限制去行使他們的巡查權時，日本方面就警告他們，說這種舉動是要被視為海盜行爲的。非法的貨物是由武裝的高麗人保護着，他們是準備攻擊任何稅務署的職員的。由於這種私運而漏稅的數額，估計已達到一個可驚的數字：五千萬元。

日本的侵略對於中國民族生活的影響，可以從許多通訊記者的記錄裏見到的。天津的日租界已成爲東方販賣鴉片和海落因的最大中心了。這種營業的目的，一方面是增加收入，一方面是在敗壞中國民族的精神，使他們減少抵抗的能力。林楊（譯音）曾寫着說：『鴉片窟，典當，和妓館，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了。其中大部分是由高麗人所開辦的，並且曾在日本大使館登記，因此就受治外法權的管治。中國的官吏祇能在中國人出了煙窟後，才加以逮捕，但那些販賣鴉片的人不是中國的法律所能管治的。……另一種有利可圖的營業，便是把偽造的中國鈔票輸入進來。那

些日本印刷的中國銀行，中央銀行，和交通銀行的偽鈔票都被日人輸入進來，賣給華北的商人，售價祇合票面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另一種可以賺錢的營業便是放債，因爲每月每元的利息高至一角至二角。當地的北平人稱它爲「跑馬利」。我們常看到高麗的債主把債戶的子女帶去，因爲他們不能付債。也沒有人向法院請求保障，因爲關於日人的案件，是在日本法庭中受理的。（見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的英文中國呼聲）

日本軍隊在華北的一舉一動，彷彿是在對付一個已征服的國家。某通訊記者描寫日軍在天津附近的操演時會這樣說：「他們在鄉村裏是來了又去，並隨意拿去他們所要的東西。鄉村中的每一家，都得指定一人，以作皇軍的僕役。這些人因受了死的威脅，不得不担任各項僕役的工作，並且還要把自己所藏的柴火拿出來，以供給這般「客人」們的使用。當軍隊對於打靶感覺疲乏時，他們就會向着任何看得見的生物射擊。鄉村中失掉鷄狗的事是非常繁多的。連人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便要做這

些不當正經的打靶者的目標。在經過這種緊張「練習」以後，那些「友誼的軍隊」就把注意集中於鄉村的少女，以求得到安慰。沒有什麼人會對這種行爲表示抗議。當軍隊駐紮在鄉村中的時候，鄉村間的交通是阻斷的。」（見一九三七年的中國呼聲）

日人統治的充分結果，可在東三省見到的。一九三七年，當比森先生訪問東三省時，覺得當地人民的生活程度，自一九三一年後，就大見低落。人民對於主要食糧，穀類，和大豆等的消耗率，在一九三一年是每人平均消耗四百四十五公斤，到一九三五年就降到三百四十公斤了。『除了幾種服務軍隊的重要工業外，實際上「滿洲國」是沒有什麼工業的發展的』。農民的情形，可從人民在當地典當中所放棄的物件的數字上見到的。農民往往在春季把他們的衣服和什物當在典當裏，以便換取現款去買種籽和肥料，到了秋天收穫以後，他們就拿錢去贖回他們在冬天所需要的衣服。但是在近年來他們就覺得沒有力量去把這些東西贖回來了。軍用的公路

都是強迫農民去築成的，而且這種工作往往是在收穫的時候進行的。饑餓和需要，往往強迫許多農民去從事土匪的生活。

教育事業也退化了。目前教育部的預算，約等於一九二九年東北四省的中國政府所耗費的半數。『在整個的滿洲國沒有一所真正的大學。在張學良時代辦得很好的五六所大學和分科大學，現在都停辦了。……凡從中國本部或歐美各國回來的學生，先要經過警察的盤問和監視的；當這些學生在國外求學時，他們的父母是時常受到警察的光臨和查問的』。照一個中國教育家的記載（見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的中國呼聲），小學所用的教科書，大都是關於日人的言行，中國人的言行是被禁止的。在學校中也不教歷史和地理課，『中國』這個名詞在各種教科書中是沒有的。各級學校中每星期要教六小時的日語。『同日語一樣能引起注意的唯一課目，便是所謂勞役訓練了，這裏面包含許多應由僕役們擔任的勞役。……教育事業是按照以下這個標語而辦理的：『滿洲人民祇需要用他們的手，而不必用他們的腦，因為日

「本人已替他們計劃一切了。」

在東三省有數萬中國軍隊不願向侵略者屈服，從一九三一年起直到現在，他們是在繼續向日人作戰。他們是隱藏在山嶺和森林裏面。並且是受當地農民的保護的。實際上農民是傾向於中國軍隊的，並且有許多人加入中國的軍隊。因此，日軍就在一九三六年想了一種激烈的辦法，要使這些武裝的義勇軍和他們的民衆的根據地隔絕。全區域中的人民都集中在『被保護的村莊』裏，四周圍是被高的土牆，深的壕溝，和有刺的鐵絲網所環繞着。在這些範圍以外的農舍都被燒成平地，而且在有的區域中，連一些未割的穀類也被燒燬了。住在這些村子裏的人民，都是被登記過的，目的是在管束外人的遷入。他們也按時舉行偵查。凡不能交出居住證的村民，是要被處決的。在比森先生所曾造訪的一個特殊的村子裏，住了一百五十份人家，其中三四十家是在他們的家庭被日人焚燬後方始遷入的。日本的當局對於這些農民並不給以經濟上的援助，使他們可以在村子裏成立新家庭。他們所得的援助，倒是

從別的中國人方面得到的。農民所納的地稅已比一九三一年增高兩三倍。此外還得要付關於『軍事保護』的額外稅。大約每星期有四五十名日兵來訪問這些村子，他們是應當受歡迎的，在晚上他們就在這些村子裏食宿，所有的費用，都由村裏的人民去担任。在一九三七年中，約有好幾萬農民不得不住在這些村子裏。因受了這種恐怖的威脅，結果就有好幾萬中國農民遷到離東三省遠一些的地方去，或遷到長城以南。此中所發生的混亂和不穩定，是比以前更普遍了。

南京的中國政府逐年用和解的方法去應付日人的侵略。一般抗議的中國人，都受到了壓迫。反日的學生和教員都被拘禁起來。敢於發言的愛國的報紙，都受到政府的命令，叫它們對日本表示更親密的態度，否則就得把大門關上，華北地方政府的反日官吏，曾被中央免職。當日本軍隊向西侵入察哈爾時，馮玉祥將軍，就成立一個『抗日國民軍』，並在三個月之中，把日人所奪去的土地克服了。因此南京政府就命令馮玉祥將軍把他的軍隊解散，並離開他的所在地，一方面更遣派軍隊去

強迫馮氏執行；察哈爾北部因此就淪陷在侵略者的手中。一年以後，當其他華北軍隊對政府要他們向日人屈服的命令表示憤怒時，蔣介石就把這些軍隊中的十四萬五千人往南調遣。南京政府的態度既這樣的妥協，所以在少數人的眼光中，它幾乎成了日本的代理人。

多數中國的愛國者，對於這種政策早已認為叛逆的。當然，這裏邊免不了受着日本代理人與中國媚日派的惡影響，有的人則稱這種政策為中國人對於和平關係的一種忍耐和願望；當然這種原素是不能免的。許多中國的領袖確實相信一種和解的態度，是能在日人中間引起同樣的反應的。的確，世界上沒有一個和平主義者，能比得上蔣總司令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所舉行的國民黨五全大會中所發表的言論：「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中國所有的讓步，總不能緩和日本的軍人。光是對法西斯主義屈服，是無濟於事的。一九三五年底，當南京政府再表示忍辱的屈服時，日本的華北駐屯司令多田

少將會宣稱：『當蔣介石和他的黨派繼續支配中國時，同南京政府講條件是沒有希望的。……因此，日本帝國應當採取單獨的行動。』很顯明的，南京政府雖作種種的退讓，——無論這種退讓是忍耐或叛逆，或出於軟弱或機敏的延宕——但日人已預料到中國的內部將造成一種抵抗，那是終有一天要向他們的統治挑戰的。

第八章

中國走向統一的途徑

當日本利用時機，從北方進迫中國時，南京的中國政府就藉着近代資本主義國家所熟悉的各種方法去統一國家。這一種統一運動得到了上海銀行家的維持，和國外的承認。結果也就得到了外國的債款和顧問。美國的飛機和飛機師以及德國的軍事顧問，加強了蔣介石軍隊的實力，並使那些反抗的軍閥至少在名義上服從中央的政權。

新公路和鐵道，新工廠和長途航空綫，開始把舊中國的面目變換了，並為一個

統一的國家安置了一個物質的基礎。在南京所興建的現代式的政府辦公處，可以反映出這種局面是正在創造的過程中。政府方面曾規定二年，三年，和十年計劃，去推廣實業。堤閘是被建造起來了，荒廢的田地也被開墾了，並且分配給農民。當蔣介石宣布廢止『不平等條約』，並在海關稅率方面取得一部分主權時——雖然海關的收入和它的管理仍操之於外人之手——國家的資望就增強不少。

各省之間互通聲氣或實行通商的一種最大障礙，便是一種混亂的幣制。地方的貨幣往往根據當地軍閥們所印行的紙幣。因此最妥當的貨幣便是白銀了。一九三二年美國所提倡的購買白銀政策，把銀價提高了，並從中國農村區域中吸取了一大批白銀到外國去；結果有許多錢莊銀行跟着破產。於是政府就利用當前的危機，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六日造成一種全國新幣制。憑着他們的三大國家銀行，使白銀成爲國有；一方面又發行紙幣去替代白銀。民衆都樂意把他們的銀幣交出來，去換取法幣，這可以表示國家的信用已到了一個新時代，並能立刻鞏固那種新貨幣。這種幣

制從起初就能進行順利，並能使商業方面有一種普遍的振興，因而使政府可以更迅速的去推行它的改造國家的程序。甚至連白銀的高價（曾使國家有發生混亂的危險）也因巧妙的運用而成爲一種資產了，因爲把白銀賣到國外，中國就能在倫敦和紐約的銀行中留下大量的國外匯兌，這就增高了中國政府的國外信用。但是日本政府對於這件事就提出一片責難聲，因中國在未得日本的許可以前，竟敢擅自增強自己的國力。

蔣介石爲要在人民的生活方式中提倡一種相同的現代化，就發起『新生活』運動，而蔣夫人對此是特別表示熱忱的。這個運動所宣傳的，乃是要把孔子關於『倫常』的原則應用於現代的生活。它所提倡的四德，便是『禮』、『義』、『廉』、『恥』。這種運動也提倡教育，體育場，街道的清潔，運動，和有益的活動，並引起民衆對於鴉片的反感。它所接觸的是知識階級和上等階級的青年，但完全不推行到數千萬中國農民和工人所居住而感覺痛苦的區域。

中國農民和一般參加墾植者的負擔，不但未曾因這些改變而減輕，反而增加了。軍隊的給養費，佔據政府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至八十。饑荒的災患也見增加，例如一九二七年的饑荒祇影響九百萬人，一九二八年的饑荒影響了二千七百萬，一九二九年的饑荒則影響了五千七百萬。一九三一年的大水災，因缺乏適當的堤壩而愈見加甚了這一次所影響的區域，在面積方面等於英國。新築成的公路雖能表示中國的進步，但是對於一般貧農倒是加了一重負擔。原來這些公路都是強迫農民去建築的，有時也不給工資。人民的道路權也被剝奪，而且不會得到報酬；當地的農夫是不准用他們的尖輪車在這上面推行。

當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後七年，一個幹練的外國觀察家說：『那些大地主是不惜犧牲一般貧農，去鞏固自己的地位。……由於腐化的軍事當局的默許，他們就得維持舊現狀，並得到社會的土地，更利用一般貧農和中農去鞏固他們自己。……一大批被土匪、內戰、水災、旱災、和饑荒等所驅逐而離開自己家庭的難民，也成了

中國困境的一種有形記錄。……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正在得勢的時候，有一批比荷蘭國人還要多一些的老百姓，簡直是無家可歸。一九三三年，那種情形影響了六千五百萬人民，約等於戰後德國的人民。……無厭的地主和鄉村中重利盤剝者的雙重壓迫，繼續地去蹂躪一般民衆，而未受阻止。』

我們可以證明蔣介石曾感覺到他的政府和民衆之間有一重隔膜，並且爲這件事抱憾。在他執政後的第三年，他曾召集國民黨黨員，要他們改正自己的缺點，他說：『我們這班發動革命的人，是被民衆視爲一個特權階級。他們對於我們的惡感，同他們以前對於「滿洲」人的惡感一樣。……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國民黨黨員真能爲民衆謀幸福；各人都被腐化和賄賂所沾染，而且是在爭權奪利。』

蔣總司令雖感覺到這些弊害，但他除了用武力以外，就沒有法去應付民衆方面的騷亂。在他看來，蘇維埃區乃是國家統一的主要障礙：在中國對外作戰以前，蘇維埃區必須先被剷除。一九三二年，當他進行第四次勦共的軍事運動時，十九路軍

正在上海勇敢地抵抗日軍而引起了全國人士的自尊心，同時中國的蘇維埃也在要求一種抗日的聯合陣線。第四次勦共運動失敗以後，就開始第五次圍剿，其規模比以前更大，而且運用一種新戰略。有七十萬大軍配上了現代的新軍器——包含一隊空軍——逐漸從各方面去壓迫在江西的中央蘇維埃政府，並築成數千哩長的軍用公路，和數千個碉堡。當地的農民，因了政府方面允許給他們田地，並得免稅，就覺得很高興。

這種逐漸緊束的鐵圈，使蘇維埃區漸漸發生饑荒；他們因了食鹽的缺乏，尤其感覺痛苦。於是他們就在一九三三年提出一個『告國民黨政府』，告一切政治領袖和中國各政黨』的請求書，表示他們願意同任何抗日的軍隊作軍事上的聯合。他們已在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上海時向日本『宣戰』了，但他們却沒有方法使這種宣言發生效力。他們現在請求中國政府停止進攻蘇區，使中國人民得到民治的權利，並且武裝起來，爲中國的獨立而作戰。但這種請求不會得到什麼答覆，而他們的提案也

不准在報紙上發表。因此他們就決定實行現代歷史上的一種最含有刺激性的偉業，並完成一切歷史上一個遠大的行程。原來紅軍的主力九萬人，憑着一種奇襲，竟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突破了四道防線，而開始它聞名世界的『長征』。

他們在世界上最崎嶇的一個區域，走上了八千哩蜿蜒曲折的路程，經過了華南和華西，然後繞到北方，中間又經過十八個山嶺，和二十四條大河。紅軍足足走了一年以上，幾乎每天要應付一些小接觸，和許多危險的戰爭。他們除了避免或戰敗中央政府所派遣的各種軍隊外，曾衝過十省軍閥的軍隊，和沿途佔據了六十二個城市。他們也碰到六個不同區域內的原始民族，其中有幾個在過去一世代中從沒有被中國的軍隊所侵入。他們又經過極西區域內沒有人煙的廣大草原。

其中一種極動人的勇敢行爲，便是紅軍的渡過大渡河。河的兩旁是許多峻險的削壁，在這裏，古代的許多軍隊——從三國時代直到太平天國——都在這個地方喪失了生命。爲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就經過羅羅族的疆域，和他們的酋長立了血

誓，因而解除了他們多年來對於漢族的猜疑。因此，他們在沒有被人們料到以前，就到達了大渡河，並覺得他們還有最後渡河的機會，因爲在河的兩岸中間有一條用鐵鏈造成的懸橋，但這上面的木板已被移去。紅軍中有三十個敢死隊，就冒着無情的槍彈，雙手握着鐵鏈，往前推進，以便渡過那條怒濤翻騰的大河。其中有幾個被擊死了，有幾個達到了鐵鏈的另一端，他們就同機關槍決鬥，並把木板鋪在鐵鏈上，使其餘的紅軍能夠前進。結果這幾個敢死隊都得到金星的獎章，那是紅軍中最榮譽的獎章。斯諾 (Edgar Snow) 於兩年後在中國西北會見這些英雄時，覺得他們的年齡都在二十五歲以下。(見斯諾的西行漫記)

紅軍在作那次長征的時候，曾宣稱中國必須爲未來的抗日戰爭準備一切。他們利用內戰的危機——就是強迫他們走上這個艱苦的旅程的——向十一行省宣傳國家統一的必要。他們宣稱他們要到西北，去準備對日的戰事。因此他們就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到了陝西。這地方是中國西北區文化的最早發源地，但現在它却成爲蒙古沙

漠邊上的一個乾燥的，荒漠的，人口稀少的地方了。陝西雖是『饑荒地帶』的一部分，而且在經濟上是很窮苦的，但在軍事上倒是一個重要的區域，因為它正處於日人力求前進，要在中國和蘇聯之間造成一個障礙的路上。

如果那一次長征被紅軍憑着宣傳，把中國統一起來，去一致抗日，那不管幫助了蔣介石在軍事上統一中國。他對於紅軍的追逐，使他自己和他的中央軍到了很遠的省分，而這些省分的主席除了對南京政府作口頭的承認外，並不會給以任何援助。在名義上，蔣氏是統率了武裝比較精良的軍隊，到各省來幫助他們抵抗他們的共同敵人紅軍，但實際上我們不大明白，究竟這些當地軍人所最怕的是抵抗過境的紅軍，還是受南京政府永久的壓迫。在紅軍完成他們的長征以後，許多遙遠的省分，特別是四川、貴州、和雲南，都一一服從中央政府的統治，這種情形是滿清政府覆滅後所沒有的。

在紅軍援助中國內地各省去完成統一的一年半的時期內，有另一個運動在北平

開始，目的是在統一和拯救國家。日人之壓迫華北，在一九三五年已增加它的程度，並聲稱要在華北成立一個自治政府。日本的飛機時常在中國城市的上空飛行；更有一個大規模的日本飛機場築在天津附近的中國領土上。佩帶全副武裝的日軍，怒氣沖沖的通過了華北各城市的街道，並佔據了豐台車站——到北平的兩大要道之一。日人宣稱要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爲華北兩省成立一個新政府；這種政府裏面，包含當地的幾個將領和親日安福系中的幾個著名人物，他們曾在一九一九年被中國學生所驅逐。日人宣稱這新成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是完全自治的，並和中國其餘各省隔開。

北平的學生又起來拯救他們的國家。在十二月十六日那一天，這班學生從早到晚都在推行一個大規模的示威運動。一萬名學生，排了整齊的隊伍在街市上遊行，但在有些地方，他們的隊伍是被警察衝散了。學生們雖受警察無情的皮帶、槍柄、和拳頭等的毆打，但他們仍和警察作平心靜氣的辯論，並且把許多傳單塞在他們的

口袋中；這些傳單的大意是這樣的：『告一般警察，和我們親愛的武裝同志……我們都是中國人。幫助我們去救國家。不要打我們，去打日本人。』這班青年，從早晨六點鐘起到下午四點，都是站在街上或列隊遊行，但是當消防隊裝上皮帶用水向他們沖射時，他們仍毫不畏懼地向着冰水前進，並準備受毆打。受傷的學生都被他們的同志抬了去，並加以看護。這些青年人非常有自治能力，驚動了整個北平城，因此新政府的成立就延遲了兩天，並且從不宣稱『自治』了。因此日人所希望達到的，利用陰謀和壓力，不靠大規模的戰爭，而使華北同南京脫離關係的一種計劃，就被學生們所破壞。

那種愛國運動很快地得到全國的響應。在上海的鐵路交通全都停頓了，因為有學生數千人佔據了北車站，要求乘車到南京，向政府請願。有一部分學生竟實行扣車，並在沿鐵路的各市鎮鄉村中舉行宣傳會，因此軍事當局就毀壞了一條鐵橋，使他們不能到達首都。在武漢各城，省政府當局甚至停止渡江三天，以阻止學生的

示威運動；但終於受了學生們的壓迫，准許一萬名以上學生在漢口舉行遊行。在新年放假的時候，學生們就組織小隊，帶了無數傳單到華北各鄉村中去工作。

不但是學生，連各界人士也加入愛國運動，並成立『救國會』。他們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內戰，釋放政治犯，並聯合國內一切黨派，以便共同抗日。那年五月底，上海方面就在一次大會中成立一個『學生救國聯合會』，到會的代表不下二十一區。在幾月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也宣告成立，到會的代表共六十位，代表五十種不同的職業團體。

這個新組織的誠意和決斷立刻被試驗出來了，因爲廣西的白崇禧將軍曾宣佈他是在組織抗日的遠征軍。他又要求政府准他通過北面諸省，以便進行抗日。那時的南京政府還不會準備接受這種行動，因此白氏的請求，不免引起了一種嚴重的政治上的危機，幾乎造成一種內戰。白氏雖是救國運動的一個朋友，但他們在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後，終於反對他所提議的遠征軍，因他們以爲要進行這個事件，免不了要

發生內部的分裂。但這種緊張的局勢終於得了和平的解決；中國輿論的力量能阻止兩派軍隊在意見上的衝突，使不致演成內戰，這還是第一次呢！這件事更是重要，因為廣西的將領，除了共產黨以外，要算是一個尚未與蔣氏和好的最重要團體。

蔣介石對日態度的硬化的第一種表示，是在他慶祝五十壽辰的時候，那時的民衆會捐款購買五十五架飛機去獻給政府。蔣總司令在他的向民衆演說中曾經這樣說：『在我們沒有恢復我們已失的主權和回復土地的完整以前，我們永遠不能成爲一個自由的民族，或一個獨立的國家』在這次演說中，他也宣稱一切『漢奸』必須肅清——『尤其是共產黨員。』那時民衆的反日活動是和共產主義列在一起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七個職員，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被捕；他們都是傑出的領袖，其中一位是法學院院長，一位是銀行的副經理，還有，幾位是著名的律師和作家。

那時對於中國的統一含有重大意義的事件，都是在進行之中。那些事件的背

景，便是綏遠的戰事（在北平的西北），在那邊中國將領曾把日人所統率的偽滿軍隊和內蒙軍隊擊退。在一九三六年冬，全中國對於這些自衛者充滿了熱烈的情緒。北平的婦女團體送一萬個慰勞袋給這些兵士。一般苦力也捐助銅元，官吏則捐助月薪的十分之一。南京政府則輸送大批軍火——包含八十架轟炸機——到西安（隴海路的末端），大概是預備運到綏遠的。接着總司令也親自到來，但他立刻使西安的軍隊明白（這些軍隊原希望派到綏遠、去援助在那邊的愛國同胞），他們這一次被遣派，不是去打日本，乃是要打共產黨。

在西安的中國軍隊，大多數是張學良（以前東三省軍閥）所統率的東北軍。他們和別的中國軍人一樣，都因了紅軍在那次長征中所顯示的異常戰鬥力、戰略、和將才，而感受深刻的印象。他們更被紅軍所提倡的『打回老家去』的口號所感動，因爲他們的家屬大都住在那邊。這些口號是這樣的：

打回老家去！

打走日本帝國主義！

東北地方是我們的！

華北地方是我們的！

全國同胞快起來！

我們不做亡國奴隸！

打回老家去！

東北軍和紅軍曾在西北有過幾個月的作戰經驗，在這期間，曾有兩師精銳部隊投到紅軍方面去。有的部隊則作了紅軍的俘虜，後來又被釋放，把許多關於紅軍的紀律、士氣、和抗日精神的燦爛紀述帶回去。最後，張學良將軍就同一個共產黨領袖會面，並成立一種非正式的停戰。

當他們明白了蔣總司令到西安的目的是在於重行討伐紅軍，西安學生知道了這個消息，就發起示威運動，結果因了警察當局的干涉，重傷了兩個參加示威的少

年，一個十二歲，一個十三歲。那時張學良也請總司令派他去打日本，不打共產黨；結果總司令就給他一個正式的命令，要解散他的部隊，派別的將領去替代他，並限他在第二天早晨答覆。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上，有十三位東北將領決定了他們的計劃；到次日早晨六點鐘，這種決定已完成了。一般叛變者就在那天早晨追趕到山上的雪地中找着了總司令，不但把他扣留，而且解除了他衛隊的武裝，把他們劫持起來，一方面，他們佔據了警察署，並攫取飛機庫中的轟炸機。在甘肅也發生了同樣情事，這就使陝西甘肅兩省顯然向中央政府謀反了。

這件事立刻引起了擴大內戰的威脅。叛變的軍隊宣稱他們依然認蔣氏爲他們的領袖，且沒有叛變的意向，他們的舉動不過是一種『兵諫』罷了。這種兵諫，包含停止一切內戰，釋放著名的七位救國會的領袖，和一切政治犯，准許愛國運動的自由，改組政府，務使各黨各派共同擔負救國的責任。但總司令拒絕一切談判。在南京的軍人就派飛機去轟炸離西安不遠的一個鎮，因而把戰幕揭開，但他們並不願意

這種舉動是要危害總司令的性命的。在南京的親日分子，倒喜歡看見這事的成就，並且願在內戰的殘餘上取得政權。全國的愛國分子對此大為震動，並願盡他們的力量使總司令得到和平的釋放。蔣夫人偕同端納先生（總司令的外國朋友和顧問）乘飛機到西安，接着她的哥哥宋子文（一個自由思想的愛國者）也到達西安。

在這種局勢下，一種最有效的勢力，便是陝西蘇維埃區（在西安之北的膚施）共產黨領袖的態度。他們對於這次事件，並未參加，而且在事後才知道。他們覺得蔣氏雖在討伐他們。但他的目的却在為將來的抗日作準備。好久以後，任弼時曾在山西某地對我說：『我們這樣的信念不是因了蔣氏的話，而是因了他築了公路和鐵道，以及在沿江地帶和華北幾個關口上，所築的防禦工程。這就改變了我們對於統一陣線的觀念。我們不再聯合中國人民去反抗日本和蔣介石，我們倒要和蔣介石聯合去反抗日本。但他並未了解我們的誠意，並且以為我們的目的是在推翻他。西安事變就使蔣氏深信我們聯合全國去反抗侵略者的誠意。在這以後，國共間就有合

作的可能了。」

共產黨聽得了總司令被扣的消息，就從蘇維埃區派了一個代表團到西安，而以周恩來氏爲領袖。周氏在十年前曾與總司令同事於黃浦軍校，後來又在上海被總司令判處死刑。周氏憑着他對於東北軍官的勢力，竟主張釋放總司令。蔣夫人自己會這樣寫着說：『共產黨和外邊所傳的不同，他們對於總司令的被扣並不感覺興趣。相反的，他們主張迅速的釋放他。』他們爲了贊助全國反對內戰的新威脅的一種輿論，就在經過一陣困難以後，感動了狂熱的東北軍官，放棄他們公審總司令的要求——這件事也許要促成總司令的死亡，並破壞他的一切聲望。蔣介石對於這些討論是知道的，最後他就願意傾聽一般扣留他的人和周恩來的話。當周恩來爲了主張釋放蔣氏而到西安的時候，蔣氏任西安城中懸賞八萬元以購買周氏頭顱的告示還沒有取銷呢。

在西安所遭遇的奇特事件——就是中國的最高領袖被他的部下所扣留，後來倒

因了他的敵人的懇求而釋放——在現代的中國史上却是一個轉機。在起初，好像中國最嚴重的內戰是要因此被引起的，但結果却使全國的統一完成了最後步驟。蔣總司令被這些非常事件所感動，相信共產黨是誠懇的，因他們把團結中國共同抗日這件事放在一切宿怨之上。在以後數月中，中國是在逐漸造成一種聯合陣線去抵抗他們的共同敵人日本。

但這個目的並不是立刻達到的。因在西安事件以後，曾經過數星期『醞釀』的情勢：——張學良因叛逆而被審判了；後來被總司令請求特赦了；在二月間國民黨全會中又有人指斥共產黨爲『共匪』，願意給以『悔罪的機會』。最後雙方就同意，把蘇區改爲『西北特區』，受中央政府的節制；一方面舉行地方人民的選舉，使多數共產黨黨員恢復職位。地主可以回到故鄉中去，但除了供自己種植的田地以外，不准接受其他土地。在一切新區域中，共產黨同意不沒收人民的土地，以便交換國民黨增加中國權民和注意『民生』的諾言。紅軍也被改組，而成爲政府的一支軍隊，並開

赴前線去抗日。這就實踐了共產黨在長征時代所說的話。但這事的實現是在數月以後，當日本發動了對華大規模侵略的戰爭時。

日本的軍閥很知道西安事變的重要。在中日談判時代，日本首相宣稱：『如果中國各派已成立諒解，日本就不能再繼續它的「觀望」政策。』在西安有四百個政治犯被釋放，——這是數千政治犯中第一批被釋放的——他們也覺得這件事的重要。他們中間有許多因了長期監禁而害病，多數已得了肺癆症心臟病，和祇治好一半的傷痕。他們在釋放以後，似乎忘記了他們身體上的痛苦，並熱烈地閱讀關於時事的新聞，討論那將臨的對日抗戰。因他們知道在西安事變中所成就的中國的統一，不是日本所能忍受的。

第九章

日本揭開了戰幕

閃電在安靜的空氣中，忽然亮了一下，因為那安靜的空氣中本已充滿了必然發生閃電的理由。一九三七年春，中國正向着國內的和平和國家的獨立竭力進行，其速度是十年來任何時期所不及的。南北將領所統率的軍隊，都在中央政府的命令之下改組了。共產黨是在計劃着和國民黨合作的程序。國內的經濟情形，政府的收入和國外的貿易，都是很快的從一九三四年的不景氣的水平線上恢復過來。公路、鐵道、航空線、和各項交通都很快地擴充起來。粵漢鐵路是在一九三六年完成的，那

是通過華中區，而把南北聯在一起的最後一環。

一九三六年冬，中國政府與日本代表作外交上的討論時，它的獨立性已比從前提高了。中國對日本所要求通到上海的航空線，曾作如下的答覆；日本必須先停止它在華北區的非法飛行。日本又要求中國再行減低稅率，中國就向日本提議，要它停止冀東區內傀儡組織的大批私運。日本又要求中國聘用日本顧問。中國的答覆是，如果日本的技師是最好的，它當然願意這樣做，但這是中國的內政問題。日本又要求取締在中國的『反日活動』，中國的外交家就回答說：他們是在竭力應付這件事，但日本自己的政策却不免引起這種活動。日本又要求在華北的『特殊地位』，並願援助中國去剿滅中國的共產黨，中國對於這一層雖不曾作公開的答覆，但據可靠的消息，南京方面確曾拒了這兩種提議。那在期望中的華北的『自治』，竟被學生的示威行動所破壞了。在綏遠的戰事顯示出，日本如果利用偽滿和內蒙的軍隊，那是不能作進一步的侵略的；這些軍隊不但被當地的中國軍隊所擊破，並在一九三七

年春發動了自己的反日行動。日本軍人必須憑着大規模的戰事去擊破中國的實力，否則就該放棄作進一步的侵略的希望。

日本的內部情形也要求有所動作。日本的人民開始宣佈他們是在反對那新興的軍人的法西斯主義。一九三六年二月間所舉行的選舉——是四年內第一次舉行的——顯示出人民的一種反法西斯主義的熱情。軍隊中的極端主義者用暴動去答覆這種選舉，他們暫時佔據了東京，暗殺了幾位高級官吏，內有閣員四人。此次事變中的最大損失，便是高橋的暗殺；他是日本的一個幹練的藏相，他主張一種穩健的資本擴充計劃，一方面減削軍事預算，並否認對蘇作戰的必要。那些發動事變的浮躁的少壯派軍官，事後都受到了壓制，但他們的政策仍被比較穩健的軍事領袖所採取。不過日本人民反法西斯主義的意志，迄未中止。日本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竟引起了一次罷工風潮。一九三七年前四個月的官方統計，顯示出日本曾發生九百廿九次勞働爭議案，這些數字比日本歷史中任何同樣時期內所發生都要多一些，而且比前

一年的同樣時期內所發生的幾乎多上兩倍。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三十日的另一次普選中，社會大眾黨（雖然是混亂的，但它却代表職工組合，）的票數竟增加一倍，但是民政黨的票數却減少了。所以除非日本軍隊能作迅速的行動，它的對外戰勝的希望以及對內的法西斯政權，也許要被日本的民衆所阻止。

國際間的情勢，似乎是有利於日本軍人所希望的征服的行動。歐洲人的思想均集中在西班牙問題上；他們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蘇維埃的軍隊正在注意清黨的運動。美國則通過了中立法，顯示出它比歷史中的任何時期更趨向於『孤立派』。這一些事實，特別是中國的日增的統一，向日本暗示，它應當作迅速的行動，除非日本軍人征服世界的迷夢，是永遠被一個擁有四萬五千萬人民的獨立國家的興起所破壞了。

在同年六月底，那將臨的戰事謠傳，充滿了北平均空氣；到了七月的第一個星期，這種謠傳越發加甚了。那時中國人認爲最可擔憂的，便是日本軍隊在蘆溝橋的

演習，蘆溝橋是在北平之南，而且是在平漢線上，也是通到中國其他部分的唯一不受阻礙的要道。所以在軍略上是極其重要的。中日間的條約並未允許日本在這個區域內軍事演習。中國當局雖對此提出抗議，但這種演習却繼續十天之久。在七月七日的午夜，日本軍隊宣稱他們有一個兵士失蹤，並有人向他們開槍，而且向着附近的城內逃去，——因此他們就要求中國准他們搜查這個城鎮。但因為那時已是午夜，守城兵士不願開門。因此戰事就在七月八日清晨四點開始，並繼續到九點半；結果中國軍隊因受日本重砲的轟擊，死傷了二百人。中國現階段的戰事，就這樣開始了。

當地的和平談判，同混亂的武裝衝突同時並進，佔據了以後三星期的時光。在這個時期內，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當中國的指揮者正在躊躇不決的時候（有的主張抵抗，有的主張妥協），日本的軍隊竟大批向華北推進。日本在華各地領事於七月十一日收到政府命令，叫他們準備撤退本國的僑民；在同一天，日本軍隊

帶了野戰砲，裝甲汽車，和飛機，到了天津。從最初，我們就可看出日本的軍部是在發動戰事。在七月十二日，南京政府要求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並宣稱任何當地的解決，如未得中央政府的認可，決不能發生效力。一方面，日本却要求華北的省政府不受南京政府的干涉，而向日本表示屈服，同時中央政府的軍隊不得開赴華北。但是日本的軍隊却繼續開赴華北；到了七月十五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香月宣稱他的意向，乃在於『懲罰不法的中國人。』在七月全月中，日本民衆對於他們軍隊的意向表示非常懷疑。於是東京政府就利用許多衝突，並佐以圖畫，目的在使人民注意日本的少數軍隊在中國有了生命上的危險。

七月廿八日晨，日本軍隊開始作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向中國壓迫。中國軍隊沒有統一的指揮，沒有軍事的準備，也沒有抵抗的計劃。當中國軍隊受當局的命令，毫無抵抗地離開北平時，他們竟痛哭失聲。但是冀東政府的反叛，立刻顯示出日本是不能再依靠受僱的中國兵士了，有一批以前當過土匪的，後來被日本認爲不很可

靠的，就在七月廿七日那一天，被日軍從冀東的『首都』驅逐出來，其中有數百人就在中途被殺。在兩天以內，（七月廿九日，）在冀東首都的其他受僱兵士就實行反正，屠殺了少數日本兵士，和二百多名日本人和高麗人，這些人大概是同冀東政府的私運事件有關的。七月廿九日這一天，對於中國是一個可紀念的日子，因為在那一天日本攻取了天津，沒收了充滿私人貨物的堆棧（其中包含值一百萬元的中國麵粉）並有計劃地毀滅中國的南開大學。這是日人破壞中國學術中心的第一次暴行，這使中國人明白，日人的用意不但是要使中國屈服，而且是要剷除一切獨立的中國思想。一個中國學生對於南開的被毀，曾作如下的描寫：

『誰能看着成隊的飛機載了炸彈來炸南開，而不發出咒罵的聲音？請你們注意第一架飛機拋下一面旗在我們的圖書室的屋頂上，作為轟炸的目標。接着就有好幾隊飛機有次序的拋下炸彈，並且回到它們的根據地，再去裝一些炸彈來。為的要確實知道那毀壞工作是完備的，就有一些兵士帶了幾聽煤油，把校

園四周的大小樹木全都燒了。……接着炮隊就向着那些未被焚燬的鋼骨建築物發炮。……南開是把現代科學的智識輸入到中國的第一個大學。它供給了工程師，化學家，和經濟學家，去發展我們的華北。〔見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的中國呼聲〕

在幾個月以後，漢口中國知識界的領袖，用一種興奮的感情告訴我說，在日人毀滅南開以後，他們就覺得那曾被蒙古民族所重視而願意模倣的四千年來的古文化，現在却遭遇了厄運，除非中國人能起來抵抗。

中國的軍事和民衆領袖，很迅速的以中央政府爲中心，而彼此團結起來。國內外的中國人紛紛致電南京，表示他們對於政府的贊助。壓迫反日煽動和抗日詩歌的禁令，也被撤消了。七月三十一日，著名的七君子（按即救國會的委員）也從蘇州的監獄中被釋。他們爲了反日的緣故，曾在那邊受八個月的監禁。在八月的第一星期，全國各地的軍事領袖都會集在南京，準備貢獻他們的服務。例如閻錫山將軍是

從華北來，白崇禧將軍是從西南來，劉湘將軍是從華西來，龍雲將軍是從雲南來，到南京還是第一次。南京政府和共產黨之間的協定已告完成；紅軍在朱德的統率之下，已改編為政府的第八路軍，向晉北前線進發。至八月底，每一個中國的軍事領袖都受中央政府的指揮。

日本的目的原在於攫取包含中國主要的煤礦和鐵礦的華北五省，同時要使南京政府失却效能，而聽憑華中和華南的屈服。日人之進攻華北，是從東三省向南，沿着三條鐵路進兵：一條是從北平向南到漢口，一條是從天津向東南到南京，另一條是向西而南，經過山西的高原而到西安。在這裏，黃河最南的一個灣曲點，就同隴海線的極西點連起來。這三條從北到南的鐵路線，是能支配整個的華北的。日本因為看到在華北的軍事行動，無論如何含有破壞性，總不能立刻影響到南京的軍事實力，因為南京的力量是靠着長江流域，特別是上海，——因此日人就計劃在發動這次戰事的初期進攻上海。

日本的一個海軍艦隊，利用上海公共租界的治外法權，忽在八月十一日開抵上海而在碼頭登陸，要求撤退中國的軍隊，並撤除上海附近的防禦工事。於是中國政府就立即遣派兩師軍隊來防禦閘北和江灣。第二天早晨，戰事已在幾個地點爆發。一經接觸，日本軍隊就迅速的敗退。後來日本憑着繁重的代價和海軍的合作，終於使陸軍漸漸在黃浦江沿岸登陸。那時日本的飛機不但轟炸上海，更轟炸內地的各城市。日軍雖具有更優良的軍器和飛機，但終於不得不爲每一尺土地付重大的代價。閘北和江灣的中國防禦線，抵抗敵人的飛機，軍艦，和機械化部隊至七十六天之久。最後因了中國軍隊受更多的登陸日軍的兩翼包抄，不得不退到一個新防線，但這個新防線以後也同樣的被日軍所包抄。日人之佔領上海，於十一月十二日告一段落，那是經過了三個月的戰爭，使日本遭遇到自日俄戰爭以來最重大的軍事損失。

上海的陷落並未動搖中國民衆的精神；在另一方面，中國軍隊的英勇的抵抗，使他們第一次相信他們是能戰敗日本的。在肉搏戰中，中國軍人證明他們至少和日

本軍人相等而且更能常常勝過他們。有許多英勇的部隊往往在槍林彈雨之下，堅持到最後一人。其中有一營兵士，於九月九日在寶山完全犧牲，此外更有從湖南開來的四營兵士，因不肯放棄他們的陣地，於十月廿四日完全被侵略者的炮火威力所消滅。那最著名的『孤軍』，是八十八師中的一營兵士，他們藏身在離公共租界不遠的一個堆棧內（四行倉庫），憑着他們的手溜彈和機關槍，和敵人集中的大炮，重機關槍，和燒夷彈作四天的抵抗。在上海的中外人士都對他們作屏息的注視。那時有一面很大的中國國旗，是市民協會私下帶給他們的，它飄揚在堆棧的屋頂上，使民衆都能看見它。到最後，蔣總司令就命令他們退出那已在焚燒的堆棧，全中國的民衆都贊揚這些兵士的英勇和堅忍，並相信中國是能得勝利的。

按照紀錄上的數字，中國全國共有兵士一百萬人，但其中有許多是訓練很壞，而設備不周的省防軍，對於實際的戰爭幾乎完全無用。雖中央軍中的最精銳部隊，其來復鎗僅及日本軍隊的四分之一，機關槍僅及日本軍隊的六分之一。至其他軍隊

因在最近才受中央政府的節制，所以不但將領方面沒有統一，而且在空軍，炮隊，和步兵之間，也沒有聯絡，甚至在獨立的步兵隊之間也缺乏聯絡。字林西報在描寫北方的一次戰爭時，曾這樣說：『中日兩軍在軍備上的差異，幾乎等於用來復槍去攻擊弓矢。日人有數百輛運貨汽車，坦克車，和各項現代的大炮。它有一百架飛機參加多次戰爭，盡量的向着沒有一架飛機和一支高射機關槍的中國軍隊拋擲炸彈。這就破壞了中國軍隊的組織，並到處阻止他們作堅強的抵抗。』

中國軍隊組織中的這些嚴重的缺點，在上海方面的肉搏戰中並不怎樣顯著，因爲在這種戰爭中個人的英勇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華北的戰場上，以及當戰幕擴大到上海市區以外，而向揚子江三角洲地帶推進時，那些缺點便引起了嚴重的結果。在十一月的最後三星期中，日本軍隊佔領了近上海的一切區域，並分成幾個支隊向中國政府的首都南京一齊進發。到了十二月的第二星期，南京也被他們奪取了。因爲日人早已爲了現在這個時期作準備，並且在間諜工作上力求精密，因此日軍很詳細

的知道揚子江三角洲地帶的河流的全部組織，並且比多數中國將領知道得更詳細。

南京陷落後日軍大規模的姦淫，搶劫，和屠殺行爲，震動了全世界。在其他城市和鄉村中也發生同樣的殘酷行爲，但是因爲南京充滿了旁觀的外國人，所以有許多無可爭辯的事實便洩露到外國去。有千餘中國兵士，拋棄他們的武裝，毫不抵抗的投降了，（其中有少數兵士是聽了外國宣教士的勸告才放棄抵抗的，他們的目的是要保全這些兵士的生命，）但他們都被日人綑紮在一起，一批一批地槍殺了。有數千中國人民，因有了援助中國軍隊的嫌疑，還有一般婦女和小孩因冒犯日本的兵士，也都不能避免這樣的命運。有一個中國人，因躲在一堆屍首下面，得以保全他的生命，他就逃出來，向勸告他投降的一個外國宣教士報告，說他的幾個同伴都被日軍當作練習刺刀的目標，有的則作爲來復槍的目標；有的則被機關槍整批的掃死，然後澆上汽油，把他們用火焚燬。長老會醫院中的傷兵，是在病床上被日人殺害的，還有女看護被強姦，醫生也被殺死。

日本兵士大批的搶奪婦女，是一種普通的行爲。一個美國宣教會的醫生曾告訴我，在揚子江三角洲地帶有一個城市，被日軍圍困了一部分，把裏面的男子都全驅逐，祇留下婦女，以供蹂躪。有十個隸屬於美國宣教會的中國女子，憑着他們男性的親戚傳達口信，終於被一位勇敢的美國醫生所拯救，他是拉着她們從那些上了刺刀的日本衛隊中逃出來的。別的宣教士也告訴我日人在中國鄉村中的同樣行爲；在那邊，非武裝的男子全被驅逐出來，並拋下他們的婦女，去受命運的支配。

甚至美國的家庭和宣教會也往往不能保護他們的中國傭婦，以及躲在他們圍牆裏面的避難婦人。有十五處美國的家庭曾被日軍強迫侵入，有時且把美國國旗扯下來，這些事件都寫在美國外交部對日提出的抗議書中。日本軍隊之蔑視外人的權益，可以從他們多次侵入外人的家庭，和故意轟炸英美停在揚子江口的輪船（其中最大的一件，便是毀壞美國炮艦巴納號和三艘商船）這些舉動中所見到的，日本似乎對於征服中國這件事極有把握，所以就準備排斥西力的列強。

在南京陷落後，日本希望中國政府能完全屈服。但這一點並沒有實現，理由有好幾個；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便是兩個月前日軍和八路軍之間，在一個長城關口的作戰。那邊的平型關是一個極其偏僻的關口，而且不被外國記者所注意，所以在幾星期後，人們才始覺得那邊的勝利，以及此後的忻口之役，對於中國的拯救，簡直要比以後台兒莊的勝利還要重要。

在日本所憑着向南侵入中國的三條鐵路線中，有一條是向西通過山西的高原的，它在戰略上最覺重要，因為它的高原是能包抄其他兩條山路。日人覺得這個地點的重要，就遣派大批生力軍，在著名板垣少將（就是後來升任陸相的）的統率之下，去奪取這地點。這些軍隊在侵入山西後，因為對中國軍隊極其藐視，所以當他們迫近高原的一個關口時，甚至不曾遣派偵察隊去巡邏。所以在九月廿五日，當日軍通過一條狹窄的山谷時，八路軍就從山嶺各區向他們猛撲，並完全消滅了長約二英里長的軍隊，戰馬，給養，和車輛。在一天黃昏，他們消滅了一個聯隊的半數人

馬，並佔據了敵人的一切據點。

中國這次的勝利，着實阻擋了日軍的前進，因此當他們從別的關口侵入晉北以後，就有衛立煌將軍所統率的軍隊在前面加以抵抗，更有八路軍擾亂他們的後方，這樣就在忻口阻滯了一個月。板垣的精銳部隊在晉北的延遲，使在平漢線的其他日軍不能繼續前進。在一個時期內，他們甚至被迫而放棄他們的目標——鄭州和漢口——以便向西援助板垣師團。

在這個局勢中，時間是非常重要的。日軍在山西的延遲，以及其他軍隊的受阻，不能向南進取，終於使日軍不能到達華中，原來那時日軍的到達華中，似乎要給中國以致命傷的。漢口在這時是完全沒有防禦的；蔣總司令的最精銳部隊和他個人的最大注意都集中在揚子江三角洲地帶的戰事上。那時日軍已計劃在南京會師，他們不但要從上海去攻打南京，並計劃在奪取漢口後，沿長江而東下。如果日人能達到這個目的——他們也許能這樣，除非他們在平型關不受阻礙——那末在南京陷

落後，中國政府就沒有後退的餘地。（關於這次戰爭的更詳細記載，請參閱本書第十一章。）況且那時失敗主義者的勢力相當強大，所以那時南京的陷落，就等於中國的完全屈服。

但是當南京最後陷落時，情形是很不同的。那戰勝者方面因了中國軍隊在上海的一種堅強抵抗，已覺得精疲力盡；同時中國軍隊更向一個新的陣地退却。當中日兩方在休息，並整理軍隊，爲日後的戰爭作準備時，中國人就有時間從第一期戰爭中得到充分的教訓。他們知道，從這些戰勝者方面他們不但要受到政治上的壓迫，並且連中國人的文化，安全，和生命，也要遭遇無情的摧殘。他們也知道失敗就要使男女老幼一齊被殺，他們的房屋被搶劫，他們的婦女被姦淫。他們也知道投降不能使他們得到什麼憐憫，而僅能使他們在受『保護的村莊』中作奴隸，並把青年受教育的機會完全消滅。他們也知道他們是能在肉搏戰中把日人擊敗的，雖然日人能憑着優越的機械化部隊把最勇敢的中國兵士掃除。最後，他們也從平型關的戰事得

到教訓：雖然是機械化部隊，也可憑着兩翼的包抄和交通線的阻斷把它們擊破的。

由於這種知識，他們就產生了更大的決心，去繼續抗戰，一方面爲將來的戰事計劃。從這種知識中，中國政府得了一個新根據地。十年以來，中國首都對於上海——包含銀行家，國外貿易，和世界的帝國主義者——所有的依賴，因了南京的陷落而告中斷。蔣介石於十二月初在武昌新行營中曾向全國播音，在這次演說中，他已感覺這個新根據地的力量，他說：『中國在長期抗戰中的未來勝利，其基礎不在南京或其他大城市，而是在全國各地的鄉村以及人民的決心。』說了這些話以後，蔣總司令就回到他力量的發源地，而這力量曾在十年前給予北伐軍以不能征服的勁力。

在今日的中國，有人會巧妙的對你這樣說：『日軍在奪取南京後，他們在戰事上就失敗了。』中國的兩個首都已失去了，有五個行省已被侵略，大規模的工商業已被破壞了，但是中國憑着多數堅強不屈和勞苦不辭的農民，在一百萬方哩的土地上的努力，一方面把它的背部靠在大山和亞洲的沙漠上，這樣它就開始作戰了。

第十章

中國往內地遷移

中國人的生活，因受了戰爭旋風的驅迫，就向內地遷移了。首都已經遷到四川的重慶，那就是『天府之國』，也就是中國領袖避免歷史上侵略的一個安全地點。但這次遷移不過是一種更重要的遷移的先兆吧了。因為除了政府各機關和整個的南京城以外，還有更多的人民向內地西遷。原來人生、工業、和文化——包含上海的銀行和工廠，北平的學生和教授，以及沿海各省的數百萬人民——都向西遷移了。他們竭力要在落後的內地使他們安定下來。這樣，一個新中國就在內地揭開了序

幕。

上海是中國商業的中心，現在却成爲死城了。中國人稱它爲『孤島』，不是指地理上說的，而是指上海四周都被日本軍隊所包圍，以致和中國大陸隔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形式上仍是存在的，高大的辦公處雖仍矗立，但是往來的營業却已停止。除了裝運軍隊和軍器的日輪以外，到埠的船舶已大見減少。他們所以放棄上海，並不是因爲上海還有什麼危險，而是因爲它不再有什麼賺錢的貨物。外國的商人和新聞記者，不過按照他們數十年前的日常慣例，去進行他們的事務，覺得各方面都是黯淡的。有幾位已開始向其他城市遷移；有幾位却在猜測，究竟上海會不會在一年，五年，或十年內恢復原狀。要這班人承認以前上海的繁榮，不是由於外人的緣故，而是由於浩大的中國的內地，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這東方的最大海口上海，如果一旦同內地的生活隔絕，它就成爲一個死城了。

在租界周圍的更大的中國市區，以前曾有過二百萬以上的居民，現在却連軀壳

都不存在了。它不但是一個死城，而且是一個被害的城。我曾乘車經過以前繁盛的工廠區，看見那邊已成爲一片瓦礫場。我在任何戰爭中，從沒有看見這種荒涼的情景，原來這次戰爭並不是正常的戰爭。這種荒涼情形，乃是在戰後所造成的；例如在日軍佔領南市後一個月，南市方被焚毀。在一個小小的虹口區域內，就有九百家工廠被毀。在全中國被毀的工廠，總算起來，當不下八千二百九十七家。（見中國向日內瓦國際勞動大會所提出的報告）其中大部分在揚子江三角洲一帶。

我因得到特許證，得在被毀區域內遊行——在那邊，中國的住戶還不准回去——我看見幾英里長的地方全是一片瓦礫和一些彎曲的柱子，此外便是偶然看見幾隊苦力，在日人的刺刀之下，搜集各種遺留的金屬片，以及鎳管、鐵器、和生鏽的釘。按照一月的估計，大約已有十萬噸以上的碎鐵被裝到日本的軍工廠中，那些都是在上海破敗的房屋中拾得的。和我同去的一位朋友，在傾倒的牆垣和破壞的房屋附近告訴我說：『這裏面曾住過一個廣東人，他有五十名學徒。……這裏是一位從

浙江鄉村中出身的勞動家，他憑着他一家的努力，終於買了一架車床，並僱用若干工人……現在松井可以回去向日本的實業家說：「你們在東方的一個主要的競爭者已經死了。」

在揚子江口三角洲地帶，有數千萬人民，都在戰事以前向西遷往內地。當我在隴海路旅行時，我看見他們擁擠在車站上，想盡力擠上火車。但他們因爲人多，甚至擠出車站和水溝以外。他們擠滿了向西通到漢口、西安、和長沙的各公路；那些新造的汽車路，以前是不准農民笨重的車輛行駛的，爲得要保持路面的平衡，現在却允許了許多原始性的運輸工具。一般有錢的人，則坐轎子或人力車或馬車，也有騎着驢子和騾子的。有的則推着手車或小車，去裝運他們有限的所有物；還有數百萬萬人，僅僅在肩上挑了自己的行李。帆船，民船和舢板，都裝着大批難民，沿着河道駛去。

這種人類的慘劇所造成的混亂，是難以形容的。在漢口的一個難民收容所內，

有一對夫婦，因為以前在混亂中擠上火車時，竟致遺失一個九歲的男孩子，現在他們還在為這件事而悲痛。這種骨肉分散的事件是很普通的，有時還包含更傷心的事實。有一個家庭，爲了要保存他們僅有的二百塊錢，就把這筆款子藏在一個病孩的尿布中。後來那孩子竟在路上死了，因為擁擠的船上，不能把孩子的屍體保留，他們就決定把那孩屍拋在河中；他們已發瘋似的忘記了家庭的幸福。另一個家庭告訴我：『他們一家所有的錢都由他們的母親保存，但不幸那母親竟在睡眠時從一個很擠的民船的甲板上滾入水中，結果遺下了她的丈夫和六個孩子。』

有一部分向西旅行的人民是有組織的。南京城內軍民的撤退，是根據軍事計劃的第一步撤退傷兵，然後撤退公務人員——他們在清晨接到命令，在下午就乘上特別預備的火車和船隻——最後是撤退平民。工廠和大學也往長江上游遷移，有時他們竟裝了一大批完整的設備。南京中央大學把它的一千一百名的學生、教員、圖書和實驗室的設備，都裝上輪船，並行駛一千多英里，向西到達重慶。他們在那

邊找不到可用的房屋，於是他們就在茅屋中上課，並在四十天內造成二十四所臨時校舍。南京著名的興福齋菜館，號稱從明朝開到現在，在十五世紀時且有皇帝光臨，現在這家菜館因不願招待日人，就從南京搬到漢口去了。蔣夫人的堅毅的精神，曾保存了南京博物院中的數百箱古物，那是從中國藝術的黃金時代所傳下來的，都是無價的藝術珍品，後來就從南京裝到華西去了。

在那次大規模的遷移中，有許多勇敢的人民不但爲保全自己而西遷，同時也把秩序、團結、和知識輸給別人。我在漢口遇見一羣從上海來的眉目清秀而熱誠爲懷的紗廠工人，她們在戰事發生後，就爲她們的國家擔任義勇工作，她們曾在女青年會的夜校學習急救法，並曾服務上海的傷兵，直至軍隊撤退時爲止。當軍隊撤退時，其中有一位穿了軍服，一位穿了藍色的棉褲，餘者都穿了羊皮鑲邊的衣服，並且除了隨身的衣服外不帶任何行李，隨着撤退的軍隊退去，爲得要『保持民衆和軍隊間的合作』。這種組織是極其需要的，一來因爲中國農和民軍隊之間，向來有一

種惡感，二來因爲八十七師的兵士中（師部中有隨軍的女子）有許多從西南各省而來的青年，因爲不能說上海話，往往有被誤認爲敵人的危險。因此那些隨軍女子，就替他們當翻譯，並向他們解釋對農民表示禮貌的重要，一方面又向農民解釋，爲什麼他們應當供養軍隊和看護他們的創傷。

這種偉大的西遷，在它的混亂、痛苦、和愛國的熱誠中，雖不免把嚴重的問題帶給中國的內地，但它也把力量和智力帶到內地去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在工業，商業，和教育方面的組織頭腦，向來是仰仗沿海各省的銀行，工廠，和大學去接濟，和僱用的，現在却向着內地去發展中國的鄉村了。新的公路和鐵路、軍工廠、飛機庫、工廠、和大學都已設立了——有時固然是遲緩的，無效率的，有時却具有驚人的速率。每一個內地的省政府，都因了許多中國領袖的到達，以及戰事的危機而受了刺激，願意爲國家作勇毅的努力。

國民政府新都的所在地重慶，是華西的主要江口，也是四川肥沃的紅色盆地的

一個出口。重慶離開長江下游一千四百英里，並越過了險要的巫峽，所以不是日本的炮艦所能到達的，同時對於空襲方面也覺得太遠一些。但多數的行政機關却在半路上停了一些時候，他們在武漢設立辦公處，在那邊有溝通南北的粵漢路，以及通各省和各戰場的揚子江。政府的官吏，在重慶和武漢間往來飛行；他們向內地遷移的速率，要看他們在重慶方面能否找到辦公處，另一個原素，是在漢口有沒有那種意料中的危險。一九三七年聖誕，當我初到漢口的時候，許多人預料在兩星期以內日本軍隊就要到達漢口。那時城中充滿了關於屈服的謠傳。南京方面的潰敗，加上了數萬名頹喪的和受傷的兵士，以及數百萬難民向內地遷移，使政府方面不免有些寒胆。那時中國人的抵抗，可說是到了最低潮。

日本轉託德國大使向中國提出和平條件。日本駐華盛頓大使曾這樣說：『全世界對於我們的中庸態度不免要引起驚駭。』但是中國人的驚駭不是這種『中庸』之道所引起的，而是由於一種震動，覺得日本不再以得到華北為滿足，它所要求的是全

中國的統治權。日本提交蔣總司令的文件中，包含：（1）統制中國的外交關係，（按即加入『反共協定』），（2）管理中國的警權（『共同勦共』），（3）統制中國的自然資源（『經濟合作』），（4）日本駐屯軍得在中國各軍事要點駐紮，以作一種軍事上的担保。如果中國要圖生存，唯一的方法便是抗戰。

據一個可靠的權威者告訴我說，當德國的大使在那年十二月來拜訪蔣總司令和蔣夫人時，那位不屈的夫人，雖然非正式的知道了那些條件的性質，竟用以下這兩句話向那位大使請安，使他覺得非常驚奇：『陶德曼先生啊，你帶給我們幸福！今天下午，我們擊落了四架日機！』

這位大使受了這種歡迎，多少有些不安，就把他帶來的條件交給蔣夫人，（蔣夫人是替總司令代讀外國文字的），並且說：『我把這些文件交給你，但我不願下任和批評』。

那位夫人把文件隨手擲在一旁，好像不值得去注意似的，她並且說：『我也這

樣想！』接着她就帶着一副很漂亮的款待的態度，微笑着向那位大使說：『陶德曼先生，今天你的可愛的孩子怎麼樣了？』這樣，這個偶然事件在外交上就宣告結束了。

後來這些和平條件在中國發表後，中國民衆的反感同蔣夫人是一樣的。他們把這些條件拋在一旁，認爲是不值得注意的；他們開始準備長期抗戰。蔣總司令宣布徹底改組中國的軍隊，並開始視察各前線。在每一個戰區中，他對一班召集的將領說：『美國爲了獨立而戰爭了九年。如果中國爲了獨立而必須戰爭九年，那麼我們也能夠戰爭到九年。中國比美國有更多的資源。我們現在的失敗是不足爲奇的，因爲我們所有的是十九世紀的軍隊。我們必須成立一個新軍隊，使軍官和士兵之間，以及軍隊和人民之間有了一種新關係。我們必須設法，使一班普通兵士也能提出他們的建議和批評——也許這是要經過某種軍事訓練的。我們必須有一種統一的紀律；那些未奉命令或沒有充分理由而擅自退却的，是要被處決的。我們不但要組織

軍隊，而且要組織整個中華民族。我們現在有充分的基金，使我們可以再戰兩年；如果這些基金是耗竭了，我們就會另想辦法。我們不可專靠外國，而是要靠我們自己。如果我們顯出自己是有力量的，那末，外國就會幫助我們了。」（以上根據會出席洛陽會議的彭德懷將軍的口述）

在這些會議中所決定的戰略，是得之過去六個月中失敗的經驗，一方面也根據八路軍所採用在山西得到成功的游擊戰略。這種游擊戰略，是把陣地戰和游擊戰聯在一起的，從此那些英勇的部隊就不再像上海的戰事那樣，抵抗至最後一人；這些英勇的兵士的損失，其代價實在是太高了。陣地的防守，僅僅到了日本機械化的力量壓迫過甚，覺得不再有堅持的價值時，才行毀壞和放棄，以便引日軍深入中國內地。那時日軍的交通線，不免要受無數游擊戰的阻礙，而延遲了他們的前進。這樣的戰略準備作數年的奮鬥，終於要使日本感覺精疲力盡的。日人如深入中國內地，他們的交通線就愈加延長。他們到了內地以後，必有一個時期不能繼續維持他們的

地位，同時中國軍隊繼續的攻擊，就會把他們消滅。

當我在漢口時，人們時常對我這樣說：『日軍的大炮和飛機能消滅或攫取任何城市，但永不能消滅或攫取中國所有的城市。在那些小島上沒有足數的人民可以違反我們的意志，而隨時隨地把持全中國。』在這些話裏面所包含的戰略，是要靠着中國民衆的愛國心和堅忍心的。因此中國的民衆必須因受激動而趨向於統一，一方面把他們自身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要達到這個目的，政府方面就把軍隊徹底改組了。那動搖的山東軍閥韓復榘，因不戰而把他的省城放棄給日人，就被判爲反叛，而和其他地位低一些的漢奸同時受刑。韓氏所鎮守的山東省，此後就受南方著名的健將白崇禧和李宗仁所統率，這二位在廣西時，對於訓練民衆，曾有過燦爛的成績。八路軍的副司令彭德懷氏，乘坐蔣總司令的專車到漢口，並在車上討論遊擊戰略。在這以後不久，『民衆動員』（就是戰時的民衆團體）的主持者，就被一位幹練的陳誠將軍所代替，他在一九三四年，曾把共產黨從江西驅逐。『民衆動員』的

副主任便是周恩來氏，他是共產黨駐漢口的總代表。這樣，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聯合就大胆的促成了。

在中國的未經佔領的區域內——從華南的廣州到西北的甘肅——一種有力的發展正在進行着。在長沙以西的鐵路很快的通到了貴州，那是西南的一個被山嶺隔絕的省分，直到最近，它才看見一種有輪子的車輛。此外政府方面又準備再造一條鐵路，從西南通到法屬印度支那方面的海口。在作戰最初六個月內所建造的公路，比前十年的和平時代所造成的要快上四倍。這些公路的建造，不但是爲內部的交通，而且是要把中國的內地同歐洲和其他區域聯絡起來。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兩條『萬里公路』（按即三千英里），一條向西南通到緬甸，另一條向西北通到俄屬土耳其斯坦。中國工人的努力和速度，雖然不靠現代的器械，但已在改進漢口飛機場這件事上充分顯示出來。原來新到的轟炸機需要一條寬大的新跑道，其建築工程是非常浩大的。據一位美國的工程師說，如果用美國的機器，也得需要一個月工夫才能把那

條路築成。但是四萬名中國苦力，不靠機器的效勞，竟在十天內把那條跑道築成。他們那些不需要的石版路剷平了，並且把它們搬了去造成飛機的跑道。我的一位朋友告訴我說：『我在下午二點從漢口格非·瓊士（Griffiths-Jones）教會學校進城，到下午七點鐘回來時，看見我所走過的那條路已經沒有了。原來他們已把這條路拆到飛機場那邊去了。』中國人民在若干世紀以來，曾建築大規模的堤壩、城牆、並開鑿運河，他們所用的是大批有組織的勞工，而不是現代的機械。

在各內地的省分，人們都在注意來年的糧食問題。中央政府禁止人民種鴉片，並將種鴉片的農地改種米穀。從前種釀酒的糯米的區域現在是減少了，因的要種那些可以作爲糧食的米穀。湖南的銀行在我訪問它時，曾提出六百萬華幣作農村的放款，目的是在改進種籽、肥料、和灌溉的計劃。四川也照樣提出一千萬元，以作農村方面的放款。廣州市長曾請我吃甜山薯，以作午餐，他說這些山薯是很甜美的，但也可以作爲平民的食糧。指着他又說：『在本省，我們曾定下辦法，要在一個月以

內，不吃米飯三天。在來年，我們要種植充分的米穀以供我們自己之用，但本年倒覺得不夠。當我們能得到其他食物去作糧食時，我們就不必向外埠去裝運食米了』

當我造訪西南時，實業部曾兩次遣派調查團去考察甘肅和四川的礦產。結果有許多有益於戰時工業的礦產被發見了。據說油料也大批的被發見，而且有發展的可能。又因為軋士林的缺乏，是未來戰爭中的主要問題之一，因此內地各省人民的私人汽車就一律改用木炭。那些具有發明性的中國人，就造一種燃燒木炭的機器去發動汽車，但這種木炭不免要留下太多的炭氣，所以必須時常清除——對於這個問題，他們立即開始工作。

我認識了一位年輕的中國工程師，他是辟滋堡 (Pittsburgh) 大學的畢業生。他從南京帶出了四十位經他訓練，而能製造鋼鐵的技師。這位工程師是『正確的，敏捷的，如同美國人一樣。』他被政府所遣派，到新嘉坡去輸入一個『流動的鋼鐵廠』所需要的機件，並且把它們裝配起來。據他的解釋，大規模的鋼鐵廠需要大規模的

鑛產和現代的交通工具，但他所設計的那種小規模的鋼鐵廠，祇需要五萬金元以下
的資本金（美金）就可以把它建造起來；如果照樣把它們重設幾個，那需要的經費還
可以減少一些。這個鋼鐵廠將在內地小規模的礦區方面建造起來，那些地方不是日
本的轟炸機所能及到的，而且因爲規模很小，雖然被轟炸了，也不會受到重大的影
響。每一個鋼鐵廠每天能鍊成三十噸鋼鐵，並且要裝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一大批未經組織的，從戰區逃亡的民衆，也開始組織起來，以求適合中國的有
組織的生活。漢口這個城，因爲受了第一批難民的光臨，就把所有的食糧和醫藥設
備，完全消耗了，於是當局方面趕緊把這些難民輸送到農村區域，因爲在那邊每個
人祇需要一分半美金，就能使他們喫飽。那時青年會和女青年會就爲難民設立收容
所，教他們識字，並爲他們找職業。國外宣教會的機關，也進行同樣的工作。中國
的舊式同鄉會，近年來常被人們視爲一種反動的勢力，因爲他們吸引了自己的同
鄉，而危害國家的幸福和統一；但是在這個時候，他們倒很有用處的，因爲他們是

在竭力照料一般同鄉的難民。他們彼此競爭，要使自己的收容所辦得最完備，這種收容所中，不但供給難民糧食，並且設立理髮所、診療所、閱報室、和娛樂室。有許多機關都在利用難民的閒暇時間，使他們對於國家有所貢獻：他們所擔任的工作，是從建造防空壕起，一直到製造昇床。

這些不過是一九三八年的最初幾月內，中國內地方面的幾個大規模的組織罷了。和經濟的發展同時並進的，便是一種偉大的文化的前進。在以前，中國的最高學府大半設立在北平、天津、和上海一帶，但這些學府，有的是被燬壞了，有的則不得不閉，現在都遷到內地去了。有許多被毀的大學，把它們自己聯合起來，在西安和長沙設立兩個『聯合大學』。有幾個大學是很完整的遷到內地去，未受戰爭的影響。天津的南開大學和南京的中央大學，都遷到中國的新都重慶。內地的一般人民能得到著名的北平教授的光臨，都覺得非常興奮。在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上，它的內地的子孫，從沒有像現在那樣的得到如許受教育的機會。又因了戰事的需要，以及

和內地的接觸，中國的教育就更加實際化了。研究工程的學生就去研究怎樣搭造浮橋，怎樣建造避彈室，和水泥鋼骨的堡壘。研究社會科學的學生就去研究如何組織農民的方法。

中國爲要抵抗日本在現代軍器上的優勢，就不惜利用它的廣大的地域和民衆的力量，去爲他們自己的祖國奮鬥。政府也開始對內地民衆規定工作方針，以便把他們鼓勵起來，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以達最後的勝利。一般經過這樣鼓勵，組織和武裝的民衆，不但能在戰時表顯他們自己，而且能在此後的和平時期內，對國家的改造和政府的工作都有新貢獻。要知道新中國，單是去觀察漢口，是不夠的？因此我就在一月初坐着閻錫山將軍的專車到山西，去觀察那些已著名的西北戰士。

第十一章

西北的戰士

在一天早晨，漢口車站的路警，上了刺刀，把一切乘客趕回去，並宣布說：那一天的火車已向北方開去了。於是我的傳譯者很得意地說：『我們不妨坐「老閻」的專車』。因此我們就走到燈光黯淡的車站，看見那邊有一長列的火車，中間就是閻將軍的花車和餐車，兩端接着兩節衛隊車。有兩支輕高射機關槍裝在靠近車頭的鐵篷車上，因這火車所經過的區域是時常受轟炸的。

在那一系列車的後面拖着十餘節貨車，其中裝着六百名學生，同我們一同到北方

去開辦一所在閻將軍領導下的新大學。有幾位大學教授坐在二等車內，沿路計劃該大學的課程。我是和李公樸教授同坐在一節車上，他是一位精神愉快，而精力充足的人，他是在蘇州被拘禁的七君子之一。以前他曾在美國俄勒岡州(Oregon)的李德大學(Reed College)肄業一年，在那邊他認識了馬克斯的資本論，那時這本書在中國還是一部禁書呢。他回國的時候，經過巴拿馬和歐洲，爲得要觀察紐約和倫敦的世界都會。回國後他曾拒絕南京政府的幾個肥缺，以便專心辦理幾種自由思想的刊物，但這些刊物常被當局者所禁止。當他被拘時，他正在辦理中國最大的巡迴圖書館，一個有五千個學生的補習學校，和一種進步性的半月刊。他的八個月的牢獄生活增高他的名譽，現在他在這個新大學內，已做了閻將軍的顧問。以後他打算通過日本的防禦線，以便在西北的農民游擊隊中組織班級。

李氏對我說：『這些青年學生是從全國各地來的。閻將軍也接到最遠的省份的電報。我們已經有二萬五千名學生報名。他們爲什麼要來呢？他們多數不是窮學

生。他們是從一個喜愛和平、文化、和舒服生活的有閒階級那邊來的。但在這裏，他們却發瘋似地爭着要到前線去。他們像平常兵士那樣，坐着貨車去旅行。他們知道山西的空氣是非常寒冷的，並且沒有好的地方住，沒有好的東西喫。他們也知道在數年之中，他們也許不能回家，因為鐵路是時常阻斷的。但這一切，他們都害怕。他們祇怕沒有登記的機會。

『但有些學生却躊躇了。這不是爲了艱難。他們所以躊躇，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這個大學究竟是怎樣的。你能因此責備他們嗎？不，連我自己也沒有確實知道呢！』——他說着這些話，不覺大聲哄笑一陣。接着他又說：『現在我知道一些了，因為我曾和閻氏有過初次的討論，他接受了這個程序的第一部分。我們必須喚醒民衆，把他們組織起來，訓練起來，武裝起來；我們必須改組軍隊，把新血液輸入到政府方面。祇有這樣，我們才能在全國革命的鬥爭中得到最後勝利。我們在這方面需要領袖，因此政府就給我們經費，使我們可以開辦「民族革命大學」，但這是受第

二戰區司令部指揮的。……在美國，人們不喜歡革命——他們喜歡進化。」他又笑了。接着他又說：「在過去的中國，我們的教育不是爲民族的革命，甚至也不是爲民族的進化。所以我們必須趕快訓練新領袖，去担任軍隊中的政治工作，替代低級的官吏，因爲他們中間有許多不是昏庸，便是貪污。閻氏已委任我的十七個學生當縣官。」

「這些學生所以到這裏來，因爲他們知道山西在戰略上的重要性，——它是一個高的區域，能支配在它周圍的各省。他們也知道山西是靠近前線的，並且和著名的八路軍接近。所以把這些含有煤礦和鐵礦的中心區保持起來，比較耗費許多兵力去保護上海更重要。學生們都發狂似地要去參加游擊戰事，但我們却要他們至少用三個月工夫在學校裏研究。經過了這個時期，學校和軍事總部，就決定他們應否繼續研究，或在前線担任實習工作。他們的實際工作，是隨時受教授們的指導的。我們必須得到四五位最著名的中國教授；這樣，我們就能辦一個著名的學校。」李氏所

懷抱設立一個大學去改革山西鄉村生活的理想，便是請到幾位著名的思想界領袖，在二千五百名熱烈的青年愛國者的中間工作，而這班愛國者，都是從學校中出去組織民衆。

我們漸漸的經過那平坦的、土色的、河南的原野；這些原野的邊緣帶着一片青色，那是農民所種植的冬麥。接着我們就沿着黃河向西進行，並且看見山嶺逐漸高起來，終於到了雕刻似的絕壁。那邊的居民都住岩穴中，而這些岩穴往往很高，可以俯瞰那邊繁盛的家庭園田；有時它們從許多間岩穴的居室逐漸高起來，一直到了上面平坦的農田。狹的道路是數世紀以來經過的車輛所造成的，蜿蜒於深谷中的絕壁之間。我們在一個發風的灰色黎明中渡過黃河。有一羣孤雁結成了一條黑線，在那朦朧的上空飛行，那時原始性的渡輪，正竭力地在使我們渡過那條黃泥色的河流。我們的專車上曾加了一層烟幕，以避免空襲；這種車輛是在閻氏的太原軍工廠裏造成的，但現在已陷落在日人的手中。

我們愈向北旅行，氣候就覺得愈冷。我知道中國的車輛和房舍，在冬天是多半不用火爐的，因此我就爲自己備了三件羊毛襯衫和絨線衫，並在外面穿上一件絲棉的中國旗袍。雖然這樣，在我離開黃河以後，我總覺得寒冷。那餐車桌上的肥皂缸裏的水，不到一小時，已經結成冰塊。但是中國人對於這一點似乎很慣常。閻氏的健壯的衛隊，却整夜不蓋氈子，很舒服的睡在車子上；他們橫七豎八的倒臥在車上，以致擋礙了走道的交通。他們穿了棉制服，外面加上一件羊皮大衣，不但能抵禦寒氣，而且能擋去輕手溜彈。他們脚上所穿的，是用繩作底的棉鞋。

年老的閻錫山將軍穿上一件沒有格式的灰色藍制服，他的面容上的威嚴表示出他是山西的獨裁者，——事實上他做了山西的狄克推多已二十七年。在中國各省中，祇有閻氏的山西政權，能從滿清覆亡後一直繼續到現在。山西是處在山嶺、長城、和黃河的三重保障的背後，所以不是中國軍閥的襲擊所能攻破的。日本的機械化部隊，曾沿山西的鐵路攻入境內，但不會征服它的山嶺。原來這些山嶺仍由山西

農民所保持，此外更有八路軍在援助他們。

不過日人已把『老閻』逐出了省城；此後他就和他的祕書們同住在晉南的一個較好的山洞中。他和我們第一次談話時，就表示他的慚愧，因為他失去了託付給他的如許土地。這種慚愧是合理的，因為他的山西省防軍在日軍第一次進攻時，就宣告崩潰了。但是很希奇的，他們的逃亡却暗示了第一個進步的步驟。原來按照舊日軍閥的傳統，凡被征服的軍隊，往往同戰勝者攜手，但是這一次『老閻』和他的軍隊都不曾和日人攜手，雖然他們費了幾年工夫要引誘他去領導北平的『傀儡政府』。他對於近代化的戰爭雖不很精明，但他却喜歡光榮的戰敗；他情願住在一個岩穴裏，而不願蒙了羞辱，住在北平的宮殿中。因為閻氏是一個含有傳統思想的，由文人出身的省主席，他注意中國四千餘年的歷史，以及將來的歷史。他喜歡提出關於蘇聯的問題並願意為他所提倡的『取消金錢去改革社會』的理論作長期的辯護。他對於這些事的興趣，倒比討論乏味的戰事更覺濃厚。我不大會立刻忘記他的安詳的態度，

他的不慌不忙的談話，和他說話時的手勢。他的這種手勢，無論在談論建國或毀國時，在表示長距離或市鎮及鄉村時，都在不歇的舞動着，但表面上倒並不如此。

那時第二戰區司令部是設在臨汾，它是在晉南鐵路上的一個小城市，現在都擠滿着兵士、官吏、和從北方而來的難民。李教授和我是被派住在一個麵粉廠的兩個事務室中。在那邊，我們每個人的房間裏都有一個火爐，因此房間中的熱度就昇到五十度，這對於當時的我們，倒覺得是一種非常的奢侈。我們的主人是一位禿頭的，年老的，麵粉廠的經理。他告訴我們說，附近村子中的麥，祇能供四個月之用，因爲民衆所種植的大半是棉花。但在山嶺的背後，一般村民倒屯積了充足的麥，可供兩三年之用。但是現在運到臨汾去的麥還是很少，因當地的交通用具，都作爲運兵之用了。城中的商人，已把他們一切值錢的棉花和羊皮，藏在離城若干里的岩穴中。如果日人佔領了鐵路，那末，這些搬到山嶺中的人民就能得到給養了。

（按日軍在數月後就佔領臨汾。）

我們的主人所給我們的一個描寫，能充分表示出全山西的局勢。日人已佔據了山西北部的鐵路線，但他們所佔據的區域，祇有全省一百零五縣中的十四縣。他們甚至不能隨意利用那些鐵路，因他們時常受到中國游擊隊的襲擊。但中國人却能從鐵路線的一段通到鐵路線的另一段，他們所選擇的地點是日人所佔據的城市和車站之間的冷僻地段。一個中國人如能沿途得到中國游擊隊的適當護送，他就能通過號稱被日人『征服』的土地，（其實那些土地是受流動性的中國軍隊的支配的，）一直走到北平和東三省。當我在日軍陣線的背後作幾星期的訪問時，有一位美國軍事觀察家卡爾遜先生（Mr. Carlson）也在作同樣的旅行；一位英國通訊記者勃脫雷姆先生（Mr. Bertram）也在照樣旅行。這樣的旅行是遲緩的，因我們不能利用鐵路或其他汽車公路。然而中國人却慣於作這種遲緩的旅行，這可以說是一種新的鐵路。

第二戰區的中國軍隊的組織，在閣將軍的統率之下，已顯示出中國在統一上已有了進步。到最近為止，每一個省主席都統率他自己的軍隊，並且不肯把他的軍隊

借給別人。現在第二戰區中雖包含了三省——山西，察哈爾，和綏遠——它們却受一個人的統率。他們的軍隊中包含了這三省和其他幾省的軍隊，此外更有幾師精銳的中央軍，以及現在改爲八路軍的全部紅軍。在一年前閻將軍曾任這個區域勦共軍的司令，現在他們是彼此合作了。在臨汾之北，中央軍和山西軍佔據了山谷區域，而八路軍却在兩翼保護他們。再向北越過日人的防線，八路軍的勢力通過了五省的若干區域，並在一個像新英格蘭那麼大的區域中組織當地民衆，去從事抵抗。

時作時歇的戰事，在日人的佔據點之間以及在附近的區域內，是時常發動的。那些侵略者入了鄉間，把村子焚燒了，並且把婦女擄到營房中去。中國人爲報復起見，就消滅離隊的日本兵士，並破壞日人所佔據的鐵路。當城市被日人佔領後，人民就往鄉間遷移。連天皇的中國官吏也離開了縣署，到在各鄉村中去設立巡迴裁判所。中國軍隊時常把城市奪回來，並且消滅日人所成立的傀儡政府，或把僞官吏處決，同時使以前的官吏復職。因此日人除了武裝的隊伍外，決不敢單獨離開他們的

司令部和營房。山西省城太原中的日人，非常缺乏菜蔬，因為他們不敢出城到鄉間去購買，但中國的密探却能扮成鄉人。祕密的往來於太原，並用他們的蔬菜去交換日人的麵粉。

在晉北日人的防線後面，仍有一大片區域在中國的統治之下。在這些區域內有一個區域，南北長三百英里，東西寬二百四十英里——約等於美國的伊利諾州——在這裏有閻將軍所委任的一位代理省主席，他所以能到任是由八路軍護送他經過日人的防線。他的在一種政權以內的政權，現在是被敵人所佔據的鐵路線四面包圍，但他的省城却建築在五台山上，並受中國軍隊的保護。據那位代理省主席的報告，在這個被日人包圍的區域內，用中國政府名義所收集的稅款，倒比戰前多一些。這個五台區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的區域很廣，它的高山也容易防守。從這個據點出發，在平漢線或北平附近去攻擊日本軍隊，往往是很容易的。這可以表示出日人防禦的單薄，這個事實，在作戰的最初六個月內，是最能提高中國人的作戰精神的。

閻將軍說：『在我的區域內，一切軍隊是毫無問題的聽我的命令；但在這裏却有一種自然的分工，這就是說，中央軍和多數省防軍是在從事於陣地戰，而八路軍和一些新的省防軍却在進行游擊戰。』在閻將軍之下的主要將領是衛立煌，他是一切陣地戰的司令；還有朱德，他是八路軍游擊戰的司令。

衛將軍所統率的軍隊，因了在忻口前線抵抗日軍而得名；原來忻口一役，使敵人在華北的前進受到第一次嚴重的阻遲。這次戰爭延長了大半個月，在戰略上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次戰爭以及以前的平型關戰事，曾阻止了敵人向華中的進攻，而在那時，這種進攻也許能使南京的中央政府受到最後的打擊。（論到這次戰爭在戰略上的重要性，請參閱本書第九章。）這次戰爭對於未來的戰事，也具有同樣的重要性，因為就在這次戰爭中，他們發明了陣地戰和游擊戰同時進行的戰略。

日本軍隊通過了長城的關口，就從北向南，推進到晉北方面。平型關是日人特別注意的，因為那邊沒有優美的防禦工事。在九月二十五日早晨，第一批日軍約八

千人，毫不介意地逼近了這個關口，不料在兩旁山上的中國兵士就用雨般的手榴彈向他們襲擊。這是八路軍加入抗日戰爭後的第一次表顯。結果日人被截成了兩段。在關口北面的日人陣地都被佔據了。經過了終日的戰爭，日軍的半數已被消滅，其餘半數就潰敗了。所奪護的軍事給養，爲數也屬不少。後來日人通過了其他關口，向八路軍逼近，並從後面把平型關奪取了。但日人的前進仍被破壞，而且從此開始了一種戰略，就是用游擊戰略去攻擊日人的交通線，並嚴重地阻止了他們向山西的進襲。

中央軍在衛將軍的統率之下，集中在忻口，他們的形勢是不利的，因他們祇在小山上面掘了一些淺的戰壕。這些中央軍同其他中國軍隊一樣，在設備方面比日軍差得很多，因爲日軍前進時，往往憑着坦克車，裝甲車，巨大的野戰炮，和轟炸機等。在最初五天內，忻口的戰事是非常劇烈的，從表面上看，似乎衛將軍是要受威脅的。幸而有八路軍軍隊在日軍後方的交通線上擾亂，賀龍出動在西面的一翼，而

劉伯承則包圍東面的一翼。他們在四十多次的接觸中，時常攻擊日本的運輸車，並劫取和毀壞日人的原料和軍器。

從事於戰爭的多數將領，後來把許多故事講給我聽。賀龍把他兵士參加戰爭的一件事描寫給我聽。有一百個中國兵士在山嶺中的一條路上，看見二百輛裝載日軍的運輸車，他們就用手溜彈去襲擊那個隊伍的中部，並且在幾輛運輸車上放火。於是日軍隊伍的前面和後面就衝出若干兵士，開始他們的抵抗，但終因路途的狹窄而受了阻礙。那時有一小隊中國兵士，衝進在一輛正在發動軍器的坦克車和一輛裝甲汽車之間，那個小隊的領袖覺得無路可退，就命令他的部隊用手溜彈向敵人襲擊，並且把那輛坦克車和裝甲車擊退。接着有一小隊日本騎兵衝進來，但結果也被手溜彈所擊退。在這個小隊的兵士中間沒有一個死傷的人，但是在那襲擊日軍的百人之中，死傷約有二十位，（其中半數是戰死的，半數是受傷的。）賀龍並且這樣說：

『我要使你知道，日軍的汽車部隊並不是不可抵禦的。』

在忻口以北的戰爭中，那最著名的一次便是劉將軍的部隊在一個晚上把二十架日本飛機都破壞了。這劉將軍是一位著名的戰略家，他曾在一九二七年參加南昌的暴動，以後更在紅軍中有過顯著的成績；他又在長征中引導多數部隊渡過大渡河。

劉氏曾對我說：『在忻口，衛將軍部隊的一種主要困難，便是日人多次的空襲，所以我們就決定無論付任何代價，我們必須要把敵人的飛機毀滅。我們靠着當地農民的通報，對於日人的飛機場的情形，是相當熟悉的，並且等到有一天，我們知道有日人的二十四架飛機保存在那裏。那天晚上，第七六九團中的二千軍士曾在一次大會中下了決心，要去奪取日人的飛機，並實行向日人的飛機場作奇襲。他們分成了三隊，以兩隊分據了飛機場的兩面，去抵抗日軍的反攻，第三隊便衝進了飛機場，用手溜去炸燬飛機。我們傷亡了七十人，其中有一位勇敢的隊長，受傷的兵士共三十一人，但是這一次戰爭很能鞏固忻口方面的前線，所以在漢口的中國政府的空軍司令，就特地去訪問我們的代表周恩來氏，並請他轉達恭賀的意思。』

這一種在日人背後的牽制行爲，使衛將軍的軍隊在應付日軍時，多少能處於平等地位。日軍的野戰砲因子彈的缺乏，不得不從前線退回。裝甲的汽車和坦克車也因了缺乏汽油而停止進行，日本步兵的糧食也減到最低限度，因此他們的飛機不得不把給養從天空中擲下來，而不再拋擲炸彈。衛將軍的軍隊，因爲受到這種援助，幾乎和敵人堅持了一個月，並且幾乎把日人逐出山西，如果不是爲了其他的日軍放棄了向漢口南進的計劃，而去拯救他們在忻口的部隊。衛將軍告訴我：『日軍在忻口一役，死了一萬六千人，其中有許多是軍官——這是那時日人征服中國的全部軍事行動中的最大損失。』

朱德將軍後來對我說：『就日人在這一省的成績而論，他們是不能征服中國的。如果他們的軍隊都像板垣師團那樣在忻口遭遇嚴重的損失；那末，他們在沒有得到最後勝利以前，早已不能支持了。』那在忻口戰役中所得到的游擊戰和陣地戰之間的密切合作，已成了其他中國軍隊可以學從的一個模範，並具促成了以後在山

東台兒莊的非常勝利。

第十二章

在八路軍中

在山西北部的某地方，在地圖上未曾指明的幾個村莊裏，我發見了第八路軍。我們的汽車（是從舊的福特運貨車簡陋地搭造成功的）顛簸地駛過了嚴冬的道路上，沒有雪把它鎮壓下來的塵土，飛揚在我們的四周。我們到達了一座用稻草和樹枝鋪成的橋，橋的基柱在湍急的河流中搖擺着。在鄉人們大聲的警告中，我們試驗着而渡過了這座橋。我們於是向巖石的山坡上駛，把大塊的石頭從車腹下輾過。我們駛過了一道道的狹的乾溝，狹得兩邊的土牆把車頂磨擦着。一忽兒，我們到達了一個

古老的泥屋的村莊。在我們的眼光中，這與別的村莊一點兒也分辨不出來，可是我們的汽車夫却用汽笛來招呼它。

幾個穿綠衣服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從土屋裏踉蹌地跑出來。在他們中間，一個滿身塵土的穿灰綠色服裝的人，望上去像是一個鄉下土老兒，隔着汽車夫欠身同我握手，用不很正確的德語打着招呼。這就是朱德——被人們傳奇般地述說着的英雄！人們說他一眼能瞧見一百里；說他把扇子輕輕一揮，能使敵人東倒西歪；說他能興起大風；說他死了又復活。這個人就是他！他是一個和藹的，簡樸的，土老兒似的人物。他並不擺什麼架子，同農民們一同跑出來，迎接一個外籍的訪客。

我真是幸運，因為第八路軍的高級將領齊巧都在這裏，他們正在舉行一個軍事會議，晉北各師的指揮者，都到這裏來聚會。身材魁梧的賀龍，最像一個遊擊隊的統領；他有着結實的身體和無畏的氣概，臂袖上貼着一塊破舊的布條子，上面寫着『第一百二十師』字樣。他跑了四天路和坐了兩天汽車，到這裏來聚會。具有學者

豐度，鼻上架着眼鏡的劉伯承，比賀龍跋涉得更多；他所指揮的一師在正太鐵路以南的地帶活動着。林彪——他是軍事領袖中的一個小顆子，大有一個害羞的學生模樣——保守着一個最緊要的地域，離這裏有兩星期路程的晉北五台區，被日軍圍繞着的一個很廣大的區域。（在我訪問八路軍後，林彪曾受了傷。）

八路軍的指揮者有着中國任何將領所有的業績紀錄。朱德在世界大戰時是雲南的一個軍官，他後來到德國去留學。一九二七年他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後來參加南昌暴動和奪取潮汕諸役，而建立了紅軍。彭德懷現在是八路軍的副總指揮，他在十年前是北伐軍中的一個營長；那時賀龍指揮着兩萬人的部隊。劉伯承是四川一位有名的將領，一九二七年加入了國民革命軍，林彪在那時是黃埔軍官學校的一個畢業生，率領着一連人參加北伐。他們這幾個人在紅軍中都有了十年的經驗。

十年前，這幾個人在政府軍中都有很好的位置。但是他們寧願拋棄這些位置而成爲法律不保護的人，叛逆的領袖和爲被壓迫的農民抱不平者。況且他們每一個人

在過去十年中，都可隨時拋棄他的信仰，投降政府以謀取高位，但是沒有一個人這樣做。各人都艱苦地生活着，並被政府懸賞通緝，但都能逃避過來。他們仍然過着艱苦的生活，願爲信仰參加政府軍對日本作戰。

「你們是在統一指揮下在這裏作戰呢，還是認爲政府的一支同盟軍？」我向朱德問。

「我們是政府的正規軍之一，」朱德回答說：「直接隸屬於以蔣介石將軍爲委員長的軍事委員會。我們是第二戰區的一部分，受該區閻司令長官的直接指揮。我們通過了司令長官署與本區其他友軍聯合作戰，不論是中央軍或山西省軍。我們可以作運動戰，也可以作陣地戰。在現在陣線上我們是處在日軍的後方，而且祇有輕便的配備，所以只能採取運動戰的戰術。我們相信中國得勝的希望大部分繫在華北的流動部隊，不但是我們自己的部隊，也包括由我們幫助組織起來的農民志願兵。這些兵力能夠阻礙日本，使它不能鞏固它所已經得到的，阻礙它把華北做成它的經

濟、和軍事的根據地去向中國南部進攻。』

我在第八路軍中一共住了十天，與他們一起飲食，並且時常跟他們的指揮者和軍官們談話。他們爲我在當地一個村民的屋子裏找到了一個房間，這房間遠沒有像在臨汾的那所麵粉廠裏的那樣闊綽。我睡覺的那個坑佔全房間四分之三的地位，剩下來的地位放着一個金屬製的炭爐，把房裏的溫度提高到四十度。這裏沒有閩錫山將軍招待我時那樣有許多道的菜和熱酒。中上午的早餐是米飯，他們用一隻五加侖大煤油箱當鑊子燒飯，就用這鑊子同時當飯桶用。這飯是放在三面牆壁，一面露風的凹室的地板上。在它的近旁擺着幾張桌子，每一桌上放着一大碗青菜或蘿蔔，和一壺淡茶。我們各人自己動手，立着或在橫七豎八的櫈上坐着吃。到了中下午的第二餐，是用煮熟的麵條代替米飯。這就是這五位將軍在舉行軍事會議時所享受的兩頓簡單的飯食。

這早餐時光景的記憶是非常尖刻的。那健碩的威風凜凜的賀龍在踱着方步，面

上帶着無情的猶笑；具有學者豐度而帶眼鏡的劉伯承，俯身在煤油箱上盛着第二碗飯；溫婉的朱德，蹺曲地歪在椅子上，把他的脚擱在飯桌的橫檔上，以避去石地上的冷氣，面上露出溫和的款待客人的笑容。我就在這裏學習游擊戰術，聽到了有名的戰役的故事，並且學習了怎樣使軍隊與民衆接近的方法。我也在這裏認識了，並且愛惜着這個軍隊的特徵——爲中國軍隊以及世上任何地方所罕有的——這些特徵造成了第八路軍的力量和榮譽。

我首先要提到他們的領袖的簡單和爽直，他們的不斤斤而所謂「面子」。那一位別的中國將官會這樣輕易地迎接我的汽車和供應這樣簡單的飲食？其次我要提到他們的誠實和不腐化，這可以從下面的事實顯出來，就是，他們中不論官長和兵士，全體節減薪餉，去擴充他們的隊伍。在我訪問的期內，政府送來了四萬五千人的給養和餉薪，但是軍隊中的人數，幾乎增加了一倍，他們就把所得的餉糈，按新徵集兵額加以分配。師長如賀龍，每月只領得五元的薪金。總指揮朱德領得了六元，若

按照美金計算，就每月不到兩元，這與普通中國司令長官的薪金相比，只佔到極渺小的部分——真是小得可笑的。

在我與他們同住的十天中，我注意到他們中間情誼的深厚。他們沒有內部的磨擦，沒有爭論和粗暴。但這只是消極的一方面。我記得兵士們在提到他們領袖的時候，臉上就顯露着光輝。有沒有別的軍隊這樣愛護普通的兵士？在八路軍中，每一個兵士是被寶貴着的，不但寶貴他的生命，更寶貴他的自主的機動性。這些領袖們的特性，使我的這位漢口翻譯員（他和中國將官的交往有着廣泛的經驗）感到最深刻的印象的，就是他們完全沒有官僚習氣，他們對於各級袍澤的友誼，和全軍中自最下級以至最高級的機動性的高度發展。

『我從未見過將官們，』他說，『訓練他們的部屬同他們自己一樣好。一個普通的軍隊，當主將不在的時候，他的部屬就變成無用。但你看朱德，你沒有看見他發出過一個命令。他似乎並不在統率一個軍隊。他有時間和農民們，外國記者們，

以及普通兵士們談話。他有很多的時間，他似乎並不做別人的上司。他們隔了幾時，總要開一個會議，會議之後，各人就按照所決定的，分頭去作自主的努力。』這種機動性的發展是遊擊戰爭的基本要素，因為遊擊戰爭，必須以小部隊為活動的單位，同時在廣大的區域內彼此須靈活地互相呼應。

朱德曾謙遜地對我說：『遊擊戰術並沒有什麼新奇的東西。美國的獨立戰爭會高度運用這個戰術。在法國的大革命時代，人民對於政府的軍隊，也曾採取這個戰術。俄國人民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抵禦外國干涉的軍隊，也廣泛採用這個戰術。遊擊戰爭是戰地的民衆對抗武器優越的敵軍所必須採取的戰術。我在德國研究的結果，深覺德國式的軍事訓練對於中國是太道地，太機械的，它不能隨着變動的情形而加以適應。我發見我的最好教科書是在中國的古書上，尤其是二千年前著作的三國志這部古老的小說。』

彭德懷（他是常常任前線指揮的）補充着說：『遊擊戰爭在軍路上的作用，是

要分散敵人的注意力，截斷其交通線，和消滅分散敵兵的。第八路軍並不完全是遊擊的隊伍，雖然它主要地是採用遊擊戰術作戰的。像平型關一役，就不能算是遊擊戰。因爲我們武裝的配備不如敵人，我們必須利用對於地形的熟悉和與人民密切的關係去制勝敵人。這種戰爭要達到勝利，我們第一要得到農村民衆的擁護，其次要靠每個兵士敏活的動作和對於戰情的認識。因爲我們沒有飛機，大砲和機械化的部隊，我們所有的只是步槍，手榴彈，少數的機槍和白砲，所以我們在戰術上必須這樣策劃，俾能儘量發揮我們所有的武器。就中國全部說，我們也應這樣策劃，使我們所有的武器能發揮最大的效用。

『從戰略的觀點說，全部的戰局必須是延長的，但各個的戰役必須是迅速的，決定的。長期戰爭是於我們有利，因爲日本是在我國境內作戰，四周受我們的包圍，士氣容易喪失，而且運輸上要遭遇許多困難。但在我們一方面，情形就恰恰相反，因爲日本侵略中國這件事的本身就足以喚起人民起而自衛。』人民反侵略自衛」

這個名詞可以包括遊擊戰爭的總意。在遊擊戰爭中，政治的工作更比軍事的工作爲重要，所以我們派遣政治人員而不派遣軍事人員去組織民衆。人民對於日軍要到處施以騷擾，以阻礙他們組織傀儡政府去徵收捐稅和奪取財產，並要抵制日貨。這種不合作運動的目的是要使敵人不能在我國站定脚跟。

『至於各個戰役所以利在速決者，因爲這樣一來，敵人就不能優勢地利用他們精良的武器。我們的攻擊要疾如迅雷，要能進退敏活，要乘敵人的不備，使他們的飛機，大砲，坦克等武器大大地減少了價值。我們每次戰鬪必須要有勝利的把握，因爲我們沒有後續部隊可以接應，除非我們知道怎樣退却，我們就有被消滅的危險。所以如果我們不能把敵人置在劣處的地位，我們決不同他們打仗。我們攻擊的對象是敵人的零星部隊，或交通線上的弱點，或處於不利地位的大隊人馬。我們常是乘敵人的不備，出以機動的突擊。在這種戰爭上，我們祇要極少量的軍火，而敵人却須消費大量的軍火。不過遊擊戰爭不能完成最後勝利的使命，它的任務只在維

持民衆的抗敵意志，一方面與正規軍合作，在長期抗戰中削減敵人作戰的效率。』

在過去五月中，第八路軍運用這種戰術，不斷地在華北四省活動着。在這個期間內，他們一共打了五次大仗，幾百次小仗。在我訪問期內沒有一天不曾聽到從這個廣大區域的各方面傳來的無線電報告。舉例如下：

一月八日——敵軍從A地開出汽車一百輛，向南行駛。W部施以襲擊，殺傷極多，擊毀輜重車十六輛，焚燬十五輛，俘五人，繳獲步槍五枝及藥彈。

同日——林彪部某隊，將C地附近之路軌再度施以破壞，並焚燬附近之修理器材。

同日——林彪部另一部隊奪回日軍佔據之煤礦，擊潰守衛隊數十人，獲無線電發報機一座。

一月十日——在娘子關南遭遇日方軍用汽車九十輛，擊毀十七輛，焚燬八輛，虜獲無線電台一座，來復槍五枝，毛瑟槍二枝，斃日中隊長一名，上士二

人，兵士四十人。

同日——賀龍部隊遭遇日軍二百人，殺傷三十餘，我軍亦傷亡十人。

一月十一日——日軍六百人圖攻陘井，但已爲我軍偵悉，中途施以邀擊，並在山崗上向之拋擲手榴彈，殺傷敵軍七十人，我軍傷亡十人。

以上是我在八路軍中所聽到的三天的軍情報告。這些都是小接觸，不能算作真正的對仗。但這種小接觸繼續五個月之久，第八路軍已使日軍無法利用在山西所得的勝利。他們把太原以北日軍所利用的鐵路拆毀了六十五哩的鐵軌。他們從敵人手裏奪回了三十個縣城，規復了中國政府的政權。在起初兩個月的戰鬥中，他們奪獲了步槍三千餘枝，機鎗二百挺，戰馬千餘匹，軍衣一千餘套，和大宗的藥彈，毀壞了運輸汽車千餘輛，裝甲車八十輛，坦克車三十部。他們是中國唯一的軍隊經常地殺傷敵人多過自己的損失。

我在司令部住著的時候，看到了每天的訓練程序。以培養兵士的機動性和戰鬥

力，而使這樣的勝利成爲可能。新徵來的兵士都像普通的農民子弟一樣，是不識字的。但他們在短期內就被教會了讀書和寫字的本領。每天的訓練程序是這樣：早晨六時半起身，七時半早操，九時半早餐，十時政治訓練，十二時軍事訓練，二時普通教育，四時半晚餐，晚餐後有遊戲，社交會集和唱歌，直至九時或十時方纔就寢。每種教育都佔兩小時的時間，第一小時普通是演講，第二小時是討論，研究和休息。睡眠的時間是比較地長，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補足給養的不夠——普通祇有小米，煮麵和一點蔬菜，而且一天只有兩頓。

從朱德的司令部隔着幾個小山約一哩遠的地方，有一個同樣的村莊，這就是八路軍政治部所在的地方。這政治部負責組織各種的教育和軍隊與民衆接觸的事宜。政治部分爲五部，卽組織部，教育部，民運部，敵工部和除奸部。組織部幫助挑選在軍隊中中下級的軍官和在農民中從事政治工作的人員。每一連中有一個政治指導員，他不但担任兵士的教育，並且時常注意從訓練中拔取優秀的人才。各部隊的司

令是由上一級的司令加以委任，但常與政治部磋商決定。

教育部不但管理訓練領袖和軍隊中教育的必修課程，也組織俱樂部 and 各種自由的教育和文化活動。甚至在行軍時，或在打仗以前，某種方法的教育訓練仍照常進行。教育部的領袖說：『假如我們僅行十哩或十五哩，我們仍可舉行一個短課，如果我們要走二十哩或三十哩，我們那天就沒有正式的課程，但各連的政治指導員利用休息和用飯的時間；領導兵士唱歌或研究時事。在打仗以前，指揮者和政治指導員召集各個軍官，向他們解釋此次作戰的目的及其重要性，然後這些軍官和下級的政治工作人員轉向兵士們解釋。平型關一役，是由林彪把作戰的計劃在前一天曉諭了全體兵士。在許多軍隊中，關於進軍的地點與理由是不使兵士們知道的。但我們的軍隊，除了有關軍事機密的詳細情形不予發表外，每一個兵士都知道未來動作的意義和一般的計劃，而且每人必須準備着，凡遇緊急時，作隨機應變的活動。』

軍隊中的宣傳工作，大部分是製成容易記憶的簡易原則。例如『三大紀律』，

『八項注意』，『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等等。這些原則自國共成立聯合戰線後，已經有了改變。例如『三大紀律』的『服從命令』一點仍舊，但『不許從工農中掠取分文』改爲『不從人民方面掠取分文』，『沒收地主的財產不得據爲己有』，改爲『實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八項注意』是包含關於對待平民的簡單規則，如『離開一處地方時須收拾清潔。……借的東西要交還。……損壞的東西要賠償。……買東西要照價付錢。……要有禮貌。……不許掠奪俘虜的所有物。……不許髒污街道，大小便要到廁所。』甚至那些受了傷和將死的兵士的行動，也要顧到全軍的安全。各部隊的政指導員在隨同軍隊赴戰場之前，必向兵士訓話說：『如果是輕傷不得退出戰線，若是重傷，不得喊痛。』

有一天晚上，當各軍指揮舉行軍事會議的時候，我同兩三個兵士聚着談話。他們是年青的衛士，奉命擔任爲我拿取柴火和熱水這個額外的差司。我一個一個的問他們在什麼時候和爲什麼加入紅軍。第一個是江西的一個貧農的兒子，是在一九三

一年加入紅軍的，那時他才十七歲。他的回答是『爲了愛國，並且得到父母的允許。』第二個是船夫的兒子，十七歲時在江西加入紅軍的。他說：『因爲我要把中國人民從日本人手中救出來。』第三個是一個木匠，年紀約近三十歲，他在南方遺有一妻一子在家中。他說：『他們有時有信來。我的父親是個石匠，他會看顧我的妻子。我的責任是在這裏。當我們得到勝利的時候，中國就是一個強國，我們儘有機會和家人們團聚。要是我們失敗了，各人都沒有機會了。』

這個年紀較大的青年向我解釋得很詳細。他說：『當日本奪取台灣和朝鮮的時候，它早已計劃着了。在它佔據滿洲的時候，就知道它第二步是要侵略中國本部，以便可以同蘇聯作戰。我們必須選擇使中國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或我們做日本的奴隸。我決定盡我的責任去救中國。那時我還不能讀書，但這些我是從學生們在紀念日演講而知道的。此後我在紅軍中就學會了念書。』他又告訴我，『中國情形已經比以前光明得多了。以前個個人認爲日本是不可戰勝的。現在經過幾個月的抗

戰，整個的中國軍隊已經有了進步，而且有能戰勝敵人的自信心了。老百姓開始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幫助着政府抵抗日本。」

我記得最牢的是那個船夫的兒子，我也同他說，『現在比從前好些了嗎？』他回答說，『是』。他的全副面孔發出光來，好像肚子裏燃點着一盞燈。

『爲什麼好些了呢？』我這樣固執着問。我的繙譯員，一位從漢口來的新聞記者，開始嘲弄地解釋着說，做了政府軍的兵士，每月拿到了二元的軍餉，當然比做半餓死的『共匪』要好些了。

『現在所以比從前好些』，船夫的兒子回答說，臉上仍然發着光，『是因爲那時政府是反對我們的，現在我們是在一塊兒了，中國已經統一了。』

第十三章

軍隊與人民

在離開朱德將軍總部所在的鄉村約有二三哩地方，林彪部下的一隊兵士正在休憩，並補充人數。他們是看見過艱鉅的戰鬥的；一百個兄弟，在平型關陣亡了三十個，在廣靈損失了二十個。但是，這樣的犧牲換來了一百二十個新兵，他們都是山西的農村青年，現在正在訓練之中。其中的一個在早幾個月就從軍上了前線，現在正把他的若干次的戰鬥經驗告訴他的家人。也告訴我們，他非常喜歡地看見了他的『尊長』，尤其可喜的，有幾位鄰居已經自願與他重返前線。

我挨門逐戶地走，每間屋子總要集着六個到十二個的青年，秩序井然，牆上掛着水壺，來福槍堆列得整整齊齊，毛毯疊放着，村民們聽說新兵沒有毛毯，就借給他們六十條，直到他們有了較多的用品時，才收回。『反日俱樂部』就設立在一座大屋子的兩間房裏。裏面排滿了簡陋的櫈子，有些只是竿子，兩頭撐住。花紙紮成的彩球，以及牆上的標語，非常悅目。有一條寫着：『爲中國自由而戰。』其他的是圖解，如怎樣使用來福槍，怎樣埋伏。牆上掛着一幅大的中國地圖，指明何處於何時爲敵人所佔。孫中山，蔣介石，列甯的照像掛在一座小小的台上。一位伴着我參觀的政治指導員，他在討論列甯的照像，是否要移去，因爲這個俱樂部不是共產黨的俱樂部，或是爲了遵守聯合陣線的原則，就讓它留着。

在這個俱樂部的最後一角，有一個小小的『博物館』，陳列着從日本人那裏爭奪來的戰利品；其中包括旗子，日記簿及郵片，甚至還有一張俄國沙皇時代的一百羅布鈔票。許多兵士都穿着日本兵的制服，制服也是戰利品啊！俱樂部外面的廣場上

聚集着大批的人。有些人坐在橈子上，在陽光下讀書，有些人參加來福槍的演習，有些人在做簡單的球賽。兩個兵士在打乒乓球，一排磚頭代替了球網。另外兩個在下棋，一個老農，滿口無牙，注視着棋局上的變動，露出和祥的笑臉。這些青年兵的活動，已經成了鄉村生活中受人欣賞的一部份了。他們不僅表現了戰爭，也表現了新的遊戲，新的教育，以及對於外界的新接觸。

這個鄉村的農民帶着笑臉告訴我，這是一個良好的軍隊，他們願意它駐守在那裏。軍隊召集了一次鄉民新年同樂大會，招待每家一個人晚餐。這個鄉村的主腦，回請軍官們聚餐，青年兵士們與當地的自衛團非常聯絡，並施以軍事訓練，報告戰局的情報。當我問一羣兵士，日本兵怎樣作戰的時候，他們一個一個快樂地笑着說：『他們的傢伙好，大砲飛機都有，但是，但是步兵，雖然訓練有素，並不見怎樣了不起。我們中國人比較強，在攻擊的時候也比較堅決。』他們也告訴我，山西方面的新兵，起初只有五分之一會讀會寫，現在呢，五分之二的人會得閱報，所有

的人都在讀書了。他們已經在作戰的幾個月從事學習了。

我走進一個人家的屋子，屋頂上的磚瓦是拱形的，房間都很寬敞，一望而知，這位家主是非常富有的，有些房間已經住兵了；其他的部份還是留爲己用。裏面滿是精美光耀的櫥櫃，裝有銅圈，擺滿了珍奇的漆器。室內點綴着鋪疊整齊的蓆子，一堆軟軟的墊毯，還有四格玻璃代替了紙窗，更顯得這人家的豪華。當我們走進內房的時候，一個婦人正在銅盆裏洗滌小孩的衣服，另外二個婦人及幾個小孩，舒舒服服地憩在場上。這家的老主人告訴我：『當一九三六年紅軍來的時候，我家寸草未動，但是我們有錢的鄰居都得供給飲食及金錢。那個時候窮人喜愛他們，但是現在呢，大家都喜愛他們了，因爲他們能夠反抗日本人，保衛我們。』那位婦人又說：『好！好！』小孩子撫弄着任政治委員的手，並且笑了起來。

『我們的軍隊在人民中間，猶如一條魚在大海裏面。』這是第八路軍首領說明他們在中國鄉村中的運動的格言。軍隊緊密地與人民聯在一起，使人民成了他們的

戰鬥的手臂，同時也要喚起並組織民衆以自衛。他們在這一方面的成功是如此的偉大，所運用的方法，已經成了中國所有其他軍隊的模範了。第八路軍駐漢代表周恩來，已經在一九三八年二月被任爲中央軍事委員會『民衆動員部』的副主任了。所以，欲加詳細的說明是有用處的。

任弼時是專任民衆動員的政治委員，他在和我若干次的談話中說過：『我們的軍隊對於喚起民衆的工作非常注意，只有民衆加入抗日的陣線，我們才可以獲勝。舊有的軍事力量不足打擊日本，我們必須解放新的力量。第一，我們要喚起民衆，把日軍在佔領區域的種種暴行告訴他們。然後我們組織民衆，一方面抵抗日本，一方面改善他們自己的生活狀況。民衆組織是最後勝利及戰後實現民主政治的保證。』當然，日本人也有他們自己的宣傳。他們中間有些人說，『我們是中國人，現在回到老家，把他們從貪污的政府下擁救出來，特別是第八路軍，』他們也利用中國的代理人（即漢奸）宣揚失敗主義說：『我們打不過日本，』或是深入各種宗教

的組織，作無恥的呼喊說：「祈我們順服，求菩薩救命罷！」他們把海洛因及嗎啡輸進華北，使人民墮落；若干年來，他們就這樣假手冀東和傀儡政府，售此毒計，所以山西省，閻錫山將軍的禁煙雖告成功，現在却成了一個更大的毒物世界的犧牲者了。當村民們劫後餘生，無家可歸的時候，日本人就以施糧籠絡民心，並發槍組織遊擊隊歸附日軍的指揮。日本人時常穿了中國兵的制服，或是強迫滿州人，大燒我們的村莊。日本人就用這一切的毒計，在中國人當中培植分化及失敗主義的種子。

任氏繼續說：『無論如何，什麼地方只要我們充分的組織人才，向民衆們說明目前的情勢，很容易把他們吸引到我們這邊來。甚至經過日本人武裝的遊擊隊，也會棄械歸降。日本人的野蠻是我們的最好論據。在崞縣他們屠殺了二千個以上的中國平民，在甯武也有一千以上；在乃文（譯音）他們活活地燒死縣官，並殺死六百以上人民。他們屠戮了平型關附近整整七個村莊的人民，誣賴他們是蘇維埃的代理人，他們在全山西境內鐵蹄所及的地方，差不多焚毀了一半的房屋。他們不顧人道

地把村鎮洗劫一空，不僅在瘋狂的戰爭時期中是如此，就是在佔領以後，甚至兩三歲的小孩也不能倖免。

『強姦，強迫爲妓，是非常普遍的，日軍從許多地方抽調中國婦女供自己的淫樂。就以朔縣一地而論，他們強調了三千個婦女，充當營妓。對於那班要保護自己妻室的男人，格外的殘忍相加。舉個例罷，有三個日本兵，闖進一處靠近臨城的村莊，侮辱了某一個農夫的妻子，姊妹及姑嫂。這個農民喚集了鄰舍把三個日本兵殺了。日本兵呢，大施報復的手段，派了一隊人馬把全體村民殺光，房屋燬盡。那個殺死三個日本兵的農民被吊在樹上，一把鐮刀穿過了他的身體，就活活地挖腸剖肚而死。當中國軍隊收復了不多時以後，就在那個給敵人燒殺的村莊上舉行了一次民衆大會，結果，四村八鎮投來的新軍有好幾千人，他們都是被壓迫的農民，起來反抗日本的。』

當人民一聲被喚醒的時候，第二步的工作，不是把他們組織在民團裏，就是

戰鬥隊伍裏。這種工作都由軍隊政治部民衆運動組負責推行。它與當地的軍政官員接觸，也根據情勢的需要，組織農會，工會，學生會，教師團體，自衛團及農民戰鬥團。最後，他們希望組織特別的婦女團體，但是山西省的農村婦女，總是落後的——就是纏足之風，也改良得很慢——她們一向只能附屬在別的組織裏。人民就藉着各種的組織，起來鋤奸，供給軍隊的急需，也要改進他們自己的生活狀況。

援助軍隊的團體有兩種：就是人民自衛團，與農民戰鬥團。第一種組織裏有身體強幹的男女，他們沒有武裝，每天的工作與平時一樣，但同時擔任其他的各種活動，他們巡路，調查外路客，傳達情報，並幫助救護傷兵，有時把他們放在昇牀，抬送達二星期之久。當日軍逼近他們的村莊時，他們就把糧食及值錢的東西收藏起來，趕忙把婦孺送到山上去，並毀壞道路及敵人前進中的橋樑。

農民戰鬥團裏的團員，也有軍器，雖然有的時候，好幾個人合用一枝來福槍。他們剪割電報線，攻襲火車站，掠劫小股的日本兵，從他們那里爭奪更多的武器。

他們從當地的人民得到可憐的供給。並且總是希望將來可以加入正規軍。他們爲正規軍的一個後備的力量，正規軍也指導他們拿他們作兵士的補充。賀龍曾對我說：『農民們表現了非常的創造力及組織力，他們在一個地方不斷派出哨兵，搜查外路的生客，一點不用我們加以指示。他們沒有來福槍，但是自製的武器非常有效。有一隊一百個的農民曾在忻口助戰，他們夜襲日軍的兵營，已經成爲一種動人的習慣了。他們常常留下收據，把來福槍及子彈滿載而歸。有時，他們爭奪了一營的子彈，就在山上重新組織起來，以備出擊。』

任委員及朱德兩個人都爲了農民組織向我要求援助，他們認爲戰爭的命運，大半依賴農民的身上。朱德說：『我們並不要求人家援助自己，因爲我們是正規的政府軍隊，沒有接受國外援助的權利及慾望。但是，爲着那班生活艱苦，在凍餓壓迫下與敵人作戰的農民，有沒有要求美國援助的可能呢？他們常常沒有外衣或皮袍穿，雖然一件溫暖的外衣，還不值三塊美金。當地的鄉民盡力地供給他們，但是鄉

民們也在極度的恐慌之中，常常收成摧了，屋子毀了，完全沒有醫藥上的設備，或是連醫生也沒有。」

人民的組織愈見推廣，生活程度的問題變得非常重要。軍隊要求當地政府召集民衆大會，宣布減少租稅及利息。任委員說：「我們想法不使這些要求高得連有錢的人也破產，因為我們不要增加階級的磨擦，但要爲了有助於我們的抗日聯合陣線而使其減少。有好幾次農民的組織不但要抗日，連地主也包括在內。在這些場合，我們就要解釋，只有叛國的地主是在打倒之列，其餘的地主都能竭盡本份，一致抗日。我們把所有的階級聯合起來，並且向有錢的人家說明，只有使一班人民的担負減輕，他們才能持久抗戰；假使日本得勝了，大家遭難，同歸於盡。我們在許多日軍手中收復過來的村莊上，協同組織當地的政府，只要前任縣長是一個愛國者，就使他復職或是選選當地的名人組織一個臨時政府。只要時間所許，我們就舉行選舉。」

我在中國聽見一樁最動人的故事，可以表明一切階級都在抵抗敵人。第八路軍的一個分隊把約莫三十個滿洲人帶到一處鄉村大會上，他們都是在替日本做運輸工作時被俘虜來的。當地的農民咆哮起來：『殺漢奸！』軍隊的政治指導員要那些渾身顫抖的滿洲人說出他們怎樣會替日本軍隊工作的。他們說到他們在被禁錮鄉村裏，有一個漢奸引誘他們，說是可以找到一樁冬天的生意，報酬很好。他們在日軍運輸隊工作，每日僅得一餐，沒有工錢，夜晚，就用鎖練把他們的手縛在馬腳上，防止他們逃走。他們的妻兒還留在滿洲，當做一種抵押品，以保證他們的忠於日本軍隊。

在大會完畢的時候，一個當地的地主向軍隊代表說：『我願意捐出我的房屋，土地，及我的錢財，讓我及我的兩個兒子從軍，因為你們抵抗這些魔鬼，打得怎樣好！所以如其像他們一樣活着做奴隸，不如光榮地戰死。』軍隊接受了他的兩個兒子充當新兵，但只說明了他們無權接受錢財及土地；他們向地主勸告，要他拿去資助當地的自衛團。大會散後政治代表與滿洲的俘虜談話，說明他們現在已經到了

反抗日本的同胞當中了。他們願意出力嗎？他們衣履襤褸，兩足疼痛，終於哭泣起來，並且在訴述中高舉着手說：『告訴我們怎麼幹？告訴我們怎麼幹？』他們被編爲昇牀担架隊，救護傷兵。史沫特萊女士在打回老家去裏寫到她自己看見他們沿着崎嶇不平的山路抬運傷兵，並且對於他們底熱誠極致敬意。

爲了第八路軍與四周人民關係的密切，它的間諜工作——反漢奸工作——無疑地駕乎任何中國軍隊之上。任委員說：『農民們對於我們的軍事秘密守口如瓶，這是很可注意的。在我們軍隊駐紮的鄉村，每個人對於外來的陌生人，問到第八路軍的事情，都假裝什麼也不知道，當陌生人來到的時候，我們就立刻得到關於他們的情報。』甚至受有高度訓練的日本間諜，也難探到第八路軍的陣地。有一次，五位重要的將領在靠近戰區的某村會議了十天，却沒有遭受一次的日機空襲，這是可驚奇的。

甚至我在山西所遇到的外國傳教士，他們也對第八路軍表示非常的友好，並且

說：『去年，每個人懼怕他們，今年他們到處受人歡迎了。』有一個傳教士非常婉惜地告訴我，他最好的傳道及教師都丟棄了待遇優厚的工作，甯願加入軍隊，不辭艱危。因為軍隊在喚起一個人熱誠的自我犧牲上，非常成功，而他却始終沒有做到這個地步。有一次，朱德偕同他的幾個部下，參加天主教堂的禮拜，後來就在教區的民衆演講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相同之點。他說，這兩種人生觀都是希望它的信徒犧牲個人的慾望與生命以完成社會的幸福，而不求酬報。他說：『你們天主教徒說有一個魔鬼，在全世界引起罪惡，那是每個人要對它宣戰的。我們對於這點也能同意，並且我們可以告訴你們，這魔鬼的名字，就是「法西斯主義」。』

根據第八路軍的信仰，甚至個別的日本人也可以感化。他們對於優待敵人的工作，始於早年紅軍的時代。任委員說：『一年半以前，我們俘虜了張學良部下的軍官，把他們當作賓客一樣款待，比較我們自己人還優。他們就爲此所動，後來在建立反日聯合陣線的時候，出力頗著。』

對於不懂中國話的日本兵，是需要應用新的方法的；因爲日本兵只知道，假使被俘了，就會受到酷刑而處死。於是他們不願被俘，拚命地頑抗。中國軍隊在平型關的最大損失，不在正式的作戰，而是在繳敵人槍械的時候，他們不能說明自己的寬厚及善意。從此以後，政治部訓練每一連隊的兵士向日本兵高呼：『把槍械給我們，決不殺死你！』此後，就很容易捉住俘虜了。不僅僅優待他們，並且他們的飲食比較中國兵還好，因爲他們吃慣了好的。在一度解釋以後，他們常被送回日軍陣線裏。縱然他們重上戰場，但是出於意外的優遇會使他們的勇氣減殺不少。假使日本軍官知道他們受過第八路軍的訓練把他們殺了，那是有損壞日軍的士氣的。這樣的事情，已屢見不鮮了。

任委員說：『我們在這一方面的工作，只是剛剛開始，我們已經每月化了幾千塊錢印發傳單給日本人，上面寫着：「沒有一個日本工人或農民會在侵略中國上得到利益。他們只是更赤貧化，而你們的資本家及軍閥已經私囊飽滿了。……他們告

訴你們，戰爭的目的在造成東亞的和平。但是，假使我們的軍隊在東京作戰，也和你們在中國一樣，那麼東京會有和平嗎？……』

在颯颯的寒冷天氣中，我在一個山洞口，藉着微弱的燭光，會見了兩個日本俘虜。他們穿着中國兵的制服，但是他們走進時一連幾次鞠躬的習慣，就使人分別辨出他們是日本兵。一位敵工部的朝鮮人先把日本兵的話翻譯爲華語，然後，我的譯員再把它翻成英語。我們的蠟燭在黑暗中搖曳，上面的屋棟已經沾上多年的灰塵，我們坐在一張小而髒的桌子旁邊，輪流地轉回，使桌子下面木炭的濃烟離開，或是向前移動，使我們兩足取暖，我們的手也圍着熱茶杯。就在這個寒氣逼人的半黑暗中，外面的天空中漸漸綴滿了星光，在浮雕的屋頂上閃着，兩個俘虜傾露了他們在日本軍隊中的生活，聲調非常緊張。他們本在可怕的日子中成長爲自動的機器，如今却變成有思想的人類了。

他們說，大多數的日本兵不要到中國來。除了『日本人被殺了』及『這是對天皇

的義務』兩個藉口以外，沒有說出他們爲什麼要到中國來的理由。一天一天地，他們完全不知道將來該怎樣了。『我們只知道準備明日上午八時出發；然後告訴我們領隊的人』他們的作戰訓練非常詳密，但是別的什麼也不知道。他們只是橫行中國的日本軍事機構中的自動機器。

那是一個山中的寒冷的下午，兩條水流把一小隊日本兵，衝成三股，驀然間，「彈如雨下」，來福槍從山中射來了。有些人跳到路旁的水溝裏只待天暗下來；他們聽見中國的喇叭聲。他們就在薄暮裏向前爬行，向一處臨近的村莊尋找棲所。突然間，他們當中的一個走進三個中國兵，在他想從暗中逃跑，而躲到積穀倉以前，咽喉間中了一個槍傷。他勉力掙扎，自覺該死無疑，就想割喉自刎。

他的神知後來清楚了。他發覺自己從腰部以上都赤裸着，四面全是中國兵，其中的一位正在裏紮他的傷處。另外一個人給他一張字條說，要送他到醫院去；日本人用漢字寫作，雖然講話有所不同。後來，他就臥在昇牀上抬了好幾天，才到了一

個地方。他說：『到處我看見軍官及兵士非常友好，並且一律待遇。我自己吃的，穿的，比較任何中國兵好。每天有一個政治工作者與我談話，把許多關於戰爭的事實，說明給我聽，那是我從來不知道的，我才恍然，自己的作戰一無目的，只是一種工具而已。現在我知道中國軍隊爲什麼抵抗日本了，我打算回國去，把這一切告訴我自己的同胞。』我問他這個打算是否危險，他回答說，危險是不免的，事前沒有審填的計劃及準備，他是不會貿然而行的。

這種組織人民的工作，需要成千的具有政治訓練的領袖去擔當。第八路軍在臨汾附近開辦了一個學校，內有六百個學生，其中，一百個是女性。有些準備擔任簡單的民衆組織工作，別的一些人準備擔任比較複雜的遊擊戰鬥。學生出校後不一定要爲第八路軍工作；有許多人是從別的軍隊裏派來，專門學習第八路軍的戰術。中國其他許多省份的學校及大學也在開始訓練擔當同樣工作的領袖。

蔣委員長要求全中國佔領區域的人民擴大同樣性質的武裝抵抗。他說：『全中

國民羣起奮鬥的時候到了，這是自救救國的唯一途徑。讓那班從日本佔領區域逃亡出來的人民回鄉去，組織分隊破壞敵人。余負爲全國最高軍事首領，把他們與正規軍，一視同仁。」

我在沒有離開山西以前，又參觀了李公樸教授在臨汾主持的民族革命大學的入學試驗。學生住在當地中學校的宿舍裏。這個學校中比較年幼的學生都爲了戰事東分西散了。他們就在軍事檢閱的空場上舉行入學試驗。靠近田畝的池塘已結着冰，但是同學們告訴我，太陽出來了，比較蕭索的屋內還是暖的呢。他們坐在燥裂的地面上，形成一個長列，彼此的距離是一丈，每個人都拿到一張紙，上面有五十個問題，須在二小時內回答。『何爲社會，……；國家，……；民族，……；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帝國主義，……；民族革命，……；民族主義，……；社會革命……』以上都是主要的問題，那班學生正在學習如何組織戰爭毀滅下的山西人民。

我站在凜冽的廣場上，有正月天氣的陽光照着，臨汾的鋸齒狀的舊城削得尖尖

的，好像一個齒輪，與山上遠遠的烟霧遙遙相對。那時我就遇見了一位哲學教授，他是剛從北平來的，穿着一套灰布的學生裝。很久以前，他在德國留學了四年，我們的談話都用德語。

『你在這裏怎麼樣運用你的哲學呢？』我挑戰似地問他說。『這裏的工作就是向農民講解愛國主義，教兵士們讀和寫，那裏用得到哲學呢？』

『戰爭與革命的哲學是存在的，』他回答說。所以，我又說：『好，什麼是戰爭的哲學呢。』

『戰爭有進步的與退化的兩種，』他告訴我說。『中國的抗戰是一個進步的戰爭，它要把四千年的舊社會形式一掃而空，因為它們不能支持這樣的動盪。戰爭會產出新的社會形式，中國的解放也是有利於整個世界的。』

第十四章

往戰地去的中國戲劇

我在八路軍駐在地的荒村中看到了中國最出色的戲劇表演。那時朱德將軍集合了他司令部附近一帶的駐軍，報告他們這次軍事會議的結果，又順便歡迎兩位新從漢口去的客人——就是李公樸和我。在各長官和來賓互相問候之後，這天的下午便費在演劇上面。參加表演的有兩個劇團：一個是上海戰地流亡劇團，另一個是八路軍自己組織而由丁玲女士領導的劇團。

時間已是下午五時，西沉的夕陽照遍了這荒村的每一個角落。天氣雖是嚴寒，

而溫度有三個月全在零度以下，但迄今仍未降雪。空中是靜靜地，一些兒風絲也沒有，所以華北有名的塵沙也未猖狂地飛揚起來。只有來集合的幾百兵士踏起了一片塵霧，它的起落使那西沉的日色越顯得陰晦。最後的陽光反照在廟宇的屋背上却愈顯出光彩了。那七八百兵士就在這破廟的廣場中站着等候開會。有些大胆的人便去坐在屋頂上。在這會場中惟一的坐位就是台前的那條長橙，這是給朱德，八路軍的將領和來賓坐的。

戲台是在廣場的一隅。對着觀衆的這面已有破損，祇有一部份覆以極樸實的帷幕。演員要到七呎高的台上去，須從觀衆面前走過，並由一個粗笨的梯子爬上去。他們上去之後，便都躲入幕後，輪到誰表演，誰才出來。但他們表演完畢了，還須在後台等待着，不准從台前的出路走下，恐怕分散了觀衆的注意力，那些表演完畢的演員的確都在後台等着，直至所有的戲劇表演完畢，才一同在觀衆的掌聲中由那台前的梯子爬下來。

在這些簡陋的情形之下，兩個劇團的表演，仍具有魔力，能使觀衆注目了好幾小時。這時天色已晚，冬日的星光已照到劇場，台上也燃起煤油燈。在這種嚴寒的正月裏，戲劇一直表演至夜間十時，青灰色的兵士們站在那兒談笑拍手，似乎很感興趣。這正是因爲所表演的都是些抗戰的故事和自己生活的寫照。

這兩個劇團用着兩種不同的方式來表演。丁玲的一組人專採取唱大鼓調的方式來演唱他們自編的歌詞；這種北平式的老玩意專用鼓聲和着弦音，來唱出民間的故事，他們卽利用這種方法來演唱他們的『平型關之役』。在聽衆之中，多半是參加過平型關之役的。他們屏息的聽着他們自己過去勝利的故事。

上海劇團是用寫實的獨幕劇來表演上海附近一帶抗戰的故事。團員是些業餘的學生，領導者却是些戲劇專家。他們最受人歡迎的是『黃浦江邊』。這幕劇是描寫碼頭苦工在夜間帶着炸彈，泅泳到日本軍艦邊去轟炸日艦的英勇故事。開場便有一個碼頭上的老年苦工在那裏喝酒，喝得差不多醉了，爲的是使他那半裸而戰慄的

身體得以抗禦寒冷。因為他在碼頭邊的徘徊，就有三個便衣隊上來向他盤詰，他便將通行證取出給他們看，並有機會說明他的目的。隨即有一個少年苦工登場，他帶着一副沈思憂愁的面孔，因為他新近結婚，好容易得着一個美女子，心下有些不願去犧牲，現出很猶豫的樣子。人們都在笑他的遲疑。最後這兩苦工一齊跳入水中。在一個大的爆裂聲之後，那年老的工人復又轉來，述說他的同伴已經被捕。機槍聲突起，年老的苦工及幾個便衣隊，一齊躲下場去。幾個日本人上來，帶着那年青的苦工，將他縛在柱子上，用非刑毒打逼他口供。他呻吟憤怒，但他終不肯供出他的同伴。結局却是一場快樂；因為中國援兵到來，遂救得這年青人的性命。

像這種戰時戲劇却充滿了喜劇的意味。那年老的苦工便是個喜劇角色。他的行動滿帶着粗笨的憨態。當微風揭起他那襤褸的衣衫時，人們便可窺見那貼身縛着的大魚雷。這兩個苦工都不是幻想中的英雄，一個歡喜飲酒說笑；另一個帶着膽怯神氣，叫苦連天。但最後兩人都完成了使命，沒一個是不忠實。角色的動作也極為逼

真動人；中國人好像是生來就具有這種表演天才的。在這幕劇中上海劇團很明確地指示出，雖平庸如碼頭苦工，也有成爲抗日英雄的資格。

有一位友誼的批評家建議說，上海的抗戰情形與山西的有些不同，所以應該寫一些關於農民抗戰的故事才好。上海劇團就不得不隨環境的改變，而另外製作些劇本。他們漏夜趕寫另一個新劇本。結果，他們用山西土語編成了『保衛村莊』一劇。第二天晚間，便在一大羣農民的觀衆前公演。它雖是初次上演，但較那『黃浦江邊』博得更多的采聲。

『保衛村莊』描寫一個老農與他的媳婦在家裏討論着日兵到來時的應付方策，他們應與日人妥協，還是到山裏去參加抗戰呢？老人以爲日兵總不會把每個人都殺死的。他若靜默守法，日人一定會憐憫他的；所以他決定留在家裏，很縝密地把所有的財物都埋在地下，靜候那暴風雨的來臨。但他的兒子和隣人已在山裏組織了一個『農民抗戰隊』。他却不滿他們的行爲；他以爲農人對任何政權應該服從，不應當

抗拒。一個日本軍官帶着當地的漢奸終於到來，把他的媳婦拖到臥室去了，但她不肯屈服，就被槍殺了。他抗辯了幾句，也被開槍擊中了。他的兒子和那『農民抗戰隊』打回村莊來，殺了日本軍官和漢奸，可是老人已垂危了。這時老人才覺悟到他的錯誤，並告訴他的兒子依賴日人的憐憫僅是夢想，唯有抵抗，才有生路。今日的中國戲劇多半是用這一類情節寫成的。

中國的戲劇已經往戰地去了。戰事不僅使中國文化中心由上海北平移至內地，也使中國的文藝作家寫出新穎的英勇故事來。作家們在內地諸省找到了避難處，在前線找到了文藝的新題材。新的文化正在內地開始萌芽。

在過去二十年之中，中國的文化是傾向于歐美的。『五四運動』以來，青年們專在摸倣歐美的作家，打倒了中國固有的文化勢力。內地學生要到沿海一帶來求學，較富有的便出洋到歐美去留學。他們回來時都成了商人，銀行家，買辦，繙譯；同時外國貨物和外國思想便傳入中國。至於文學戲劇方面的寫作也只有抄襲摹倣，沒

甚麼獨創的風格。

現在內地的流亡劇團有的是專以演劇爲生的職業團體，有的是專爲做宣傳工作而組織的學生團體；他們都有戲劇專家領導着，由學生組織的團體，多半是臨時性的，他們利用假期來扮演。例如我所遇到的武昌華中大學的二十七個學生，他們卽利用寒假期間，在隣近四五縣輪流表演些愛國劇。另外還有永久性的組織，那就是專爲在戰時服務而成立的了。例如，我在漢口遇見一隊十三個學生——內有三個女生——是由上海輾轉步行千餘哩而達華中的。至於他們的戲劇團體如何組織而成，以下數語足可代表：『我們自動地集合一些能說，能唱，能作卡通畫的人，組成一個團體。我們向朋友那裏募集百幾十塊錢，只要夠我們置備行頭就好。然後我們向『人民抗日協會』去登記，他們發給我們一紙證書，說我們都是學生，要在村莊裏表演。憑着這一紙證書，當地的人民便接待我們，供應我們吃住。有時具有受國熱情的地方長官供應我們，有時地方機關供應我們，觀衆有時也供應我們。但我們對

表演愛國戲劇絕不收費。」

我所看到的一個最有奇趣的劇團乃是由二十四個上海孩子組成的。他們的年齡大約是由九歲至十九歲。戰爭毀滅了他們的家，把他們驅至難民收容所。他們不願和父母一齊住在那兒。在他們扛着的一個標幟上寫着說：『我們不願再做難民，使國家多一份負擔。我們願意幫助國家，盡一份抗戰的責任。』這標幟是一個十五歲姓朱的孩子寫的。他們自己的劇團叫『孩子劇團』。起初他們只能演唱一些在學校中學過的歌劇。以後，方由著名的戲劇家教他們一些別的東西。自從日人佔領上海以後，他們就在一個十九歲的孩子領導之下，流亡到漢口。這十九歲的孩子以前是個初小教員。有一次他們幾乎遭遇戰爭，幸被中國兵士送往別處。還有一次他們所乘的船被兵士徵去，他們背負了一切用品，步行了好多里路。他們到處演劇，他們所演的都是些知名作家的劇本。如同：『最後勝利』，『捉漢奸』，『放下你的鞭子』，『日本人的鬍鬚』，『幫助我們的游擊隊』，『團結一致』，『火線上』，『憶北平』。從這些

劇名，你便可以略知其內容了。

他們這一切戰時娛樂都有着一定的程序。先由當地長官致詞，然後表演動人的歌曲與獨幕劇。在破鼓的播聲及絲竹的樂聲中，那報告員便開始說：『我告訴你們一些關於前方的消息，它們是從山東，河北，陝北以及我們大中華民國最南端的廣東方面來的……這些旅行劇團的演員，常把最新的救亡歌曲教給他們的聽衆。雖說這些業餘劇團的表演非常粗陋，他們的組織却成了今日中國作劇家的唯一的發表機關。

在漢口的作家告訴我說：『近來中國文學的新傾向，以及民族統一陣線的興起，都由於西安事變』。當戰爭一變而爲全面抗戰的時候，作家們都掉轉筆頭來爲這次的抗戰而服務。他們在描寫滿洲義勇軍以及華北農民抗戰的簡單故事。文學已變爲簡單事實的描寫，其目的在喚起民衆。它不再討論，甚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世界政策，只簡單而具體地描寫日本帝國主義的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的行爲。文學

的命題都變成了『保衛你的家鄉』而不是反抗帝國主義了。在這些文學中無非是中國兵士英勇抗戰的事蹟以及百姓們遭遇的苦難。

因沿海一帶新聞機關被毀的緣故，一班失業的記者全都被迫到漢口來，而發生過剩的情形。他們在此開始創辦壁報。這種壁報是由兩三個人計劃的，抄寫的工作完全託付於一個寫得一手好字的人；字的好壞在中國，也把它當爲一種藝術來欣賞的。這種壁報都被貼在引人注目的地方，它的內容有新聞摘錄，戰地記事等，有時也用輕鬆幽默的筆調來討論『如何救護傷兵』，『如何舉發漢奸』以及其他一切當前的問題。羣衆正集在那兒讀報看畫。到了人多的時候，便由一個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大聲讀給觀衆聽。

詩人，作劇家以及小說家都起來爲中國的獨立戰爭而奮鬥。所以在詩的方面有一種新的體裁出現，那就是所謂『朗誦詩』。這種新體詩和以往浪漫派的或古典派的都是迥然不同。以前浪漫派的詩家穆木天也轉爲這派了。有一位不甚知名的青年

作家高蘭曾經出版了一部『朗誦詩集』。那裏面的材料全是一些喚起羣衆的故事，這時詩人們才親自走入農村，把他們的詩唸給農民們聽，有時還配上樂調。

在戲劇方面最流行的體裁乃是獨幕劇。因爲它的場面變換極少，所以適合在廟宇的劇台或鄉村的街頭上演。左翼編劇家田漢的『保衛蘆溝橋』，『最後勝利』，就是這類流行獨幕劇的代表。有許多獨幕劇真是簡短，村莊裏的教師看了以後回去便可教他的學生表演出來。如『中國老人』一劇的情節，是描寫一個老人四圍有好幾個穿藍衣的女兒，一個兇惡的隣人就來攫奪他的女兒。一個女孩子終于被奪去了。他的背上却寫着『滿洲』。接着『熱河』、『察哈爾』兩個女孩子也被奪去了。但在其他女孩子都被搶去以後，那背上寫着『中國軍隊』的兒子才出來保衛他的姊妹。他終于打倒了這個兇惡的隣人。因此以前被奪去的姊妹，都在門口笑顏逐開地盼望着回家了。像這樣簡短的戲劇，看了之後就能使兒童們扮演出來的。

爲這次抗戰而服務的作家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左翼女作家丁玲，名小說家徐

諍（譯音），散文家周立波（譯音）。多數的作家却把精力全都花費在文藝寫作的理論方面。當我向丁玲女士問及現代中國文學的趨勢時，她的回答是：『我在前綫已經有六個月了，對於今日文學的趨勢一無所知。但我覺得今日中國作家的責任只有促進救亡工作。我們不該浸沉在文藝的理論中，我們却應寫些東西來喚起民衆才好。』

然後她撤開了一切理論的問題，轉過來講述她的『戰地服務劇團』的工作，她說：『我們在過去幾個月中，已經公演於八萬多人的面前——他們中間大多數是農民，還有許多兵士。從我們的表演技術上看來，似乎是落後的。但我們扮演農民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們是很喜歡看的。我們和普通的兵士一樣生活，我們的食物並不充足，我們的交通大半是靠步行，我們到處做戲，演說，張貼壁畫，教導歌詠。我們在各個村莊至少要教農民唱熟兩個歌曲。』

『你看我們生活雖很艱苦，但觀衆到處歡迎我們。甚至在極危險的時期中，他

們還是笑容可掬的，所以我們也因此感到愉快。』這就是丁玲女士所說的現代中國的文學趨勢了。兩天以後，她所領導的劇團也就出發到山西前綫去了。

第十五章

中國的新女性

一箇蘇州女子，把自己叛國的丈夫送警法辦，這樁事情，得到今日中國進步婦女的贊許。他已經數次把中國軍隊調防的情報洩露於敵人，結果遭致了一場空襲，炸毀了若干輛裝運軍火的車子。起初，他的妻子力持鎮靜，勸諫他，但是，當全盤叛情暴露了，她疾呼起來：『賣國賊，賣國賊！』直到鄰舍們聞聲前來，紛紛詢問的時候才止。

在她的丈夫給槍決以後，鄰舍們問她有沒有悔意，她的回答是：『不！我失掉

了一個丈夫，但是已經救了許多祖國的同胞，所以，我問心自安。』

也許沒有一個西方女子能夠完全瞭解到這個悲慘的小小故事中，含有不相調和的道德標準。幾百年來，中國婦女所受的教育，只須在家庭的範圍以內盡其本份，至於叛棄家庭，根據孔夫子的論理，簡直是罪大惡極。那位蘇州女子，爲了她的祖國而叛棄家庭，更大的意義還在中國進步婦女對於她的贊許。但是她仍舊覺得委屈個人，成全團體的中國舊道德，已經變質了。一箇西方婦女也許會說到個人的損失，及情緒上的衝突。而中國婦女僅以責任爲念，這種行動的結果所得，就是心裏的平安。

根據我的見聞，任何國家的婦女沒有再比中國的婦女具備更上的品格。她們不爲人所重視，歷代相沿，他們自己只覺得是全體中小小的一環；然而，當她們把一種現代社會的認識加到這個遺產（舊觀念）上的時候，她們對於一種運動的熱忱是可欽佩的，並不帶有什麼失態的現象。她們奉獻了生命，沒有一點浪漫的姿態，但是

充滿了平凡而又衷誠的期望與責任感，那是她們幾百年來用以建設家庭並完成家務的動力。

中國婦女較之西方現代工業國家的婦女，被禁錮在更狹窄的圈子裏，但是她們的遭受壓迫，與封建制度下的日本婦女，不可同日而語。中國歷史上就不乏出身望族的婦女擔任國家大事的。螺祖以發明育蠶見稱，伏女（義娥）是一個偉大學者伏生的獨養女，她奉了漢文帝的命令，講授尙書。班昭（她的哥哥班固就是漢書的作者）也是一個著名的歷史家。這些都是例外，但是至少，她們表示了婦女的受教育並非像大部份亞洲國家看爲一種罪惡。婦女的未受教育，多半是爲了家境清寒，更其重要的這一點，受教育的權利應該讓給承繼祖業的男子。富人家的女孩子不僅學習音樂及刺繡，有時，也得旁及詩歌及經典。現代中產階級的家庭常把女孩送到教會學校去，有時，爲了再求深造，也能出洋留學。

在中國，婦女的屈從，並不是因爲一個封建社會中對於女性的特殊侮辱，而是

由於一切個人生活，對於家庭屈從的關係。男子的受人重視，因為他們承繼家庭，而女子是暫時的，她們要加入她們丈夫的家庭，成爲最新的分子，而最少受人看重了。她們對於一個男人的盡忠，却不及對於整個家庭的重要：她們要上孝尊長，下扶幼小，還要照顧親眷。兒子們的母親達到家庭中高高的地位，對於全盤家庭生活支配權，遠勝於日本的婦女。早先，在中國，甚至離婚一事，也可由婦女首先發動（歷來常常是由男子方面發動的），直到朱熹，在十二世紀佛教的影響之下，才在經典註解上，向婦女們說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道理。

正和其他的國家一樣，最初使中國一般婦女走入更廣大的生活範圍的，是現代的生產工業，它把婦女從家庭的支配中解放出來，但是又輸入一種新的屈從。一羣年約廿歲的上海紡織女工，向我訴述一九二七年以前婦女們所遭受的長期壓迫，聲聲相和，好像一支歌曲：

「按照舊的風俗，婦女不得走出家門。她們的腳纏得小小的，否則，就嫁不到

丈夫。……她們被迫成婚，所以這種婚姻關係是痛苦的……，當她們走入工廠，受盡了工頭的壓迫，一天到晚在十二小時的工作以後，還要料理家庭的瑣事。現在，假使她們入工會，她們的丈夫及姑叔總要層層壓迫，她們爲了愚昧和無知，也只得受人欺侮。……在國民革命軍沒有訓練她們組織以前，婦女們簡直沒有一點自由可言。……』

隨着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婦女解放』正如晴天中的一聲霹靂，震響了全國。英勇的『截髮女郎』穿上制服，隨軍充當宣傳員，宣揚男女平等的真諦。她們喚醒了全國，組織了婦女協會，只須在報紙上刊登一方廣告，就可宣佈正式離婚了。後來，當農會，工會，遭受壓迫的時候，許多婦女僅僅爲了截髮的緣故，就被認爲危險份子慘遭屠殺。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我重臨中國，親目看見了十年相別的最大變化，就是有更多婦女參加了家庭以外的工作。十年以前，我徵求一位私人祕書及譯員，應徵

的是一位男性，他的妻子住在相當遼遠的省份，是一個家庭的主婦。現在呢，儘有這樣的女祕書人才。她們伸展到其他若干工作範圍以內，具有地位的婦女和她們的丈夫共同參加愛國的活動，或者是在婦女團體中工作。婦女也可從軍，其英姿不減於十年前的截髮女郎，但是她們並非擾攘不休地爭取她們自身的權利，他們的參加愛國活動是更可敬佩的，參加抗戰，爭取勝利，在他們既是一種權利，又是一種責任；抗戰勝利以後，她們希望婦女及全中國的同胞，仍舊能獲得更廣大的權利。

宋家姊妹是聞名全世的，她們在中國國民生活中的地位，非任何國家的婦女所能及。宋慶齡女士，全世界人士更知道她是孫中山博士的孀婦，她是我所結識的中國女友中第一位。她穿着一套樸素的中式布衣，據我所知，她是一個非常溫存而愉快的！但是，她具有如鋼的品格，始終效忠於中國人民爲自由的鬥爭。在中國十年不統一的局面當中，她對於孫博士組織農工，並與共產黨合作的原來方針，堅持不懈。她也和中國的婦女一樣，對於養之育之的家庭非常尊敬；但是她也反抗家庭

的種種壓迫，達十多年之久。她不顧惜自己身體的健康，策劃爭取民權自由的運動，並爲釋放被囚的愛國志士奔走呼籲。在中國，沒有一個婦女像他那樣受民衆的愛戴，因爲，在民衆遭受壓迫的時候，他就憑着她的資望，不爲人屈。現在，她的立國方針一仍其舊，並且已經成爲政府的方針了，她在形體上是那樣的嬌小，在態度上是那樣的溫存，但是，她的品格比較誰還堅強。

她的妹妹宋美齡女士，大家更知道她是蔣介石夫人，也許是今日世界最有權力的婦女了。蔣先生軍書旁午，日理萬機，沒有閒空研究外國語，美齡女士就無異於他的外交顧問了。蔣夫人對於社會運動的興趣，在某些方面，極像美國元首羅斯福總統的夫人。蔣夫人是新生活運動的主要倡導者。有一個時期，她主持中國的空軍，但是軍興以來，事繁任重，她也就卸肩了。同時，她正確地估量她的襄助蔣先生，乃是她最重要的任務。她的思想及工作的效率是完全歐化的，某些中國人對於他的特長，表示反感，某些外國人誤認她是一家之主，甚至能支配她的丈夫。這

是完全錯誤的，她不過運用她的外國語知識，把世界的情勢解釋出來，而所有的國家大事，仍舊由蔣先生主持其中。

任何美國婦女俱樂部聯合會會長，對於蔣夫人所具多方面的才能，都要表示羨慕。現在，她主持婦女抗戰後援會，這是一個全國性的組織，援助戰事的進行，並救護難民。她不僅是一個領袖，也是一個苦幹不倦的人，她會寫給我私人的長信，詳述難童的苦狀。並且寄了許多信給她的衛斯理 (Wellesley) 大學的同班生。她也作無線電廣播演講。蔣夫人是一位誠實的基督徒。她從基督徒的觀點論到世界的殘暴和墮落。我曾在武昌總司令部與她作長時間的談話。她告訴我，她曾担任航空事務，剷除其中根深鞏固的貪污惡習，『有些美國公司也牽連在內，但是我要替他們聲明：縱然他們騙取金錢，還能賣給我們精良的飛機，有些歐洲商人，竊取了我們的金錢，交出的貨色，却不堪一用。』一直到一九三八年五月間，在她的書信中，她還震怒於日本的殘暴及世界各國的坐視。『顯然的，人民可以拿他們的體驗

證明野蠻主義的復活，而對於主犯國家的譴責和制裁，却表現得如此微弱，……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人民對於這種野蠻行爲，熟視無睹，逆來順受，使我心憂不已。我希望全世界一致反對不公正及非人道的時期將要來到！」

但是，在這幾位特出的婦女身上，並不能完全看到今日中國婦女的動態。若千出身於工人，農人，經商及專門職業者家庭的婦女，對於中國的抗戰，奉獻了她們英勇的效忠。華北的農村婦女，組織鐮刀隊，收割飼草，送給她們丈夫所服役的軍隊。她們都受過防空訓練，知道怎樣分散，怎樣平臥；在湖南南部偏僻的鄉村裏，她們在北風雪飄之中爲戰士們織襪。甚至在日軍控制下的上海難民收容所裏，飽經戰禍的婦女，爲了慶祝國慶的權利被剝奪了，就用「掃除污穢」的口號，舉行「大掃除」。以安慰自己的胸懷。

在漢口女青年會裏，我親見了一次婦女集會，商量組織湖北婦女抗戰後援會，她們出身於各種不同的社會環境，有的是上級的婦女，受有二代的基督教影響，在

外表上，並沒有什麼特出，而她們的見解却有美國女青年會委員的風格。其中也有新生活運動，女學生，紡織女工及女共產黨員的組織人才。她們有的報告，已經爲兵士徵集了五千件內衣，有的報告，發起爲兵士徵集一萬雙布草鞋。還有的談到編製綳帶，推銷救國公債，及組織鄉村戲劇旅行團。

有一羣上海紡織工人，她們輾轉繞道，步行了一千里的路程，到了漢口。沿途救護傷兵，並在鄉村中從事宣傳。她們告訴我，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之間，職工會的勢力非常強大，她們獲得紡織工業最高的工資，每月有三十元到五十元。一九三二年，正是日本起事於上海之後，工資的跌落最大，特別是日本工廠，工資無限制地減低。當戰事爆發的時候，大多數女工每月只有十元到二十元的收入，毫無工會的保障。但是她們並非無知或昧於世界的大勢。在工會活動遭受嚴禁的時候，女青年會的職工班，對於上海的女工羣施以擴充的教育。她們說：『工人及婦女解放，非與整個中國人民的解放相輔而行不可。工人及婦女遭受日本的壓迫頗深。日

本工廠的內部真是暗無天日，常常要我們每天工作十六到十八小時，有時延長到星期日的中午，沒有一點額外的報酬，現在，日本人毀滅了我們的家園，及工廠，所以，工人婦女對於軍隊的援助最爲強烈，我們要到最前線去！』

胡蘭畦女士是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在戰爭的初期，就組織了上海勞働婦女戰地服務團，她們在後方的工作成績，真是最足驚人的。大多數的女團員出身於農村家庭，胡女士本人對於中國農民的思想，了解甚深，她是一個沈默，身材適當的年青婦女，出語談諧，但也正直而誠實，她與她的穿着制服而並不佩帶武器的女團員往來於揚子江流域的軍隊及鄉村。雖然，婦女組織戰地服務團體，在中國農民前面是一個奇蹟。但是她們的工作效果往往高於軍官或大學生。她們在夜間誘使農民到前線收割莊稼。許多『小漢奸』，經過他們的訓教，回到抗戰的陣線，紀律不佳的退伍兵也給她們說服了。

胡女士說：『在八月裏戰事開始的時候，我們服務某軍部，軍長告訴我們，自

從附近的鄉民放棄了田間的收成，逃避一空，最先的困難就是兵士糧食的缺乏。我們就趕到鄉民逃避的地方，勸慰他們回鄉，至少要隨軍進退，我們說：「一個新的日子來到了中國，軍隊不再剝削人民，並願意與人民爲友，他們會幫助你們下田收割，而你們必須供給熱水並救護傷兵。」起初，他們不相信我們，但是我們給他們一種口頭的擔保，並請求軍長實行他的諾言。因此，上海後方的農民紛紛回鄉，人民供給軍隊食糧，而兵士幫助他們收割。後來，有一處田裏的收成，接近火線，情勢危險，沒有一個人能夠說服農民去冒險收割。我們就進行家庭訪問，並允許與他們同往，女團員徵集了一百三十位勇士，他們在整整的一夜裏，收割了八十担的莊稼。

有些兵士違反『新精神』，購買農產的時候，所付的錢遠低於原來的價格。在這個場合，參加戰地的女團員就需要銳敏的直覺了。假使農民因爲一位兵士化了四塊錢，買了他價值十塊錢的一頭豬，而怨訴起來。我們不必責備他，以示可羞，我們

富願稱讚他，因為他並沒有「一毛不拔」！但是，我們要深信人民與軍隊之間的新精神，那麼，我們就得告訴兵士們，農民爲了援助抗戰，犧牲如何鉅大，並且指出，假使有時所付的錢超過農民的討價，又是如何的寬大。例如，我們知道豬的正價爲十塊錢，我們就說，「你有時付農民十六塊錢，豈不很好麼？」所以他便回到農民那裏去，另以十六塊錢買一頭豬，於是雙方的自尊心都保全了。」

『小漢奸』的出現是一個嚴重的難題。日本人對於六歲到十歲的兒童，以金錢爲餌，要他們探明砲位的所在。有時，幾處藏砲的地方，連人帶砲，被燬一空，兵士們非常震怒，大罵這些『小漢奸』，並要求立即槍決。有一個小孩確是因此被槍斃了，但是此後，胡女士在軍長面前，竭力進言，把被捕的兒童交給女團員處理，只須加以清楚而簡單的說明，牠們就完全能夠與日本人的勢力相抗衡，所以，縱然那些孩子，仍舊拿日本人的錢，而工作却是效忠於自己的同胞了。

一羣紀律不佳的兵士，他們敗退了，逃亡了，這將影響全線的動搖，女團員在

這一方面的成就，誠然是最危險的工作了。敗退的兵士們不再服從他們的長官，把槍拋在一旁，或當他們逃亡的時候，就胡亂地四面放槍。女團員首先得到一個鄉村的合作，探明這班逃兵必經的路線；她們預先打掃幾間房子，安排一個救傷處和熱茶。然後，她們就到那班逃兵當中，款待他們，先給傷兵們救護，然後再給大家飲茶。女團員就在飲茶的時候與他們交談，報告其他各線的勝利消息，並且和顏悅色地問他們：『你們從那里來？現在到那里去？』她們佯然不知他們是逃兵。當他們自己說明事實的時候，女團員們就表示非常驚奇和不信任。『那麼叫所有在前線英勇抗戰的弟兄們怎樣感想呢？』女團員們從未有一次痛罵逃亡者的無恥，她們只表示非常的驚愕。那些逃亡的士兵徘徊四郊，彼此交談，達數小時之久。然後，靜悄悄地溜到城外，免得遭人注目，重行組織起來，回到前線作戰。男性的自尊心，使他們不願意讓女性公然察覺到他們已經受了她們的影響。

成千的婦女在中國軍隊擔任同樣的工作，有的參加紅十字會，有的是政治組織

人才：只有在特殊的情形之中，才是真正的戰士。當名震全世的『孤軍』最後奉命退出閩北烟火瀰天的倉庫時，歡呼的羣衆，眼見三百七十個戰士中，出現了七個女兵，大大地驚奇。其中的一位是楊惠敏女士，她把一面大幅的青天白日旗，獻給英勇的戰士，還有一位姚瑞芬女士，在一九三一年的時候，他才是一位十六歲的姑娘，却率領了五百個義勇軍在滿州的山地與日軍抗爭。後來，他又參加上海的十九路軍。若干次，她簡直是九死一生，倖免於難。有一次，她隨身帶了四千塊錢，經過瀋陽深入山中的中國游擊區，而日本人已經搜索全城，等着她落網。她在『打游擊』中結了婚，生過兩個孩子，她的丈夫參加華北流動部隊作戰。趙老太太是北平近郊游擊司令的母親，她是一個樸素的老婦人，身上穿了一件藍布褂子，能夠帶着槍馳過日軍的防線。另外，立報上面記載一位無名的『中國母親』，她雖然已是一位六十三歲纏足的老婦人，却以一部份時間隨着游擊隊伍出發，替他們洗衣縫補。當她不能隨軍的時候，就把反日的標語藏在衣服裏，乘機黏貼在重要的地帶，而自

已却很安靜地在溪水中洗衣服。

在廣西有二千多女子要求組織『女子軍』，經過了嚴格的考試以後，僅僅錄取了一百五十人，個個都是身體健康，富有軍事知識及善射的技術，並有組織及演講的能力。她們所受的訓練，就是準備組織農民，參加游擊戰。期滿以後，她們作了六百哩的初次長征，才達到漢口，並隨帶五十鎊以上的行裝。她們戴着竹編的大帽子，（廣東式笠帽）不僅可作遮蔭避雨之用，也是一種防免空襲的保護色。劉女士，是北平紅十字會的一位工作人員，代表『華北抗日軍』前來漢口。這支軍隊是若干隊義勇戰士的大集合。她告訴我，佔領區域的婦女怎樣在夜間分送抗日愛國的傳單，並發行救亡的刊物『天津婦女』。她們在小小的木板上漆些口號，拋在天津的河中，使它們順水而流，穿過全城，擴大宣傳的功效。

甚至漢口的歌女及上海舞廳裏的伴舞女郎也組織了救國同盟。上海方面的首領是一個漂亮的廣東女子，以前她是一家最知名的夜總會裏的皇后。若干靠伴舞爲生

的女子趕製綳帶及慰勞袋，或是利用白天的時光在醫院裏看護傷兵。她們力勸許多跳舞廳的老闆把營業場所改爲傷兵醫院，後來再改爲難民收容所。漢口的歌女把酒館中所唱的愛情歌曲改爲英雄的史詩。她們又把自己的金銀首飾捐作戰時基金，成羣地立在街頭高唱：『把你們的金銀獻給國家』。這個運動抓住一般人的心理，使他們紛紛地把許多傳家的奇寶和珍藏獻給祖國。

中國女共產黨員，在隨軍長征中所表現的忍耐和勇敢，爲世界上任何女性所不及。她們登山涉水，寄身鋒刃，加入長征達一年以上，還要隨帶自家的用具。其中如毛澤東夫人，以前是一位鄉村的女子；朱德夫人曾經被雇爲下灶的女婢；周恩來夫人，過去是一個鄉村學校教員。毛夫人，她甯願人家稱呼她『賀子珍司令』，在外表上，顯得嬌弱而文雅，但是她已經穿過十年的紅軍制服了。她在前線作戰，組織婦女戰士團，看護病人，搬運傷兵到陸軍醫院去。她是以身作則，無一不爲。她開始加入長征的時候，身上剛剛中了二十處榴霰彈的創傷，其中的八處其勢可危。

那時。她又懷孕了，途中生過一個孩子。她不得已把孩子忍痛寄養在一個農家，後來，她就再沒有法子找回來了。但是，這一切痛苦的經驗並沒有使她氣餒，或是萎退了。她二十六歲的青年精神。

朱德夫人的名字叫康克清。一九二七年，她才是一個十多歲的女孩，就被雇爲下灶的女婢，她是當地婦女先鋒隊的組織者。她率領了三千以上的婦女先鋒隊，從廚房的用具到來福槍，都是她們的武器。當一九二八年朱毛出現的時候，她們就奮身加入在長征中，二營婦女先鋒隊就把四川軍整整的一旅擊敗，繳械了。朱德夫人在加入紅軍的最初，一個字也不識，現在廿六歲了，居然擔任了延安紅軍學校的政治學教官了。

周恩來夫人（鄧穎超）把長征中的婦女生活一一告訴我。當長征開始的時候，她自己正患肺病，臥倒在牀上；最初四個月當中，她臥在昇牀上，後來她病好了，隨軍步行。她說：『當我們一放下行囊，婦女們就召集民衆大會，報告他們，日本

人正在侵略我們的國家，我們前往西北是抗日的。我們也幫助當地的人民逮捕腐化而詐騙的劣紳，審查他們的罪狀。最困難的是紅十字會的工作。他們攜帶傷兵，就不能追隨其餘的人。我們離開江西的時候，運輸隊沒有同行，到了貴州，就得雇用當地的苦工，但是有時也雇不到。因此婦女工作人員只好帶着昇牀走，那是非常困難的。

『約有一百個年齡十歲及不到十歲的兒童，加入了長征。他們個個依靠自己的兩條腿，運輸並攜帶自己的用品。他們也參加演劇及歌唱，作為他們一部份的供獻。有些兒童身體變得太弱了，分別留在後方；有些始終未停一步，現今在陝西第八路軍中異常活躍。』

『長征中誕生了八個嬰兒，其中的四個是在我參加的第一軍當中；在這個遙遠的征途上，我們無法照顧他們，只好寄養在表示負責的農家；一個是男孩，三個是女孩；其中的一個女孩是我們領袖毛氏夫婦的產兒，我們曾經設法找回這四個孩

子，但是沒有如願，因爲到最近，我們纔能合法地通行全國的境地。我們最爲擔憂的是一個交給四川邊境土人的孩子，因爲在那邊很難找到一個照顧的人。每一次產婦，在孩子落地以後，都能照常前進。幸喜每一次分娩的時候，大家碰巧有一天休息，所以產婦們得以從容臨牀。比較幸運的是其餘的四個孩子，那是在第二軍出世的，因爲這一支軍隊早一年結束長征。這些孩子是在長征將畢的時期產下，並且當地也沒有一個人可以照顧他們，所以只好由軍隊把他們帶走。有一個小女孩是在草地上產生的，那裏食宿全無，她的名字就叫「長征」。蕭克司令也在長征中添了一個子，也是在一處不能留宿的草原，但是那裏有一間「小泥屋」，孩子就在那間屋中出世了，所以他的名字叫「小泥屋」，這四個孩子都還健在。」

當我問周恩來夫人，在可怕的旅程中，她是怎樣消除自己的肺病的？她回答道：「我想，那是快樂治療了我的病症。」

『快樂！』我叫了起來，『但是，艱苦呢？』

『什麼艱苦呢？』她問我。

當我問到有沒有斷糧的時候，她很安靜地答道：

『常有的事。在草原中，我們有十天或十多天，除了草，一點也沒有吃的。在貴州，我們可以從田裏取米，但是土匪們偷去了我們的烹煮用具，有了米也沒有用。是的，我們常常是挨餓的。』

『那麼，你爲什麼這樣快樂呢？』我問她。

『因爲，在我們的面前，有一個光明希望的未來。我們團結一致，深信我們所選擇的是一條正確的路綫。一切艱難，都可以克服。同時，我們也得到了許多新的見聞。』

『你現在和以前一樣快樂嗎？』我追問她。

周夫人審慎地考慮了一下，她就回答說：

『我想，更加快樂了，因爲現在的一切是更有希望了。』

第十六章

中國的民氣提高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我到了漢口，就在那一個星期當中，蔣委員長的樂觀態度，成了外國新聞記者心目中一個主要的謎，當然，在外表上沒有鼓舞的餘地。他的軍隊正在延綿千里的戰線上潰退。大部份的精銳部隊在上海及南京遭了敵人的屠戮。他已經喪失了南京，北平，這兩個新舊的首都，以及四分之一的國土。在這樣一次空前的浩劫之中，他的快樂精神基於何處？美國允許了他什麼嗎？或是英國有什麼擔保嗎？或是這樣表面上的快樂，只是顧全『顏面』？

不，其中必有更重要的理由。我也親見精神飽滿的蔣委員長。我在武昌與他的卓越而幹練的妻子作了一次長時期談話以後，我就會見了他。蔣夫人拉開一扇通書室的門，他走了出來，彼此招呼了一下。我很少看見一位更深沈而有能力的人。我不再批評他那種快樂的神情，他莊重而又嚴肅地感謝我對於中國的期望。但是當一個人言行合一，而認定目標，堅忍前赴的時候，他不僅自己心安意滿，也希望別人如此；因為有一種自信的精神。蔣委員長的快樂就在這裏。我在巡迴北戰場之後，我才知道其中的奧秘。據我所知，此後數月的情况更其好轉了。

『中國人愈戰下去，民氣愈能提高，』一位從山西前線回來的女子點着頭向前任青島公安局長說。

我們擁擠在一輛從遼遠的北戰場向漢口開回的平漢車上。軍官們，公務人員，傳教士及新聞記者，都負着重要任務南行。車門口有兵士拿着刺刀，以資警衛，因為每到一站，都有成羣的難民騷亂一番。那位與我同排坐着的女士，身穿制服，顯

得有能力的樣子，她曾爲閻錫山將軍擔任後方救護工作。不多幾個月以前她被迫退出保定，一千個傷兵就活活地遭了敵人的慘殺。

前任青島公安局長，穿着綢袍，剛柔並濟。當青島失陷的時候，他隨帶了一千七百個警士，槍械齊備，就組成了一支游擊隊，活躍於附近的山中。他是前往漢口請求接濟及指示的。他的樂觀態度，顯出他對於目前的游擊生涯，較之以前的警政更爲滿意。

剛在這個時候，這位英雄爲了和兩位女性同居一個房間而覺得難以爲情。他便道歉說：『這是戰爭，各人只好隨便一些。』

這位女士及前任的局長，在他們同一個外國人作了慣常客氣的交談以後，就開始討論中國的困難，落後及舊時的貪污現象。『保定的恥辱，南京的潰敗，……某將軍的叛國……；他也該像韓復榘一樣的治以國法，明正典刑。……許多人都該槍斃。……有些漢口的官僚也當如此，』他們一字一句都好像斬釘截鐵，而那種說話

的自由，我從來沒有想到會在前線上聽見的。但是他們說得很有力量，而顯出熱烈的神情。最後，我對他們說：『雖然你們說了許多可怕的事實，却似乎並不氣餒。』他們搖首表示毫不失望的姿態，似乎很有強勁。然後，那位女子作一個標準的回答，那是每一處優秀的戰士所樂聞的，她說：『現在，事態是夠糟了；但是。假若我們氣餒了，那就更糟了。』

那位局長也接着談話了。他們的語調是我從廣州曾養甫市長直至西北的閻錫山將軍方面，漸漸聽慣了的。他說：『我們有三個不氣餒的理由：第一，日本人不希望我們戰，只是降，但是他們失望了，我們沒有降，却準備抗戰到底。第二，這次的戰爭促使中國產生了一個新的統一局面。第三，縱然在窮鄉僻壤，平時與外界隔絕，現在也發生了一種民族意識，這在我國的自治方面可算是一個永久的收穫』。

他轉向那位女士笑着說，要一個女子，爲了戰爭而拋却她甯靜的生活，趕上前線服務，那一定是很難的。她說：『假使日本人佔領了我的祖國，而我仍靜坐在

家，那麼我精神上是不會得到平安的。」

「假使精神喪失了，一切都完了；假使精神猶存，就沒有什麼喪失的，」前任青島公安局長回答道。「日本的侵略激起了中國的新精神。」

凡是了解中國的人，都預料到中國新精神的出現。一位曾任中國政府高等顧問的外人在戰後不久對我說：「日本，在十點當中，倒有九點是有利的，但是它就要失敗在這個第十點——中國道德原則的力量。中國人是一個道德修養很高的民族，二千多年以來，他們對於團體——家族——盡忠，強於他們個人生活的慾望。現代資本主義使得西方國家的個人主義異常崛起，而中國人却從未在這方面發展。他們看團體的旨意常常比他們個人的生命更重要。假使，一個中國人認爲當前戰爭是非義的，你雖砍下他的頭，他也不願一戰。我親眼看見一班反軍閥的人士，他們不願意戰爭，就被解押到刑場上，而他們邊走邊談，露着笑容，抽烟捲兒，一如平常。當他們最後把對於家庭的效忠移轉到更廣大的民族上面，就決定這是一次正義

的戰爭，他們那種奉獻生命的精神，會使全世界感到驚震。」

凡是以破壞任何民族精神的打擊，却使中國人的精神在實際上會堅強起來。中國在戰爭的錘鍊之下，已經養成了這樣一個民族；人民對於家族的效忠，已經給一個更有廣大意義的效忠取而代之了。在長沙附近的地方，人民把祭奉祖先的筵席取消，就用節省下來的錢救濟窮苦兵士的遺族，一羣年齡十四歲的兒童，趕到一處地方要求從軍，甚至遠在重慶，募軍當局一天要拒絕三個人。西安有一個年齡十四歲的兒童，當他的母親勸阻他的時候，他說：『母親，強盜已經闖入了我們的家園，惟一的生路只有抗戰，否則就必將淪為奴隸。』甚至有錢人家的子弟也遠道趕去投軍。有一位，在漢口報紙上刊登了一則啓事，作為對他父親的別辭：『最親愛的父親，我離開了你，並非我不愛你，却因為，我更愛我們的國家』。

國家意識在中國，多少是一種新的產物；人們可以劃出它生長的幾個階段。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韓復榘不戰而棄濟南的時候，我還記得當時漢口的空氣，顯得驚

慌無措。要中央政府處置一個獨立的軍閥，是如何的不可能；以前就沒有這樣的例子。政府起先命令李宗仁部下的精兵，調防在韓復榘軍隊的後方，阻止退却。中央對於這個顯然的權宜之計。頗爲自滿。後來，委員長逮捕了韓復榘，交軍事法庭審判，並處以槍決，同時治罪的還有二十四位畏敵棄職的官員。一種民族的自尊觀念遍及了全中國：『我們終於是強者，我們可以處置賣國賊了。』這樣事件的反響是不能預定的，所以漢口方面認爲第一次對於叛國軍閥治罪的宣判，乃是一種羣衆情緒的測驗，也只有羣衆正式同意之後，才見諸執行。

中國過去的污點仍舊籠罩了戰爭的初期。在新的聯合戰線中，不僅軍隊與軍隊之間缺乏彼此聯絡；其中仍有若干不減於軍閥傳統的小匪徒式的軍隊——就是軍隊與民衆之間的合作，最初幾乎僅限於活躍在山西省的第八路軍，及上海工人的愛國行動。甚至華北的一部份城市，商人組織了『招待委員會』，歡迎戰勝的日本人，滿望博得他們的憐憫。但是戰爭的試驗已經把軍閥式的軍隊逐漸淘汰了。一種蒸蒸

向上的民衆輿論處置了這類『招待委員』，他們不是給愛國份子暗殺，就在中國軍隊收復的時候，處以死刑。那班歡迎征服者的人，就不再受人尊敬而被看做維持和平並保護家鄉的聰明人，他們却被稱爲『賣國賊』。上海附近有一位可敬的學者。因爲被迫列名於日本人支配下的傀儡政府，憤而自殺，就得到全國人民的讚揚。

一九三八年四月間台兒莊的大勝利，——以及其他戰區的小勝利——博得了全世界的驚讚。全國的統一就是這次獲得勝利的主因。立功最大的廣西軍，就是不多幾年前與蔣介石政府作戰的；但現在，他們是替政府最出力的戰士了。中國軍事當局把世界大戰的教訓及第八路軍（以前也是南京政府的大敵）的游擊戰略融爲一爐。就拿這種戰術得勝了日本。這就認明了正面的陣地戰，及破壞敵人交通的游擊戰，兩者的配合運用，不必僅僅限於第八路軍，但也可以迅速地擴充到其他大規模的戰區。中國各地軍隊，也只相輔而行，才能取勝，並且表明這班軍隊在組織上，在力量上，在軍民合作上（充分接受人民援助）都有了進步。

若干月來，日軍進攻徐州，那裏是津浦線與隴海線的交叉點。他攻下了這城，就無異獲得了黃河流域的霸權，並可加強華北的據點西取南下，任其自便。當日本經過沿海的山東省前進的時候，游擊隊破壞他們的長途交通線。一羣一羣的『農民』在小河的旁邊，破壞了各處的溝渠，使日本軍用來運輸糧餉的公路爲大水所沒了，有的在緊要的關頭，拆毀了鐵軌。台兒莊大戰開始於三月廿三日，當時日軍三路合攻徐州，十六天以後，日軍向北潰退，六萬二千人當中，倒有四萬人，死的死，傷的傷，或是成了俘虜。中國軍隊一部份在前線圍困日軍，一部份作側面的奇襲，生擒活捉，而他們的糧餉早給後方的游擊打光了。野礮沒有子彈，坦克車沒有汽油，有些被俘的日本兵差不多成了待斃的餓殍了。

全世界的報紙，大大地贊許這一次中國的勝利，因爲他是日軍空前的慘敗。但是，此說也不盡然，因爲晉北的平型關及忻口之役，日軍的損失也是異常慘重，並且延緩了日軍的前進，就時間與空間而言，也是在戰略上很重要的。但是台兒莊大

勝影響中國在全世界的聲譽更大，它在好幾方面改變了遠東的全貌。日本無敵的神話，在全世界戰時新聞訪員的眼前打得粉碎。在東京，內閣解體的危機，大有山雨欲來的情勢。每個國家裏，保守的軍事專家，也初次承認了中國取得最後勝利的可能性，——祇要中國的民氣能夠維持下去。

台兒莊大勝影響於中國的民氣也是同樣的重要。在其他的戰線上，中國軍隊取了攻勢，收復了一些失地。甚至在北平及上海的近郊，日軍的支隊也開始遭受游擊隊的攻襲了。每個中國城市都有廣大的慶祝會。在漢口，汽車與貨車狂鳴於市，到處擁擠着歡呼的人民。傍晚時，十萬人（代表一百團體）集合在市公園裏，並舉行一次大規模火炬遊行，經過了全市的通衢大道，戲劇隊一面參加遊行，一面開映電影。學生及兒童唱歌隊合唱中國的新軍歌。商店和住宅都燃放爆竹，以示同慶。

台兒莊大戰以後的一個月，日本領師來華。最後他們佔領了徐州。這比較他們所期望的遲了幾個月——或者說，也超過中國人自己的預期。——日軍沿着隴海路

向黃河流域進攻，突然經黃河的大水所阻。河壩的崩裂，顯然有很多的原因。幾年以來水利專家就說過，黃河改道的大水患已經過期了。戰事使得每年的修理不能照常，實際上，大水的高漲是不可避免的。日本軍隊拚力渡河，就用大礮轟燬了河堤。無論這種大水是否爲中國軍隊所助成，他們都知道得很清楚，大水已在來了。他們見機運策。把大水變成一件武器，這與歷史上荷蘭水淹敵軍的策略先後輝映。他們同時迅速退却，就使這樣的水成了他們與日軍的分界。大部份的中國軍隊及平民已經疏散了，中國人生命的損失很小。日本大量的軍器却被埋沒在泥水之下。生龍活虎的中國游擊隊，就撥開盈膝的大水，奪回許多日軍佔領的陣地。大水延緩了日軍從漢口的北面進攻，而使他們非在揚子江流域越過重重的難關不可；這也保持了漢口與西北之間的鐵路交通。幾個月以後日軍還不能越過黃河流域。

中國空軍的兩次壯行，提高了中國的民氣，並博得全世界更大的聲譽。空襲台灣，得到很大的成功，因爲日本利用台灣作爲進攻廣東的空軍根據地。這是日本屬

地所遭受的第一次空襲。

正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放棄徐州的那天，中國以完成空襲日本城市的壯舉回答敵人。中國飛機所投下的不是炸彈，却是勸告日本人民阻止軍閥的傳單。在日本上空撒下的傳單共有五種，具名爲（一）中國空軍；（二）中國人民；（三）中國勞工總會；（四）日本士兵反戰同盟；（五）日本在漢口的俘虜。

前面二種傳單用的是外交辭令，可算是遠東最有禮貌的文件：

「親愛的日本大眾：

大中華民國的空軍，現在飛臨貴國。我們的目的不在破壞生命與財產，但是要把貴國軍閥在中國全境的罪行告訴你們。……」（下面列舉日本飛機轟炸中國平民的一大篇血賬）

中國勞工總會對於日本工人的勸告，語調完全不同了：

『聽！聽！

自由不是從天而降的！現在是人民爭取自由的時候了，弟兄們！生產事業是由你們管理的，而供給軍閥的資源也完全在你們的手中，起來運用你們的大力吧！你們握着東亞的命運！打倒日本軍閥！快用總罷工的武器，解放中日兩國人民的苦痛。』

日本士兵反戰大同盟的傳單更爲重要，因爲這就向日本人民表示了，在他們自己的兵士當中已經有了反戰的組織。

『諸位戰友！

這班長期暴虐軍閥，謀害高橋，強逼議會，把五十萬的同胞變成砲灰，藉名捐稅，採取人民數十萬萬元的血汗，現在是我們推翻他們的時候了！……請

看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爲正義而犧牲……！戰友們啊！不要死，不要受傷，趕快回國去！

東京，大阪，京都，滿洲士兵反戰同盟支部』

日本俘虜的傳單也是重要的，因爲這就證明，他們被俘了，中國人饒赦他們的生命，這兩樁事實是日本新聞檢查員所否認的。

『戰友們，我們要告訴你們一些真情實事。我們都受傷了，被俘了，總以爲死於敵手而無疑。長官告訴我們，中國軍隊的殘忍。但是我們頗受優待，自由地生活着。中國當局痛恨日本軍閥的侵略，而不仇視日本人民。哦！當我們轉念到蹂躪這樣充滿愛心的人民，我們真是汗顏無地了！

在漢口的日本傷兵』

若干中國地方政府，也在日軍的後方組織起來，這是中國新精神最驚奇的表現。騎兵們幫助窮苦的農民種田，工人們歡呼歌唱着替游擊戰士盡義務，做制服，步兵們的『隱身前進』術，勝過了敵人的機關槍。以上是一九三八年春間，聯合社記者哈爾漢笙 (Hal Hanson) 個人書信部份的報告。沿平漢線各城市中的美國傳教士須領兩種通行證，一是佔領鐵路線的日軍所發，一是保衛附近土地的第八路軍所發。他們從鐵道線駕駛了數里路的自由車，就向中國哨兵出示他們的通行證，走近了完全爲中國人控制的區域。那裏有幾個這樣的地方政府，林彪將軍坐鎮的晉北五台山是其中最強固的一箇；河北省也有一個強固而親民的地方政府，就是大部份情報的來源。

這個河北區包括十七縣住有七百萬人民。全區的組織變成軍事化。衛兵巡邏每一個鄉村及要道；只須有通行證人貨均得通行無阻。每一區的最高權力爲當地農民

及紳士所組織的『動員委員會』所執掌，參加的紳士必須徵集人力物力，以利抗戰。所謂民衆的武力，就是一小隊流動部隊，配置了精良的機關槍，其主要任務爲破壞日軍的鐵路線，還有五十萬的農民義勇軍都佩有手榴彈，大刀，少數的手槍和來福槍，準備保衛他們的鄉土。青年們被訓練爲流動的領袖。兒童担任童子軍，婦女抗戰後援會已經有了四十萬個會員，在家裏趕製綳帶鞋子，及類似的用具。在七百萬全部人民當中，倒有一百萬以上的人活躍於抗戰的工作。

聯合社記者曾經親眼看見一次軍事演習，他的描寫是非常動人的。三千個人躺在二方哩的露天廣場上。他們每隔二十呎有一個人，全體的制服與地面的顏色一樣；因此遠處的人幾乎看不見他們，空中投下一顆炸彈，頂多炸死一打的半數。跟着一個預定的信號，一個從遠處立起向右跑，再臥倒下來，人們只能有四秒鐘看見他們。當他跑過三分之二的距離，另一個人從左旁立起來，也是同樣地向前跑。他們從四面八方向前進，但是毫無秩序，沒有一個槍手可以訓練到像機關槍那樣迅速

地射擊他們；十二架機關槍向這個廣場掃射，半小時以內不能擊中十個人。這位新聞記者說：『當我看見這支偉大而又隱身的戰士向前進的時候，真是不寒而慄。』

區內也有相當的麥子和棉花出產，嚴格的統制，使得大部份不致落在日本人的手裏，逼住他們輸進自己的糧食。一家制服廠就拿本地紡織的棉花，每天趕製一千一百套制服；，冬天採用褐色，因爲地面上寸草皆無，可以避免空襲，夏天採用綠色，可以與田野相配。每套制服大概價值三角四分美金；一個兵士的全套制服——包括襯衫，襪子，及鞋帽——大概價值一元二角半的美金。十一處兵工廠製造來福槍，白礮，火藥，手榴彈，及大刀。在戰爭的開始，第八路軍把向太原進發的大批鋼料廢鐵搶奪下來了。北平大學裏的化學教授也在兵工廠工作，補充酸料的不足。其他的缺乏可以拿日本佔領區域地下的葡萄藤補充，或者出於搜索。當中國軍隊拿出五角錢，向人民收買日本電報線裏的銅質，他們都表現很大的熱誠。全村的人民來了一次搜銅的總動員，其結果軍隊無力收買那樣許多。

新聞記者在這區域裏所發見的學校十倍於北平，這個教育中心附近，爲日本所控制的全境，無論何處，只要中國的普通人民有了力量，他們就立刻增設學校，異常神速。至於遊擊區域裏的交通制度，有廣及三千個城市及鄉村的郵政，及各地有六百分局與三千哩長的電話線，一切進行十分完備。十處無線電台傳達軍事新聞，並收錄外界的消息。所有的消息都登載在十七種小型而創見的日報。當蔣委員長在漢口作了一次演講，北平市的報紙也許禁止登載，而在周圍盡是日本人的河北省中十七縣，第二天早上報紙上倒可以把演詞佈露出來了。

當日軍沿着鐵路線進攻的時候，同樣的組織就跟着在他們的後方一一產生，全國的情形都是如此吧。戰爭不僅存在於軍隊與軍隊之間，而更是一支侵略軍與一國堅強的人民之間的戰爭。這種傾向，日漸顯著。中國爲了要反抗日本現代化的武器，就組織了它的廣大的地域與人力。日本的回答，就是組織華人遊擊隊，並且要把整個的村莊燒燬，屠殺，但是在河北省中，日本人僱用了十二隊匪兵，其中最

初的幾個月內，不是爲中國人繳械，就是自動歸降了。甚至鄉村的燒燬也相同地爲中國的反攻所阻止。當人民不能受到保護的時候，當地的上級密探，就警告他們退却；日本人走了以後，當地政府再協同重建這個村莊。日本的主要目的在破壞中國人民的意志。然而一九三八年六月初廣州的大轟炸——那是歷史上最殘忍的空襲，無辜受難的軍民達一萬以上，並引起英美一致抗議，——既不能截斷了廣東與華中間的鐵路交通，也沒有分化了廣東人民與中央政府的關係。

日本軍隊愈是向前進，愈將爲有組織的敵愾同仇的中國人民困於流河之中，不能振拔，這就使中國人民在四千年歷史中，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力量。蔣介石夫人在一九三八年的春末，曾經寫信告訴我：『自從你走了以後，中國的民氣更加提高了，我們的信念使得那班難民及一切受苦的人們都努力生活，一無怨言。我們的兵士作戰的英勇簡直是空前所未有。』蔣總司令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抗戰一周年的那天說：『我們喪失了土地，但是從抗爭中喪失的；因此，把中國精神的火燄更燃

燒得光明。至於這種精神能從日軍所造成的廢墟中建立起新中國的機構。」

我了解總司令這段話的意義所在，因為我親眼看見他面帶愉快之色，甚至在一九三七年冬間更暗淡時期，他也並不氣餒。此後我在華北華南旅行，到處看見人民一致擁戴他抵抗日本。他在任何壓迫之下，堅定意志，現在他就爲了這個原故，在戰爭當中，最能與民衆融洽。南方的廣東和他鬥爭了好幾年，現在，他出現在電影幕上的時候，羣衆就報以歡呼。北方的共產黨也說過：『十年以來，我們深知他是一個堅強的人；現在，我們相信，他會堅強地抵抗日本。』

人們若不清楚地了解蔣總司令接受了四千年歷史的遺產，將有一天成功一個青史明標的偉大人物，而供後世的崇拜，誰也不能達到像他那樣崇高的地位。十年以來，他拚力想拿武力完成統一；僅僅得到一種混和着仇恨而可悲的一半服從。現在，他知道，他仍舊可以繼續百年建國的大業，在他的領導之下可以完成孫中山博士以及其他一切先進所夢想的中國的統一，獨立與再生。

第十七章

中國赤化到如何程度

在中國共產主義的消息中穿插着許多的事實，謠傳與誇張。蔣介石夫人接到美國衛斯理同學的來信，問起中國是否傾向共產主義化。聯合社 (The Associated Press) 從『河北的一個共產主義政府』寄出各種通訊的記載來。這一個政府是在日本後方，而為中國中央政府所核准的。東京政府以為整個的中國已經變為共產主義化，否則它為什麼這樣無理地反對日本呢？相反的，有些守舊的中國人却要對你說，中國完全沒有共產主義，甚至在共產主義者的心裏也沒有共產主義的思想。其

理由就是說：『他們承認了他們的錯誤，而歸附了國民黨。』

在種種矛盾的說法中，有幾件事實是不能爭辨的。大家都承認蔣介石是中國最高的領袖，並且他不是共產主義者。（他曾與共產黨戰爭了十年之久。）大家都知道現在執政的是國民黨。大家也明白國民黨與共產黨是互相合作——正如其他一切公認的團體或政黨一樣——並且這種合作就是中國現有力量的基礎。但是他們怎樣合作呢？究竟那一方對別一方讓步呢？這種合作是怎樣堅固又會怎樣永久呢？它要走到那一個方向呢？中國在實際上或內心裏究竟赤化到如何程度呢？這些問題在中國政府每次發生變動，國民黨每次舉行大會與共產黨每次發佈宣言的時候，都成爲世界報章上主要的新聞。

一個美國遊歷者在中國所看到的第一件顯著事實，就是中國離開共產主義還是很遠，它剛正開始走向民主主義的道路。第二件事實就是共產黨員對於每一種民主主義上的獲得是最感覺興高采烈的。我們也看到一種令人發生驚異的國民黨命令

——准許言論、出版與結社自由，並允許在戰後建設一種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却被一位紐約時報的記者認爲『對於共產黨的一種讓步』。第三件可注意的事實，就是現在參與中央政府的共產黨員還是極少，但是他們在任何地方得到了勢力或統治，就使那地方特別變爲民主化而也特別效忠於中央政府。

這些矛盾現象的理由是在於中國的歷史。中國廣大的，不識字的農民區域從來不知道現代民主主義的意義。中國的農村——不像日本的集權封建制度——有極大的地方自治權；但村長都是由重要的家長所選擇，不過年輕的或是貧窮的人都沒有發言權。幾百年來中央政府就是一種無限制的君主政體。中國在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政府以後，短期內出現了一種民選的國會，但因財產與教育的資格，只准少數的人有選舉權。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並不冒稱民主政體；它要訓練民衆，使他們將來有自治的能力。如今在戰爭的激盪中，那種自治的希望却更接近了。正因爲這種事實與那種使平民得到更自由而更優美生活的希望，就造成了中國人民在這次戰爭中所

表示的驚奇精神。

如果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要立刻建立共產主義或以爲共產主義能夠馬上實行，那麼對於共產主義與這些新興民主政治希望的關係也可以更加清楚了。他們看中國人民完全的解放是一種長期複雜的過程，並且包含中國國內的因素與世界情勢的條件。爲了這個緣故，他們就成爲共產國際中重要的會員，而對於它的討論決議與實施，都有很大的貢獻。然而自從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以後，他們迫切的要求就是要使工人農民有組織的權利，以參與政府，而得到更優美的生活。中國的脫離外國統制，乃是這些要求的先決條件。所以共產黨員要積極地加強並擴大國民黨的勢力，使它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間爲了統一獨立的中國而奮鬥。他們以爲這是使中國——與全世界——一切的平民得到優美生活的第一個步驟，並且也祇有社會主義能夠最後完成這樣的事業。

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參加了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蔣介石就是在這

次戰爭中得勢的。國共兩黨在合作時代都擁護著名的『三民主義』。在國共分家以後的十年內戰中，共產黨員甚至可以說他們的擁護三民主義比南京政府更是積極。他們督促反抗日本，可說是『民族主義』；但政府却讓其喪權失土。他們要求人民有言論自由與組織的權利，可說是『民權主義』；但在好幾年中這些自由權都被政府剝奪了。他們所宣佈的『民生主義』就是在於租稅的減低，農村的信用放款，工人的增高工資與社會保險。但是由銀行家統制的政府却主張武力統一，穩定金融，與建築道路。這些共產黨員很可以自稱，這種堅強的抵抗日本與逐漸發長的民主主義不過是履行了他們素來所要求的綱領而已。

依據國民黨的理論家看來，『階級鬥爭』就是兩黨間的一大異點。這是對的，但並非從它普通所表示的簡單形式上看的。國共兩黨間的分裂確是由階級鬥爭中發生出來的。後來這種鬥爭，也在兩方面繼續不斷。南京的國民黨政府禁止工人與農民的組織；共產黨在取得政權的地方也要推翻地主與債主。他們把土地分給佃農，

毀滅舊的地界與契券。他們建立了蘇維埃政府以後，就否認『剝削份子』的選舉權，他們這樣做是由於他們相信，祇有推翻了地主和他們一夥的軍閥纔能解救中國民衆的苦況。但達到這個目標的路線已被日本的侵略所改變，而中國國內階級間的關係也因此修正了。這種侵略使一切階級都共同深切地感覺到將要做亡國奴的威脅；同時因爲民衆的組織與武裝，就加強了工農在國民生活中統治的力量。

中國共產黨員最先看出，要反抗公共的仇敵就有聯合行動的必要。在日本侵佔滿洲以後，他們立刻提議願意和中國任何抗日的勢力合作。這些提議以及最後造成反侵略聯合戰線的歷史，已經在本書第八章裏講起過了，我們在這裏只要注意，從共產黨的理論看來，這種合作不是一種退讓，却是一種促成中國獨立的進步，也就是他們綱領中第一個條件。他們不但以良善的國民資格，而且也以良善的共產黨員資格，來效忠於反侵略的民族統一陣線。然而爲了統一的緣故，他們已經作了幾種讓步，其中主要的讓步就是在他們的管轄區域內不再剝奪地主的選舉權。甚至在那

些農民自動組織起來反抗日本與地主的地方，第八路軍却要說服他們祇要攻擊賣國的地主，並且勸導別人有加入抗日聯合戰線的必要。

任弼時曾經坦白地對我說：『我們正在緩和而非注重階級鬥爭。凡在我們已把日本人逐走而急需組織地方政府的區域裏，我們召集窮苦農民來開會時，不再把富有的人除外。但是我們要求減低租稅與利率，否則普通的人民就不能忍受戰爭的苦痛了。在有些地方，因爲一個地主殺死了一個佃農而將引起流血鬥爭的時候，我們就居間調解，使地主對於佃農家屬作經濟上的賠償。中國人決不可再打中國人，因爲我們正在共同對付日本奴化政策的更大危險。』

聯合社所敘述的著名的『河北省共產政府』是這些策略的最好例子。這是在日本後方的一個非常時政府，但它得到中央政府的核准，而也効忠於中央政府。從事實上看來，這種政府的効忠於中國中央政府是它歷史上從來所未有的，因爲在過去的時候，它的所在地是由半獨立的軍閥所統治的。這個區域雖然是由第八路軍組織

起來的，但到那邊去視察過的外國人，都說共產黨員拒絕了地方政府中許多的職位，因為聯合社的記者報告說：『他們最大的恐懼就是國民黨中的重要份子或許停止合作抗日，所以他們要在各種可能範圍內避免爭權的嫌疑。』

共產黨員雖不排斥地主，可是很靈巧地規定救濟農民的辦法。凡逃往北平的地主所有的土地，仍舊視為所有者的產業，但暫時由新政府用以分給一般貧民以及被焚村莊的難民。這些地方政府要徵收地租而算在地主的賬上，但同時它們可以得到許多的進款。一切的租金都已減低，通常大約要減低百分之二十五。一切債款都被准許緩付三年；而期間的利息規定至多為一分。捐稅是分等級的，所以公家所徵發的糧食、衣服、和器具是由富足的人負擔，而一般窮苦的人都可豁免。這種方法是各縣不同的，有一種標準的方法就是：凡農家每人所有的田地不及半畝時，就可完全免稅；這可保證耕種小塊田地的家庭是不必付稅的。凡是沒有牲口的農民，常常可以借軍隊的馬來耕地；這種方法是大規模施行的。凡從被焚村莊逃來的難民都由

地方政府供給糧食，直等到他們的田地有了收穫爲止。這一切的方法很能喚起大多數人民深切的效忠。

在共產黨統治下最久的地方就是陝北的「特別邊區」。那邊乾燥多山，到處呈露窮乏的景象，並且接近蒙古南部的「饑荒地帶」。這個區域的面積比較很大——大約有六百五十哩長，三百哩闊——但其中的居民差不多祇有一百五十萬人。他們的食料除了極有限的麥粉與羊肉以外，只是些小米，玉蜀黍與蕃薯。在九年以前，這個地帶內已經成立了許多小蘇區，並且是由地方上武裝民團保護的。紅軍的大隊只是在一九三五年『長征』以後到那邊的。那時他們就建立了中國最大的蘇區。

差不多一年以後，斯諾到該區去視察。他發見那邊的佃農、貧農、中農與一切毫無所有的人的生活狀況已經根本地改善了。在新區裏一切租稅，第一每年都完全豁免，因此農民們得以透一口氣。在舊區裏，只對於土地徵收累進的單一稅，而對於商業也祇收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單一稅。他們把從富有的人家拿來的土地和牲

畜從新分配給窮苦的人，並且把區域很大的『荒地』——大半是無主的或地主逃跑的土地——從新加以開墾。鴉片已經完全禁絕了；求乞和失業的情形也被清除了；纏足與殺嬰的風氣都被認為犯罪的行爲；奴婢與妓女也無形消滅了。

蘇區對於教育與別種文化活動尤其是注意的。那邊已經組織了小學教員的師範學校一所，農業學校一所，紡織學校一所，職工學校一所，黨務訓練學校一所以及小學兩百所。紅軍在困難的『長征』中，不但拿着他們的軍器，並且也帶了簡單工業器具——鋸牀，手搖機，打印機，印模機以及半打的勝家縫衣機。他們藉着這些機器就建立了小小的工廠。他們在這一年半的長途旅行中，帶了石印的石板與輕便的印刷機把文化傳佈到荒僻的西北。斯諾曾經說：『我還注意到大多數的農民談到蘇維埃時，總是說，「我們的政府」，在中國的農村裏這是嶄新的，使人感到驚奇的。』

（見斯諾的西行漫記）

一九三七年聯合戰線成立了以後，蘇區就改名爲『特別邊區』，而歸中央政府所

統治。因此他們就准許地主回來，並把一部份土地還給他們，可以作爲私人之用。以前的土地改良政策——就是把田地交給實際上的耕者——已經證明是防免飢荒的主要因素。共產黨自動地發起在一九三七年底舉行了民主化的地方選舉，使以前無選舉權的地主與商人都可與農民一同投票。這可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普及選舉。不但男人有選舉權，而且女人也是包括在內的。他們在選舉以前，到處推進宣傳運動。各地的投票處已經設立了。凡不識字的投票員，都由學生幫助他們寫選舉票。在大多數的村莊裏，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民參加這種選舉；在那些只有一半人數參加選舉的區域是認爲落後的。在大多數的地方，共產黨員仍舊是當選的。

中國共產黨對於目前戰局的計劃也許可以稱爲一種『民族戰線』的綱領。他們已經擬定了一種『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以詳細說明他們對於國難期間中國人民能夠聯合行動的主張。凡是在第八路軍活動的區域都揭示了這樣的十大綱領（全文如下）：

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一)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對日絕交，驅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偵探，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財產，否認日本外債，廢除日本條約，收回日本租界，爲保衛華北與沿海各地而血戰到底。爲收復平津與東北而血戰到底。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任何的動搖妥協。

(二) 全國軍事的總動員：

動員全國海陸空軍實行全國抗戰。反對單純防禦的消極作戰方針，採取獨立自主的積極作戰方針。建立經常的國防會議，討論與決定國防計劃與作戰方針。武裝人民，發展抗日的游擊戰爭，配合主力軍作戰。改革軍隊的政治工作，使指揮員與戰鬥員團結一致，軍隊與人民團結一致，發揚軍隊的積極性。援助東北人民革命軍，東北義勇軍。破壞敵人的後方。實現一切抗戰軍隊的平等待遇。建立全國各地軍區，動員全民族參戰，以便從僱傭兵役制轉變爲義務兵役制。

(三) 全國人民的總動員：

全國人民除漢奸外，皆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武裝抗敵之自由。廢除一切束縛人民愛國運動的舊法令，頒佈革命的新法令。釋放一切愛國的革命的政治犯，開放黨禁。全中國人民動員起來武裝起來，參加抗戰，實行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鎗出鎗，有知識出知識；動員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決和民族自治的原則下，共同抗日。

(四) 改革政治機構：

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通過真正的民主憲法，決定抗日救國方針，選舉國防政府。國防政府必須吸收各黨各派及人民團體的革命分子，驅逐親日分子。國防政府採取民主集中制，他是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國防政府執行抗日救國的革命政策。實行地方自治，剷除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府。

(五) 抗日的外交政策：

在不喪失領地主權的範圍內，與一切反對日本侵略主義的國家訂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軍事互助協定。擁護和平陣綫，反對德日意侵略陣綫。聯合朝鮮台灣及日本國內工農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六) 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

財政政策以有錢出錢及沒收漢奸財產作抗日經費為原則。經濟政策是整頓與擴大國防生產，發展農村經濟，保證戰時農產品的自給。提倡國貨，改良土產，禁絕日貨，取締奸商，反對投機操縱。

(七) 改良人民生活：

改良工人農民職員教員及抗日軍人的待遇。優待抗日軍人的家屬。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救濟失業。調節糧食。賑濟災荒。

(八) 抗日的教育政策：

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實施普及的，義務的，免費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覺悟的程度。實行全國學生的武裝訓練。

(九) 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

(十) 抗日的民族團結：

在國共兩黨徹底合作的基礎上，建立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抗日戰爭，精誠團結，共赴國難。

以上的綱領不是要說明共產黨主義的原理，却是要提供今日中國中央政府所應當立即採取的行動綱領。

許多共產黨員的家屬或朋友，雖然在南京政府的剿共內戰中犧牲了，可是他們現在都很忠實地擁護中國的中央政府。當我遇見這位著名女作家丁玲女士的時候，我很詫異地發覺她還在人間。因爲好幾年以前，她在上海祕密被捕而拘留在南京監獄裏，後來傳聞她已經被槍決了。然而在我們討論她的劇團以後，我就順便請問她個人的歷史以及她被捕未死的情形。她却躊躇了一刻，回答說：『因爲我們現在和政府結成了聯合的戰線，所以我很不願意討論我入獄的經過。』這班共產黨員當然有

許多痛苦的回憶，但是他們爲了中華民族的緣故，就決意把它們埋葬了。

中國國內反對聯合抗日陣線的團體祇有托洛斯基派，法西斯派，和親日派的漢奸。在中日戰爭的初期，托洛斯基派公開地表明他們的理論——這是在漢口地方他們中間的一位對我講的——據說，蔣介石的政府是『中國工人的主要仇敵』，所以工人們應當推翻它，即假手於日本，也是可以的。這種見解顯然是大逆不道的，當然得不到隨聲附和的人，後來托洛斯基本人也在報章上否認這樣的理論。但是那些承認以前是托洛斯基派，而現今在中國政府與國民黨裏擔任職務的人，有許多形跡，還是令人可疑的。他們的人數雖然極少，可是他們也是中國的一種嚴重的危險——不但要危害共產黨的生命，而且也要危害中國抗戰的成功。

因爲第八路軍在戰事上的成功，中國共產黨的聲望與地位已經顯然提高了。在我遊歷的期內，漢口一切書店裏鎖路最廣的就是關於共產黨員，尤其是關於他們軍隊的書籍。紅軍怎樣變成第八路軍的銷路是在其他一切書籍之上。還有第八路軍的

回憶，特別蘇區的生活與毛澤東傳，也是很流行的。祇有那些關於滬戰中英雄的著述，纔能和以上好銷的書籍並駕齊驅。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共產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終於被准許在漢口出版。它的銷數在三個月以內已超過了五萬份。聽說在國內地的報紙中，它的銷數可算是最大了。

共產黨現有的地位，若非經過奮鬥，是不能獲得的。當我在一九三七年底到漢口遊歷的時候，中國的共產黨員還不能像美國共產黨員那樣的享受法律上的權利。在十二月的上旬，武昌的一個學生集會，爲了邀請周恩來去演講，就被政府禁止了。但在一九三八年二月裏，周恩來却做了軍委會政治部的副主任，他的獲得這個地位，是因爲共產黨員在這種工作上所有的特別才能。共產黨的新華日報雖由法律核准，但在發刊的第一個星期中，就被托派和法西斯派中的人搗毀了。在一九三八年開頭的幾個月中，共產黨的領袖有時也要爲政治的流氓團體所襲擊或暗殺。各地反動的或腐敗的官吏，有時在漢口方面的官員，要用高壓手段來對付共產黨的活

動。但無論什麼時候，這些高壓行動引起了蔣總司令的注意，他就立刻取消禁令，並斥責主動的人。新華日報的被襲擊是在蔣總司令離開漢口的時候，因為大家都知道他要擁護他和共產黨成立的聯合戰線。

有些國民黨員曾經在言論中表示這樣的懷疑：『如果中國戰勝了以後，將來天下是屬於共產黨員的。』爲了要減少這種懷疑起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就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表了一篇宣言，表明不但在戰爭期內要和國民黨聯合抗日，並且『在勝利以後，對於新中國的建設還要繼續合作。』幾個月以後，漢口的共產黨機關報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也詳細辨明這點說：『如果國民黨與共產黨藉着聯合的力量把日本侵略者趕走了，那麼國民黨將要在行動上證明它是爲中華民族生存而戰的最大的黨，並且它的領袖蔣介石先生和別的決心領導反日戰爭的人都將成爲中國不朽的民族英雄！那時誰能發動一種鬥爭，以推翻國民黨呢？……中國共產黨也要受到人民的擁護與尊敬，所以沒有人能夠違反民意而推翻共產黨。……』

國民黨與共產黨將更發揚兩黨在戰爭困難時期內合作的精神。」

毛澤東說：「共產黨已經提出了建立一個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口號。這裏面所包括的事情非兩年三年或五年所能達到的。這必須經過一個長時期的過程，纔能實現民族的獨立，民主化的政府與人民生活的改善。」共產黨的機關報也曾在評論中說：「這種從勝利過程中產生出來的民主共和國，自然是和歐美的舊式民主共和國不同的，但是我們所提議的，絕對不是一種蘇維埃或非資本主義的共和國。它必將是一種新式的民主共和國。」

在中國，民主政治的本身就是一種革命，關於這一點，一切政黨是同意的。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國民黨在漢口舉行的第六次非常會議，以及七月初所召集的國民參政會會議，都可以很清楚地表示中國在民主政治方面的發展程度。那次的國民黨大會保證「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祇要它們不違反國防的基本工作」。它宣稱，戰爭的勝利「不單靠軍事的力量，也要靠我們民衆的力量」，所以

它承認有提倡農、工、商、學聯合會的必要，並使人民加入抗戰的工作而準備參與政治的活動。爲了要使人民參與政治的緣故，它就設立一個國民參政會，代表各黨各派的人物。這次的國民黨大會，依據周恩來的說法，是被共產黨認爲十年中最滿意的一次大會。

在七月的第一個星期中，新組織的國民參政會就此開幕，其中二百個代表來自中國的一切省份，五個特別市，蒙古與西藏。參政會的正副議長與一切代表都是由國民黨委派的；但這是十年來第一次代表全國民意的會議。其中有九十一位參政員爲政府與黨的職員，五十九位教員，六位金融家，六位文化工作人員與六位新聞家。其中九位是女代表。汪精衛議長宣佈它的使命是要『統一人民與加強國家抗戰的力量，並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礎，使中國在戰爭以後，能夠立刻實行憲政主義。』蔣總司令也說，參政會是中國走向未來民主政治的一大進步。共產黨在二百名參政員中只有七個代表。它在一個正式決議中說：『中國的政治生活是在不斷地向着民主主

義的道路邁進。』

祇有爲自由而戰的民族，纔敢在戰時加強民主政治的勢力。現在中國政府所採行的各種組織民衆與武裝民衆的方法，就可保證戰事結束以後，中國的社會制度，無論有什麼變動，都要依照人民的意志。少則沒有一個中國的政黨敢提出的，多則沒有一個政黨會請求的。

但當中國走向民主主義的時候，日本將急速地走向法西主義。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的帝國總部握取了戰爭的管理權。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全國總動員法也通過了。在五月裏該法的幾部分已經施行了。於是軍部的極端派在內閣中的勢力就大大增加了。

因此，中國人民爲反抗侵略者而爭取自由的奮鬥，就逐步地變成了全世界的平民爲反抗法西斯壓迫者與戰爭製造者而爭取權利的奮鬥。

第十八章

中國往那裏去——世界往那裏去？

『中國往那裏去？』這個問題，如果祇關乎中國一國，那就很複雜了。但地球上各大強國都與這種戰爭有關；所以這個問題就變成了『世界往那裏去？』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中日兩國都在正式舉行戰爭開始的週年紀念。日本能在軍事地圖上誇稱它已經侵佔了中國本部四分之一的土地，四十萬方哩的東北區域。它的軍隊仍在前進，可是速度比以前遲緩了。它有顯著的獲得，但它所付的代價是很慘重的。在它遣派到中國大陸的一百三十萬兵士中，二三十萬人已經在戰事中消

滅了，四十萬人必須防守滿洲，還有六十萬人，已被分散在一百五十哩長的戰線上。有些軍隊被中國游擊隊圍困在山西的城市中，祇可從飛機上得到他們的給養；別的兵士正在揚子江流域火熱的田地中掙扎着；還有別的人馬又爲黃河的大水所阻隔。日本在炮火方面每天要耗費五百萬元（依據一九三八年六月二日紐約時報的估計），而且已經超過了日俄戰爭時全部軍費的一倍——況且日俄戰爭的耗費已使這個島國在經濟上覺得疲憊了。

中國已經忍受了嚴重的損失，而且還要對付將來更大的苦難。五十萬以上的精銳軍隊已經戰死了，大約五十萬的平民也慘遭屠殺了。敵人前進時沿路焚燒中國的民房，常使火光瀰漫於天際。許多鄉鎮全成一片焦地；數千萬人民已流爲無家可歸。揚子江三角洲，以前是世界上最稠密的地帶，如今却變成一所屠宰場了。中國所有四分之三的現代工業已遭毀滅，三分之二的鐵路已被佔據，大多數的商埠與二個著名的都會已經淪陷。中國人所可慶祝的，大半是在於新中國的精神。然而這

一種勝利是太大了，所以不問它損失如何，它却比以前強固了。漢口方面宣稱，『在我們四千年的歷史中從未有過比現在更強固，更有組織，與更統一的局面。』那種說法是確實的。

這種中國的精神傳播到各戰線之外，而把軍事地圖取消了。凡是日軍佔領的區域中，到處都有效忠於中國中央的地方政府與武裝軍隊。北平城彷彿是處在游擊戰的大海中；中國的流動部隊不時攻擊它的四郊，而破壞了它的發電廠。上海的居民也差不多每夜能聽聞近郊游擊隊的槍聲。那些由日本人委派去管理淪陷區域的偽官，常被這班服從中央政府的民衆所殺死。甚至在日本佔領了七年以後的滿洲，仍有有增無減地發生騷動的事件；七月下旬，瀋陽方面價值一百萬元的兵工廠也被炸燬了。幾年以前，正在日本軍人覬覦滿洲而當它是『一塊吞下肚子的美味肉圓』時，幣原男爵（濱口內閣中的外相）曾經警告他們說，這塊肉圓也許含有一顆炸彈，將要在他們肚子裏爆發出來的。這個警告似乎是被證實了。

中國人說：『在戰爭的初期，勝利是屬於炮身口徑最大的那一邊。在戰爭的末了，最後的勝利，是屬於人對人的持久力最大的這一邊了。』

軍事行動的重大消耗，削弱了日本的國勢；同時中國却加強了長期抗戰的力量，它可以延遲敵人，也可以停止活動，又可以再度反攻。所以中國聯合運用了三種不同的戰爭——陣地戰，運動戰，與游擊戰——這一切戰爭的方式，都可增強它的力量。蔣總司令說：『我們廣大的土地與豐富的物產，可以使我們相信我們的經濟力量是決不會枯竭的。』白崇禧參謀長——他是從西南諸省中組織最完善的廣西省出來的——曾經宣稱，戰爭無論怎樣久，損失無論怎樣大，中國能夠繼續維持二百萬武裝的軍隊。同時在淪陷區域內戰鬥的農民，也能阻止日本得到安定的勝利。朱德也曾對我說：『中國將來的勝利有很多方面是要靠華北的農民自衛團。』

中國正在內地諸省迅速地建立一個新的經濟根據地。自從南京淪陷以後，中國的首都已在重慶——這地方離揚子江口有一千四百哩之遙，並在著名的山峽之外，

所以它是不容易受日本攻擊的。在過去的歷史上中國的領袖，往往因為外來的侵略而躲避到這四川省中，維持數百年的獨立生活。這個省份因為天然的美麗與物產的豐富，曾被稱為『天富之國』。一年兩熟的農產物到處是很豐富的。在過去的兩年中，四川似乎在準備非常的變動，已經有六條公路可通鄰近的省份。這些公路所到達的地方富有煤、鐵、鉛、鎳、錫、銀、金等礦產；甚至煤油也已經被發見了。它在地勢上似乎比較偏僻一些，可是它也有通國際的道路——南可通至法屬印度支那，西南可通至英屬緬甸，西北可通至俄屬土耳其斯坦——這些新路線都是最近築成的。四川的人民常常是很勤苦耐勞的，現在他們都已經覺悟了，並且已經組織起來了。

日本的軍閥雖在中國得到了許多的勝利，但在國內却開始走入失敗的途徑。經過一年的戰爭以後，日本國內已顯露緊張的狀態。生活程度已經提高了，主要的貨品已被限制發賣了，非戰時的工業已被破壞了。鐵鍋是很難買到的；棉織品是不再為平民所享受了；愛國主義已促使人民廢棄皮鞋而穿木屐了。日本在華北的投資不

但得不到經濟上的救濟，倒反完全被破壞了。那些價值一萬萬美金的紗廠，已在青島炸毀了。華北的市場在一年前對於日本是很有利的，但現在也已經毀壞了。日本人民對於戰爭是很不贊成的。他們雖然仍是馴良愛國，可是他們的不滿意已在下列的事實中表示出來了。他們已經印發一千餘種反法西斯主義的小冊子（這是法相承認的），人民爲了反戰運動而遭拘捕的已有一千三百多起。甚至在日本的軍隊中也時有發生叛變的事情。據報上所載，大阪地方有七千兵士拒絕赴華參戰；蘇州地方有二千日軍不願再赴前線打仗。上海南市有十四個日兵同時自殺，並且在遺書上說：『我們是被迫出此，因爲我們不願和中國人打仗。』

在第一年的戰爭終了時，大多數的外國軍事觀察家都同意地說，如果中國人能夠團結下去，日本是無力征服中國的。雖然，日本的武人還沒有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他們現在的戰爭不但是爲了建立世界的帝國，並且也是爲了他們自身的生存，因爲在國外軍事上的失敗與國內人民間的不滿意，都可以危害他們這一個階級的。

軍部的極端派，經過一九三八年三月中通過的全國總動員法與五月中內閣的改組，就完全統制了日本，這是近年日本歷史上所未有的。同時日本有勢力的資本主義也藉着國外的貿易從別國的資本家方面得到援助，甚至那些國家中的人民對於中國却是很友善的。

日本在中國命運不但要靠日本自身的力量與中國抗戰的程度，而且也要靠美國市場上的鐵與煤油，以及倫敦城與瓦爾街 (Wall Street) 投資家所藏的金子。這種國際的援助應當給予日本呢？還是給予中國呢？這種金錢應當投資在何處呢？借給中國去開發內地的鑛產，工廠，與鐵路呢？還是接濟日本去開發滿洲與華北呢？這些都是有關係的。如果這不是中日戰爭的最後關鍵，至多也和他的結局有關係的。這種結局，或許可以決定世界的歷史：它也可以阻止或激起世界的大戰。

英國的影響在歷史上最長久的。近五十年來它的外交政策是在助成並維持日

本的帝國主義。第一次是在日本對中國的戰爭（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十年後，它又藉着英日同盟的關係，而幫助日本對俄國的戰爭。這種同盟是因了美國在九國公約中所施的壓力而被解散的。但是它的鬼影仍在作祟，而阻礙了這種公約的實施。一九三一年，當日本侵略滿洲的時候，英國兩次拒絕了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對於聯合外交行動的提議。它在國際聯盟中支持日本的地位。這就開了方便之門，不但使國聯的權力衰落，並且也引起全世界法西斯的侵略。希特勒式法西斯主義的興起，阿比西尼亞，西班牙，中國與奧國的被侵略，日德意的退出國聯，另結法西斯同盟，都是由英國那種行動中發生出來的。日本的法西斯主義雖爲英國所助成，如今反來危害它的恩人了。在中國的日本兵踐踏了英國的國旗，碾轟了英國的兵艦，並用機槍擊傷了英國的大使，甚至日本的平民也會老實告訴你說，英國是必須退出遠東的。

所以英國在華的政策是帶雙重心理的。在遙遠的山西，這位機敏的老闆曾經對我說：『英國不願意強大的日本帝國在亞洲大陸上威脅它自己的利益。它更不願意

蘇俄在中國有強大的勢力。如果中國全靠自己的努力而變成強大獨立的國家，我想這也不能討好英國的。」倫敦市願意主要的國家都做它的債務國——祇要它們足以付清它們的債款——但不要它們強到可以反抗它的統治。在北京的九國會議中英國幫助了日本，因為它的主要勢力就阻止了制裁日本的聯合行動。然而英屬的香港却做了中國軍火的主要入口。這是一種有利的商業，同時也減弱日本的力量。當張伯倫想日本確是厲害的時候，我們也許可以看到「爲了和平的緣故」香港就要禁運軍火到中國，並且由張伯倫居間調解，以討好東京政府了。英國帝國主義等到日本精力盡，就要出來藉口「恢復秩序」與「穩定和平」，以提議瓜分中國。這是中國第二期抗戰中一種主要的危險。不過張伯倫向這方面的移動是會使英國的人民起來推翻他的，因為這樣的行動將使英國所犧牲的利益，甚至比他對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讓步還要大。

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要比英國更具雙重的心理。日本是它的同盟國，而中國却

是它的大市場。在歐戰以後，它對中國的貿易已有迅速的增進，直至它超過英國而接近美國與日本。一九三四年，有一百個德國軍官到中國去充當軍事的顧問並推銷德國的軍火。德國如能以工業品交換中國的原料品，那麼希特勒的許多問題也可以解決了。在另一方面，日本却要藉着低廉的工業品與德國競爭世界的市場。因此，商業的利益使德國站在中國的一邊，但日本却是它反抗蘇俄的軍事同盟國。

在德國看來，它的同盟國與它的市場之間的戰爭當然是一種深切的煩惱。戰爭會破壞中國的市場，也會消耗它所需要的日本軍事力量。德國大使最先作調解戰爭的嘗試以幫助日本，至少成就它在中國的一部份目標，並且使它不致在長期戰爭中弄得精疲力盡。這種交涉失敗了以後，德國就幫助中國大批軍火並加派軍事上和實業上的顧問——仍舊要想加強它自己在中國的市場。德國的新聞紙甚至稱頌中國人作戰的勇敢，而它的『種族研究部』也宣稱，中國人是屬於雅利安種——這種榮譽以前是專門贈給遠東的日本民族的。但是日本在一九三八年暮春，就打破了它的同盟

國對於它敵國的助力，因為那時德國在經濟上的困難情形，並對奧國與捷克的領土野心，極需要任何朋友的贊助。所以它就屈從了日本的壓力，而召回它在中國的軍事顧問，甚至說要取消軍火出口的護照。它對於這一點，不過是敷衍塞責罷了，因為它的願望，一方面是要拉攏日本做它對蘇聯作戰的同盟，一方面是要在戰爭期內與戰事以後對中國的實業改造上獲得第一位的貿易。

蘇聯的政策是清楚一貫的。它渴望和平與友好的鄰國。它不需要領土，也不需要市場。它的民族與階級的利益，使它站在中國人民的一方面，但它不願意自己加入戰爭的漩渦。它雖不親自參戰，但它在遠東邊界的強固國防，對於中國是有極大幫助的，因為這可使日本增加預備兵的數目，作為將來攻擊蘇聯的計劃。至於蘇聯對於中國最大的幫助，就是它在促進民主國家作集體援助方面的努力。它的永久和平政策不是根據各國個別的幫助，就是要根據全世界和平勢力的集體行動。這是根據於世界上前進的民主國家中人民普遍的信仰。最好的例子，就是羅斯福總統在

芝加哥的演說中，表明地球上大多數的人民都願意和平，而獲得和平的方法，乃在隔離侵略者的毒菌。相反的，張伯倫的『討好』侵略者的政策祇能激起它們的胃口。這和美國中立法所代表的見解是不同的，因為這種中立法實在是在旁觀態度的烟幕下，幫助了侵略國。蘇聯的政策却要幫助被侵略的國家與世界和平的勢力，所以它停止供給戰爭製造者的軍火，而多接濟被難國家的軍火，但都不出於戰爭的行動。

蘇聯已經採取了許多有系統的步驟以援助中國，並且加強了世界上防止這種衝突變成世界大戰的力量。其中主要的步驟，就是它在國聯中所施外交上的壓力，因此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國聯通過了一條決議案，督促一切會員國考慮它們如何盡力對中國作個別的援助；後來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又通過了一種語氣更強的決議案，懇切促請各會員國對於中國政府的請求作同情的考慮。這些決議案使蘇聯能夠不必站在布爾什維克的國家地位，却以忠實的國聯會員國的資格，運軍火去幫助中國。這種雙關的託詞在外交上是很重要的，因為蘇聯若對於中國作任何例外

的援助，都可被解釋爲蘇聯參戰的憑據，而使德意加增它們對於日本的助力。爲了同樣的緣故，蘇聯運往中國的軍火是不作廣大宣傳的。雖然，人家知道這些軍火的數量一定是很大的。自從日德訂立軍事同盟以後，蘇聯對於運往日本的鐵以及任何軍用的原料，都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裏停止了。（法國也停運軍火到日本。）蘇聯又很快地減少它和德日意法西斯同盟的貿易。在一九三七年的最後六個月中，它的貿易數量，比一九三六年的同時期中減少了一半。在中日戰爭開始以後，蘇聯就和中國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訂立了不侵犯條約。這使兩方面都不能直接的或間接的幫助任何來攻擊的第三國。這一切計劃都是要幫助中國，而不使戰事擴大。它們要減少戰爭製造者在軍火上的供給，而加強全世界對它們的壓力。

美國對於中國的同情比任何別的國家說得更響；它對於日本的幫助却也比任何別的國家做得更多。然而它比任何別的國家更應當幫助中國，因爲它是九國公約與非戰公約的發起者，而且這兩種公約，都載明處置條約的破壞者——日本——的行

動。日本的侵略中國，若沒有美國時常在『油』『鐵』方面的接濟，是不能繼續的。美國對於日本供給了全部軍火進口的百分之五四·四，油鐵進口的三分之二，還有百分之百的飛機汽油與百分之九十的運貨汽車。美國在華的宣教師曾經講述大批的日本軍人駕駛美國的汽車，橫行於揚子江三角洲一帶地方。如果美國拒絕以軍用品供給日本，那麼它從別的國家也能購得一些，但它全靠美國供給它特製的綱條，機件，與重工業所用的滑油。美國資本家對於日本的呼應超過了自己的國家。伯利恆製鋼廠宣稱，他們不能減低鋼的價格，以供新經濟復興運動中和平的建設之用；但是他們賣給日本的鋼價每噸却減少了七元五角至十元。

日本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初對廣州肆意轟炸了十六天，而在彈雨下犧牲的平民不下一萬餘人；美法英三國爲了這種野蠻舉動曾向日本提出了嚴重的抗議。這些飛行員當然是日本軍部供給的；但在那種屠殺中所用的炸彈，飛機，汽油，滑油，棉花火藥與化學用品都是與美國有關的。所以無怪日本對美國的抗議，作了這樣驕橫的

答覆：『日本要猛烈地施行空襲——結果是滿意的。』

美國密蘇里的參議員葛拉克（Clark）說：『這純然是一種偽善的行爲，如果對於炸彈的使用要表示悲憤，同時却繼續出賣製造炸彈的原料與投擲炸彈的機器。』甚至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機關報也在譏笑的評論中，把美國的抗議與美國的行動作一個對比。

許多愛好和平的美國人要問，爲什麼不請求中立法禁止軍火運往遠東。他們却不知道這種法案並無中立的意義。如果把它應用到遠東方面的戰事，那麼它將幫助日本更多了。它禁止裝運現成的軍火，却不禁止軍用品的原料；所以它常常會幫助那購買原料去自製軍火的強大侵略國。現在雖未實施中立法，但履行了中立原則而發生的結果已被證明了。中國定購的十九隻飛機，只好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六日從威支塔號（Wichita）裏卸下，因爲美國政府曾有命令，禁止政府津貼的商船裝運軍火。然而美國政府對碼頭工人常常反對裝運廢鐵到日本的抗議却答覆說，廢鐵在技

術上不算軍火，所以即使在政府所有的船上也可以裝運軍火出口的。

許多美國的公民，因為他們的同胞幫助了日本對華的戰爭而深以為恥，所以就組織了一種抵制日貨的運動，以削弱日本在戰爭中必需的經費。他們特別請求國人抵制一切的絲織品，尤其是關於絲襪一項；因為美國的絲，差不多都是從日本來的，而且也是日本的一種主要收入。這種抵制非常有效。在一九三七年的起初五個月中，美國進口的日本貨總計美金九千二百三十八萬六千圓，但到了一九三八年起初的五個月中，已減少到四千七百八十六萬八千圓。在以後的幾個月中，因為抵制運動更為有力，日本貨的進口最為低落。五月中進口的日貨減少了百分之六十，就是從一千八百二十四萬圓減到七百零二萬圓。許多中國人的生命已經無疑地為這個抵制運動所拯救，因為這可以減少日本數千萬圓的購買力。日本在美國所購的貨品也逐漸減少，雖然比它出賣的貨品減少得慢些。它為了購買軍用品就用去了它在外國所存的準備金。這些準備金並不是用之不盡的。在第一年的戰爭中，它的準備金已經

從四萬萬圓減少到三千五百萬圓。這就使它在全世界所有的船碼頭，除了斐律賓以外，都作了抵償品。這種抵貨運動還在漸漸地擴大。

各種個人的行動，總不能代替政府所定的一種清楚的政策。除非美國政府採取了一貫的政策，來擁護世界的和平而隔離戰爭的製造者；那麼美國的商人總是要使他的國家，成爲世界上各種侵略戰爭中主要的助手。一種促進遠東和平與美國繁榮的綜合計劃，不但要包括抵制日本貨的輸入與禁售軍用品給日本，並且也需要美國幫助中國內地諸省，進行和平的實業建設。內地諸省的迅速發展——那邊的鑛產物與農產品是很豐富的，而人民又是極勤勞的——就是中國民族的得救之道，助成這種發展或許也是美國的得救之門。因爲這可以使我們工業的製造廠有好多年的忙碌，並可救濟我們繼續不斷的經濟恐慌。這也可以減短中國第二期的戰爭，而減少釀成世界大戰的危險。這又可以使太平洋的對岸建立了一個强大友善的國家，因此加強了世界和平的力量。

一切主要的中國人都很精密地知道美國與其他民主國家，在這次中日戰爭中所處的重要地位。蔣介石夫人曾經寫信給我說：『我們是因爲民主國家的軟弱無能，而作了犧牲者。』她又警告我們說：『國際法律的崩潰能夠影響別的國家，正和現在影響中國一樣。』

一九三八年七月中，蔣介石曾經公開地說：『如果美、英、法、蘇能夠聯合表示堅決與團結；那麼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就可以不用武力而被制止了。』我在中國所遇到的每個美國人都是和我同意的。他們說：『中國是在替我們打仗。如果日本能夠使它爲奴，那麼就可以利用它廣大的人力，以實現日本軍閥的計劃。這就使我們所謂各種的文明都要崩潰了。如果中國能夠保持它的獨立，那麼它的發展會加強世界的繁榮，民主政治與和平。』

在漢口的孔祥熙院長曾經對我說：『美國應當考慮它自己的榮譽。九國公約是美國發起的，也是它簽字的，那麼它對於日本的破壞條約，怎能嚴守中立呢？一個

國家斷不能簽訂一種國際條約，而通過了一條國內法律，就把它取消了。但若美國忘記了它對中國的誓約，它豈不能看見它自身的危險麼？日本預備它的海軍來攻擊誰呢？不是要攻擊中國的，却是要攻擊斐律賓，夏威夷，阿拉斯加的；我們不過是它練習時的靶子罷了。美國的「中立」使中國與美國都要受着害處，甚至對於日本的人民，也有害的。因為它要消滅日本國內一切溫和派的論據。這班少壯軍官就要回答說：「你們講論九國公約與國聯盟約，我們却把它們都撕毀了，却没有發生什麼事情。」當那些少壯軍官統治了日本——如果它們也統制了一部份的中國——請注意那時世界的命運吧！制止將來日美戰爭的最好地方就是在現在的中國。我們願意替你們打仗，祇要你們給我們軍火。但是很奇怪，你們不幫助我們，却正幫助日本！」

當美國在遠東最活動的時期中，國務卿海約翰 (John Hay) 曾經說：『世界的和平全在乎中國。凡是了解中國的人，……就把持了以後五世紀中世界政治的關

鍵。』在我們廣大的世界上，祇有三四個國家，因爲人民如此衆多，如此有力，如此團結，所以它們的命運是可以決定全人類的命運。北美洲是其中的一個；蘇聯是另外一個；中國是第三個。不列顛帝國祇要它能長此團結下去，也是這些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英倫三島却不是重要的因素。歐羅巴全洲如果能聯合起來，也許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是現在歐洲却把自己分裂了。

中國從前，現在，與將來都是人類歷史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在過去的時候，它是四週鄰近國家的文明泉源。當歐洲發見了它以後，它就變成一切帝國主義者的百寶箱。它將來的命運握在自己人民的手中，因爲他們在四千年歷史中第一次覺悟到自身是一個密切團結的民族國家。沒有一個愛好自由的人敢對那將來的命運抱着漠視態度的。五分之一的人類爲自由的鬥爭乃是我們世紀中決定的事件。因爲在四萬五千萬中國人獲得自由的時候，全世界也快要得到自由了。

新書介紹

委員長特許執筆的一部傳記鉅著

中國最高領袖蔣介石

董顯光原著

平裝二冊 二元四角

蔣鼎黼
姜君衡

合譯

精裝一冊 三元

元

今日的中國，已是一個從團結統一進於抗戰建國的中國，而蔣委員長便是全國團結的中心人物和抗建中的最高領袖。爲了幫助我們對於這個領導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並負責解決一切難題的蔣氏獲得更深更清的瞭解，並廓清一切偽造的舊傳記起見，本書作者乃以蔣氏英文授業師的資望，憑着一腔熱情和多年心血，鑄成了這座紀念碑似的八百餘頁之巨著。作者從蔣氏學生時代，卽已熟悉其爲人，故描寫極真切，筆法亦簡潔，態度尤覺懇切，這不僅是蔣氏一生的偉大紀錄，抑且是中國卅年來的活的歷史。本書寫作之際，曾得遠東問題專家普拉特和貝尼斯敦諸君的助力，使本書益臻完善。至譯筆之純熟，印校之精細，插圖之豐美，足與原書頡頏。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5447B

崇 堦 社

\$0.80